

临沂市在山东省的位置

临沂市政区地名图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东夷文化发祥地
-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中国市场名城
- 中国地热城
- 中国书法名城
- 国家园林城市
-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图例

- 市政府
- 县(市、区)政府
- 乡、镇(街办)
- 铁路
- 高速公路及道号
- 国道及道号
- 省道
- 县道
- 省界
- 设区市界
- 县(市、区)界



2011·05,3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文学院

编委主任：王晓嫒

编委委员：徐福田 李克彬 吕国明
高 明 胡爱军 伊廷军
刘兆东 李凤军 颜景芳
高文堂 郑克勤 曲文军
牟海善 王纪明 郑士选
高 雷 王傢玉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朱海涛 王志刚 杨兴文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郑士选

本期执行主编：刘兆东

责任编辑：宋希芝 杜 帅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0）第Q1023号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博 客：yimengshizhi.blog.163.com

blog.sina.com.cn/u/1914056311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目 录

【本期特载】

人民的骄傲——记江泽民同志为华东

革命烈士陵园题词 刘 涛 04

【峥嵘岁月】

毛泽东与沂蒙战场（连载）

刘兆东 06

沂蒙凯歌

黄国忠 09

笛崮浴血

严雨霖 14

【史海撷萃】

乾隆皇帝与郯城（连载）

刘卫星 孙长生 18

从“县太爷”到阶下囚（连载）

时 麟 王秋侠 22

明初临沭地方迁民史

临沭县史志办 26

【文化掇英】

根植沂蒙沃土的艺苑奇葩（连载）

——山东柳琴戏起源与发展概述

肖 民 28

鼓词“民国十七年太平歌”注释

高 雷 34

【名人素描】

饱经雨露霜 其中苦酸甜

——忆念小古

钱勤来 37

【蒙山沂水】

冠山记

王兆军 41

古蒙祠与万寿宫

李常松 42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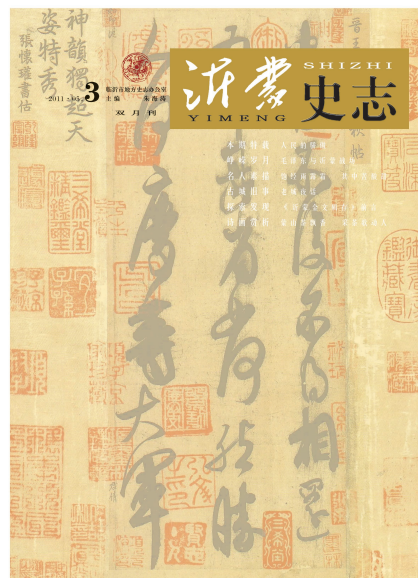
刘家骥 44

【探索发现】

	《沂蒙金文辑存》前言	王汝涛	47
【诗画赏析】			
	孤高名士的自由追求	刘长春	52
	蒙山茶飘香 采茶歌动人	李兴河	54
【沂蒙名医】			
	祖母 菩萨 战士	刘凤才	57
【典籍考辨】			
	老子故地孝义村考	张宗云 郭永远	60
	郑玄与平邑郑城的历史渊源	孟 君	62
【史料辑存】			
	民国时期山东历任军政长官	井窥斋 大荒堂主	64
【文史论坛】			
	《颜氏家训》析感	颜世谦	67
	县志篇目设置要突出特点	杨永早 李祥琨	70
【沂蒙乡亲】			
	从农家小子到“嫦娥功臣”	葛瑞强	74
	千里万里心系故乡	杨玉金	76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	赵丹峰	77
【史志动态】			80

封面为王献之《中秋帖》

封底为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文物《胡人骑兽》



本刊声明

凡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均视为双方自动接受如下约定：

1、本刊刊载的文字、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来稿不查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两个月未采用者可另作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2、作者文责自负，若侵犯他人权益，本刊概不承担连带责任。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即拥有在“临沂市情网”和本刊主办单位编印的出版物及资料上转载的权利。

人民的骄傲

——记江泽民同志为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题词

刘 涛

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省委进驻沂蒙山区，1938年12月在沂水岸堤成立了山东分局，并组建了山东纵队；1939年3月，罗荣桓、陈光等同志率领115师师部及部分主力挺进山东，同年6月后转战鲁中南，6月，徐向前、朱瑞等同志到达山东，8月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他们和山东党政军民一起，相继开辟了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清河、湖西等抗日根据地。八年抗战期间共作战数万次，消灭日伪军25万余人。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中央指示，罗荣桓同志率山东八路军6万余人奔赴东北，陈毅率新四军主力接手临沂。在临沂先后成立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领导华东军民反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犯，进行了鲁南、莱芜和孟良崮等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在建国前的20多年里，遍及全国16个省籍的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在这块土地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巨大石质联壁上就镌刻着62576位烈士的英名。

1990年底，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与临沂地区行署出版办公室合作出版一部全面介



继承烈士遗志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中
建功立业
江泽民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

绍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的书籍，拟请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题词。当时请中央首长题词的任务交由行署出版办公室具体负责，并以中共临沂地委名义赴北京请首长题写。邓小平、江泽民在百忙之中分别于1990年12月7日和1991年1月17日欣然挥墨。邓小平的题词是“光照千秋·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江泽民的题词是“继承烈士遗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建功立业”。

为展示中央首长对沂蒙老区的关怀，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当时地委、行署主要领导做出指示，将中央领导的题词镌写碑文以流芳千古。巧合的是1950年5月1日革命烈士纪念塔落成时，在四周设计有9块题字石碑，7块石碑当时就已镌刻上内容，唯独在革命烈士纪念塔正面山东省人民政府建塔碑文的左右两侧各空有一块石碑，似乎期盼着领袖的画龙点睛。这样，在革命烈士纪念塔上就留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墨宝。

江泽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党面临严峻考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遭遇了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打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这种条件下，江泽民同志为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题词，体现了党中央对革命老区的关注，对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对沂蒙人民寄予的厚望。这是革命先烈的荣誉，也是沂蒙人民的骄傲，既是无形的财富，更是有力的鞭策。

毛泽东与沂蒙战场（连载）

刘兆东

七、“敌不动，我不打”

鲁南战役后，国民党军不甘心失败，又挖空心思再次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集中19个整编师，49个旅近30万人，从陇海、津浦、胶济三条铁路线向沂蒙山区进攻，企图在临沂与华东野战军决战。为确保“鲁南会战”计划的实现，蒋介石亲自到徐州研究作战方案，陈诚则坐镇徐州督战。

这期间，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整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陈世桀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刘先胜、张元寿任副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辖9个步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第一纵队由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克希任副司令员，谭启龙任副政治委员，张翼翔任参谋长；第二纵队由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震任副司令员，康志强任副政治委员，詹化雨任参谋长；第三纵队由何以祥任司令员，丁秋生任



老大娘向我炮兵指点目标：“敌人就在那边”。

政治委员，覃士冕任副司令员；第4纵队由陶勇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治委员，梅嘉生任参谋长；未设第五纵队；第六纵队由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治委员，皮定钧任副司令员，陈时夫任副政治委员，杜平任参谋长；第七纵队由成钧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林维先任副司令员；第八纵队由王建安任司令员，向明任政治委员，孙继先任副司令员，张仁初任参谋长；第九纵队由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聂凤智任参谋长；第十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刘培善任副政治委员，赵俊任参谋长；特种兵纵队由陈锐霆任司令员，张潘任政治委员，钟国楚任参谋长。全军27万人，成为解放军的一支劲旅。

1947年1月31日，国民党军向沂蒙山区发起全线进攻，其具体部署是：在南线，以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7个整编师及第七军，组成主要突击兵团，从徐州以东陇海线分左、中、右三路向临沂方向进犯；在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的第十二、第七十三、第四十六军为次要突击集团，自胶济铁路中段南下，堵住华野后路；在西线，从河南、河北调集王敬久集团第五军、整编第七十五、第八十、第八十二师布防于津浦路泰安至徐州段，以防华野西撤或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

根据敌人的部署，华东野战军决定先打南线右路之敌，但敌人采取“密集平推，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很难捕捉有利战机。与此同时，此线敌人于2月初占领了莱芜、新泰、蒙阴一带。

2月3日，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走至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我亦不打，完全处于主动地位。”2月4日，中央又指出：“敌愈深入愈好，我愈打的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我必能胜利……”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多次指示精神，华野采取在临沂城以南作正面防御、在兖州以西运河上架浮桥等多种手段迷惑敌人，将主力部队隐蔽北上，于2月20日15时突然发起莱芜战役，经3昼夜激战，全歼敌一个绥靖区指挥所、两个军部、7个师5.6万余人，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7万余人，俘虏李仙洲等高级军官21人，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

八、“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

从1946年6月到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占领了解放区一些地方，但却被人民武装消灭有生力量71万人，其“速战速决”、“三至六个月解决战事”的计划化为泡影。且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摆脱困境，尽快置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于“死地”，蒋介石便改全面进攻的部署为重点进攻的战略，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采取守势，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

1947年3月，蒋介石先后从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调集了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的兵力，占其重点进攻兵力的66%。其中有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第十一师和第五军，并以这三大主力为骨干，分别编成了三个机动兵团：汤恩伯部为第一兵团，辖第七十四、第八十三等6个整编师，由临沂、费县、平邑一线向蒙阴、沂南一带进攻；王敬久部4个整编师为第二兵团，由泰安、宁阳、曲阜一线向莱芜、新泰一带进攻；欧震部6个整编师为第三兵团，待全部占领鲁南后再向鲁中推进。目的是迫使华东野战军在沂蒙山区与之决战，或逼迫华野放弃沂蒙山区，将其赶至胶东一隅消灭或者赶过黄河以北，从而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

为了寻求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华野首先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采取“耍龙灯”的战法，时南时北，或东或西，有进有退，往返千余公里，但敌人始终密集靠拢，难以分割围歼。

5月3日，陈毅、粟裕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决定由陈士榘率两个纵队南下鲁南，威胁敌人后方，调引敌人回师或者分兵，另以一个纵队南下苏北或插入华中。5月4日，毛泽东指示华野：“敌人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唯：（一）要有极大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野主力后退至新泰、蒙阴以东隐蔽待机。这一招，极大地迷惑了敌人。蒋介石、陈诚等误认为共军“攻势疲惫”，已从淄川、博山方向撤退。于是命令各部“跟踪追剿”。第一兵团汤恩伯部一改稳扎稳打的惯例，不待其他兵团统一行动，即令第七十四师等自垛庄、桃墟一带北犯。第七十四师自恃武力，不等左右两翼跟进便孤军深入。陈毅、粟裕等抓住战机，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指挥华野把第七十四师包围在孟良崮一带，从5月13日晚战至16日下午，全歼国民党王牌军第七十四师3.2万余人，一举扭转了华东战局，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内部，也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

从上述历史看，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和沂蒙战场的辉煌战绩，都浸透着毛泽东同志的心血，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同时也是沂蒙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指战员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一系列指示的结果。在今后工作中，我们要进一步研究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及历史作用，深入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系统总结其经验教训，以史鉴今，更好地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全文完）



陈毅（左二）、粟裕（右一）、谭震林（左三）、刘瑞龙（右二）、饶漱石（左一）
1946年春在临沂。

沂蒙凯歌

黄国忠



英明的决定

1941年10月，新任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坐镇临沂，纠集了5万兵马，拉开大网，向沂蒙山区汹涌卷来，我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在我们特务营的掩护下，从滨海地区北上，准备与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会合，组成反“扫荡”的统一指挥机构。11月4日，当我们行至留田时，日寇突然从四面八方合击过来。很显然，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妄想以突然袭击，先打掉我领导机关，然后再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我营4个连，分别坚守在留田四周的山头和隘口。我跟随二连守在留田东北5里多地的司马。从5日清晨，一直打到中午，仍不见行动的命令。举目望去，大路、小路、山谷、田野，到处是黄溜溜的鬼子兵。他们在飞机掩护下，步步紧缩着包围圈。看着这情景，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深深地知道，机关和首长的安全关系着整个山东的抗日斗争啊！

下午3点多钟，师部通信员飞马奔来，急促地对我说：“师首长要副营长立刻前去领受任务。”我立即跨鞍上马，直奔师部。

师部驻在牛家沟。当我赶到时，师部的茅屋里已经挤满了人。我们的营长，正、副教导员已经先到了。屋子里异常沉静，只有罗荣桓政委站在作战地图前，手里拿着红蓝铅笔，在讲着什么。我向首长作了报告以后，罗政委停止了讲话，走过来同我握握手。他的神态、动作，就像周围没有发生任何敌情。看到罗政委那镇定自若的神态，我原来紧张的心情，立时平定下来。

罗政委回到地图前，严肃而又平和地继续说道：“现在我不应该单纯考虑如何突围，保存自己；而应该考虑怎样才能保存了自己，又能打破敌人的扫荡，保住我们的根据地。”说到这里，他伸手向南一指，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意见应该向南突围。”

“向南突围？”这个出乎意料的决定，简直使我吃惊。我看了看其他人，大家也都露出了惊异的神情。

“是的，向南！向敌人的心脏临沂方向挺进！”罗政委重复了一句，接着便简要地分析了敌我态势。他指出：东面的沂河、沭河和台潍公路，都被敌人严密地封锁着，并布置了一个口袋阵。我们东去，正中敌人的毒计。北面，敌人正疯狂地向南压来，顽军又与山东纵队对峙着，北上定受日、顽夹击。西有津浦铁路，敌人碉堡林立，戒备森严，不易通过。讲到这里，他声音洪亮地说：“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后方必定空虚，这就给我们闪出了突围的空隙。我们趁机插到他的大本营临沂，就会变被动为主动。待敌人回师后，牵着他的鼻子，彻底粉碎他的“扫荡”。听了罗政委精辟的分析，我心里像开了两扇窗子，顿时豁亮起来。

首长们一致同意罗政委的意见，并请他下达命令。罗政委在地图上先画了三条天蓝色弧线，又画了一个红色的圆圈。然后又穿过三条蓝线画了一条向南转西的红线，在圆圈处停了下来。他把我们叫到跟前，先指着三条蓝线说：“这是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然后又移向红线说：“这是我们的行军路线，从留田经张庄，穿高里，折转西南，然后，越过临蒙公路，直插诸满以南，在这里停下来。”他的手指最后落到被红圈围着的汪沟附近。我仔细一看，汪沟离临沂最多不过五十里路。罗政委等我们把每一个要经过的地点都记清楚之后，又向我们详细交代了经过这些地方应注意的事项。他对沂蒙山就像熟悉自己的故乡一样，连哪里有个隘口，哪里可以通过炮车，都非常清楚。这使我想起敌人“扫荡”之前，他曾指示所有参谋人员和部队连以上干部，必须把沂蒙山的地形摸透。为此，我们特组织了一个“参谋旅行团”（这是我们自己定的名字），爬遍沂蒙山区的每一个山头，翻越过每一个隘口，涉过每条河川。“旅行”结束之后，他又召集我们，对照地图，作了详细汇报。当时，我们对这次“旅行”的意义认识还不足，此刻才领会到，罗政委那时已为反“扫荡”做了准备工作啊！通过这次“旅行”，我们对沂蒙山更熟悉了，他也把沂蒙山完全掌握了。

罗政委向我们交代了任务之后，又给我们作了具体分工：营长和教导员带领一、二连做前卫；副教导员带四连居中卫护机关；我带三连担任后卫，掩护和收容掉队人员。他同时要求部队一律上刺刀，压满子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最后他又宣布了行动纪律：坚决服从命令，不得自由行动；没有突出合击圈前，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响声。领受任务完毕，天已黄昏。走出师部时，我仿佛站在一座雄伟的高山之顶，站得高，也看得远了。先前那种不知去向的紧张心情，完全消逝了。教导员也意味深长地说：“这真是个英明的决定。”

无声的战斗

夜幕降临，雾气弥漫。留田周围的山头上，日本鬼子燃起的冲天大火，又把黑夜变成了白昼。枪声、炮声、马嘶声和鬼子的号叫声，不断传来。他们是那样嚣张、狂妄，仿佛敌酋一声令下，就能一举歼灭我们似的。

几千名机关人员和我们特务营，都集合在一块平地上，静静地等待着出发的命令。忽然罗政委率领作战科的同志和一部分侦察人员，从部队面前走过，先头出发了。罗政委安详地迈着步子，还不时向别人打着招呼。这一切，就好像他不是要带领几千人突破重围，而是去出席一次会议。这情景使我想起了他在梁山战斗中的情形。那是1939年8月，我们把600多日本鬼子包围在梁山，罗政委决定全歼敌人。他部署完战斗任务后，便来到前沿附近的一棵大树下。鬼子拼命想突出重围，战斗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子弹、炮弹不断地在大树附近飞啸、爆炸。可是我们的罗政委，一面听着参谋人员向他报告战斗的进程，下达着命令；一面就像在乘凉，不停地摇着大芭蕉叶扇子。一直到战斗即将胜利结束，他才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摇着扇子离开了这棵大树。想到这些，我信心倍增。

七点多钟，部队以战斗的姿态出发了。几千人的队伍，一个紧跟一个，静悄悄地从仅一里多路的空隙中向南插去。我们逢山过山，遇水蹚水，不久便接近了台潍公路。我们在公路右侧的小路上向南前进，公路上便是向北疾进的日本鬼子大队人马。炮车滚滚，马蹄踏踏。原来他们正做着在留田合击我们的美梦啊！我们直奔第一道封锁线张庄。快接近时，只见大小山头上一溜火堆，犹如一条蜿蜒的火龙。火龙的中间，闪出一段黑蒙蒙的缺口，看去只有一里多路。前面传下罗政委的命令：“三路纵队，跑步通过。做好战斗准备！”战士们一手提着上了刺刀、压满子弹的步枪，一手提着揭开了盖的手榴弹，迅速、肃静地向两山之间的隘口猛插过去。敌人盲目地射击着，子弹在头顶上尖叫着，我们理也不理，继续飞奔，整整过了半个多小时，敌人仍未发觉，第一道封锁线安全地通过了。

过了张庄，穿过一条小山沟，部队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向南走。下半夜，到了高里附近，向前看去，大小山头上，又是火堆连着火堆。火堆旁，时隐时现地闪动着敌人巡逻兵的身影，而且每隔十分钟，便飞起许多绿色信号弹。前面传下“跑步跟上”的命令，部队迅速前进。当我们从两堆大火中间穿过时，只见我们的三名侦察员，穿着黄呢大衣，正举着信号枪发射绿色信号弹。原来他们掌握了敌人巡逻兵的规律之后，一声

不响地干掉了巡逻兵，然后便穿上敌人的衣服，执行起“巡逻兵”的职责。

三星垂西，部队折转向西，越过临蒙公路。正像罗政委分析的一样，敌人后方空虚，戒备不严，我们又顺利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五点多钟，我们便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汪沟附近。就这样，我们没费一枪一弹，无一伤亡，安全地突破了五万敌寇的包围。而敌人却在继续源源不断地向留田方向开去。

第二天，我们的《战士报》上，登载着德国记者希伯同志写的一篇文章，他称赞留田突围的智慧是神奇的，文章的前面，标着醒目的红字标题——《无声的战斗》。

调虎离山

我军突出重围，敌人的合击扑空了。他们一时摸不清我们的去向，因此也没有马上调兵回转。就在敌人犹豫不定的时候，罗政委又英明果断地引导我们跨出了反“扫荡”的第二步。部队在山坡上集合了。罗政委站在一块石头上，朝阳照耀着他高大健壮的身躯，显得神采奕奕，容光焕发。他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一定很关心我们下一步的行动，现在就来告诉大家，我们还要回到沂蒙山区去。”接着，他指出：我们虽然突破了敌人的重围，但这仅是我们的初步胜利，沂蒙山区是我们的根据地，沂蒙山区的群众是我们的靠山，要坚持抗日并取得最后胜利，就要有群众。因此，我们不能离开沂蒙山，不能丢了沂蒙山区的群众。我们所以离开了沂蒙山，是为了把敌人调出沂蒙山，消灭他们，保卫沂蒙山。现在敌人还没有离开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就要牵着他们的鼻子把他们调出来，然后再回到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消灭敌人，保卫根据地和广大群众不被摧残，这才是我们的全部胜利。

在罗政委的指挥下，我们又调转头来，向沂蒙山挺进。7日黄昏，我们到了诸满。8日，罗政委派人把我叫了去，他指示说：“敌人在留田扑空，正在摸我们的去向。我们要将计就计，暴露一下自己，把敌人调出我们的根据地。”他见我还没有完全弄清他的意思，又进一步说：“垛庄、青驼寺一带，敌人抢劫了很多牲口、物资，准备外运。敌人必经石栏，你带上两个连在石栏附近打他的伏击。要打得狠、声势大、动作快，打了就撤。敌人正想寻找我主力决战，他的侧后受到威胁，又摸不清我们有多少兵力，就一定会调兵回来。”一切全明白了，9日清晨，我便带领部队到了石栏附近。

罗政委选择的这个伏击地点可真好。东西两面高山

耸立，中间一条大道伴着一道沙河，自北而南，纵贯而过。只要占领了两侧的高山，敌人一到，我居高临下，把南北山口一卡，即使他有三头六臂，也插翅难飞，有腿难逃。为了造成浩大的声势，我们把全营的司号员都集中了起来，又把所有的轻重机枪组成了密密的交叉火网，单等敌人“光临”。

细雨霏霏，寒风习习。战士们匍匐在冰冷的岩石上，忍受着寒冷的侵袭，等了将近一天，依然不见敌人的踪影。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我正在考虑是继续等下去，还是撤回，通信员传来了罗政委的指示：坚持等下去。

黄昏，雨停了。正当大家等得心焦的时候，忽然从背面山口传来踏踏的马蹄声，接着，又出现了影影绰绰的人影。敌人果真送死来了。

日本鬼子根本没有料到我们会出现在这里，因此毫无戒备。他们押着抢掠的牲口、物资，队形零零散散，断断续续，如入无人之境。当他们全部进入我伏击圈时，我令通信员打了一发信号弹。立时，轻重机枪扫射，掷弹筒、手榴弹炸，呐喊声、军号声，如山崩，似海啸，犹如千军万马进行大会战。敌人遭这突然袭击，又见声势如此之大，一时不知所措，立刻乱了阵势。刹那间，山沟里人撞马，马踩人，人喊马嘶，鬼哭狼嚎。战士们趁机从两侧山上像泰山压顶直扑敌群。经过约半个小时的激战，打死300多敌人，只有几个鬼子狼狈地逃走了。我们遵照罗政委的指示，没有追击，让他们为我们当义务宣传员去，我们简单地打扫了一下战场，立刻转移。

第二天，据侦察员报告，敌人果真中了罗政委的“调虎离山”计，青驼寺、垛庄等地的鬼子纷纷外调。战士们打趣地说：“这一下可把敌人的鼻子牵住了。”

沂蒙飞兵

敌人主力外调，只留下一些小部队在山区进行“分区扫荡”、抢掠和搞伪化活动，并准备内外配合，继续对我进行合击。罗政委一面命令机关和抗大组成许多工作组，分赴各地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面率领我们猛插中心地区。他指示：要不怕疲劳，见缝插针，有空就钻，狠狠打击敌人。

我们来到东蒙山，这里遭到敌人严重摧残。敌人的宣抚班和汉奸队天天出动，召开群众大会，组织伪政权。罗政委指示：打掉宣抚班，制止伪化活动，鼓舞群众斗争情绪。

14日上午，侦察员报告：青驼寺的敌人掩护着一个宣抚班进了龙口。我们两个连立即奔向龙口，把敌人秘

密地包围起来。一个贼头贼脑的汉奸，站在一张桌子上恬不知耻地说：“沂蒙山区的八路军已经被全部消灭了，这里成了‘皇军’的王道乐土，你们已是‘皇军’的顺民……”这家伙正胡诌乱吹得意忘形，“嗖”的一声，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脑袋。紧接着，我们猛扑过去，吓得其他敌人抱头鼠窜。跑不及的，当场做了俘虏。

“追呀！”战士们怒吼着，枪打、刀挑，一气把敌人追出几十里路，直到青驼寺的敌人出动了援兵才停止。追击的路上，到处都是敌人跑掉的鞋子、帽子，扔掉的枪支、包袱和一具具尸体。战士们把枪支捡起，其他东西原封不动，他们说：“留下这些东西让老乡们来参观参观‘大皇军’的‘赫赫战功’吧！”

群众亲眼看到这场追击战，胜利信心提高了，对敌斗争蓬勃开展起来。

龙口追击战的当晚，我们便转移到大谷台。这里地形隐蔽，又较富裕，便决定在此休整两天，补充粮秣。两天刚过，接到情报：敌人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合击大谷台。果然，17日晚上，敌人的几千人马，从四面八方直奔大谷台而来。就在同一天晚上，我们也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临蒙公路，一夜之间便来到凤凰山下。次日，鬼子大炮对大谷台周围空荡荡的山头，轰轰隆隆，从早晨一直轰击到天黑。我们也在凤凰山下美美地睡了一天。

19日，我们又一下子飞到了敌人的中心据点垛庄附近。这时候，留守垛庄的鬼子和汉奸，天天出来烧杀抢劫。我们决定趁合击大谷台的鬼子还没有返回垛庄之前，来个“有空就钻，见缝插针”。

当晚北风呼号，大雪纷飞，漫山遍野立时成了银色世界。四连的战士们，顶风迎雪，在垛庄附近埋伏起来。天刚亮，垛庄的鬼子果然又耀武扬威地出动了。等他们进入我伏击圈，我一阵猛烈射击，便把他们打了个稀里哗啦，丢下20多具尸体，狼狈地缩了回去。这一仗虽不大，对鬼子的震惊可不小，他们急忙鸟飞兽散，各奔自己的老窝。

鬼子连续遭我沉重打击，恼羞成怒。24日，旧寨的敌伪军200多人，直扑我驻地北村，当即被我击退。垛庄的鬼子闻讯后，仍不甘心，连夜纠集了700多人，第二天拂晓再次来犯。我们决定彻底挫挫他们的锐气。激战一天，打退敌人三次疯狂的冲击。黄昏，我一连迂回到敌人侧后，两面夹击，毙伤敌人近300名，残敌被迫撤退。

这一仗，把留在我根据地内鬼子的气焰打了下去。他们固守在据点里，少数人轻易不敢出动。根据这个情况，罗政委率领机关的一部分人员去山东纵队，部署外线部队的反“扫荡”战斗，我们仍留在内



八路军向日寇发起冲锋

线活动。

我们根据罗政委的指示，忽而东，忽而西，时而分散，时而集中。今天配合机关和抗大组成的工作组发动群众，明天又带领民兵破公路、炸桥梁、割电线。白天分散打击敌人的宣传班、抢粮队和伪政权；夜晚又集中起来，长途奔袭敌伪据点。我们就像一群千变万化的孙悟空，穿插在沂蒙山区，飞行在敌人稠密的点线之间，使敌人合击扑空，伪化不成，蹲在据点里也胆战心惊。与此同时，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也普遍开展起来。县大队、区中队、民兵联防、游击小组，到处展开了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广大群众也都实行了坚壁清野，连水井都掩埋起来。人们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来对付敌人的“三光”，迫使敌人寸步难行。

沂蒙山区到处都在燃烧着斗争的烈火。

凯歌迎新年

在我坚持沂蒙山区内线斗争的同时，我外线部队也广泛展开了活动。我教二旅部队在滨海钳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山东纵队除一部坚持内线斗争外，一旅在鲁南、泰山区、泰西区，不断袭击敌伪据点，截击向沂蒙山区调运的敌兵。二旅在滨海，五旅在胶东，也连克十多处敌伪据点，有力地支持了内线的反“扫荡”斗争。

我们特务营，愈战愈强，仗也越打越大。11月底，我们把600多敌寇围困在绿云山附近，白天打了一天，敌人反复冲击，也没能突出去。夜晚，我营在山东纵队二旅一个营的密切配合下，一个猛袭，敌寇便大部被歼。

敌人在我内外夹击下，在山区已站不住脚，便陆续向外围据点撤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外调更加频繁。我们趁此时机，经常抓住其一路痛击。我们又与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配合，围碉堡、拔据点，连续拔掉诸满等据点多处。

这时，山东纵队一旅主力也由外线跳入内线，向敌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攻势。不几天，敌人在沂蒙山区安下的据点，有的被攻克，有的被迫撤掉，沂蒙山根据地的人民又重见天日了。

12月下旬，我营奉命返回师部。当我们胜利返回滨海区，到达师部驻地时，罗政委亲自组织欢迎，并到各连进行慰问。不几天，根据地的军民便锣鼓喧天，踩高跷、跑旱船，欢庆反“扫荡”的胜利，迎接新年。

除夕，在驻地附近的柏树林里，我们师直属队和分局机关举行会餐。分局和师的首长都参加了。罗政委举杯向大家祝贺新年，祝贺反“扫荡”的伟大胜利。他指出，沂蒙山反“扫荡”的胜利，是由于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由于我们上下一致，团结一心。他特地指出：“特务营的同志们 in 艰苦的斗争中，表现了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今后要不骄不躁，争取更大的荣誉和胜利。”罗政委的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树林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沂蒙凯歌》：

我们是八路军的健儿，
我们是人民的钢铁武装。
转战沂蒙山，英雄逞豪强。
粉碎了日寇的“铁壁合围”，
穿透了敌人撒下的大网。
游击战，显神威。
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
……

歌声穿过树林，越过平原，飞过山冈，传向四面八方。凯歌声中，我们迎来了1942年，也迎来了新的战斗，新的胜利。

笛崗浴血

严雨霖

情报、紧急情报，一份接一份地传来。日军纠集了五万余人马，从临沂、莒县、沂水、蒙阴等县拉开大网，向沂蒙山区汹涌滚来。“大扫荡”开始了。我们山东军区特务营，护卫着军区领导机关，离开了甲子山区，越过沂蒙公路，向西北方向转移。

入夜，到了蒙阴东南的桃花坪。首长决定部队在这里休息一宿。按战斗部署布置好岗哨以后，已经是深夜了。

在营部狭窄的小屋里，黯淡的灯光摇曳着。我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各连的宿营报告，忽然一声枪响从远处传来。在这局势十分紧张的时候，担任警卫的只有我们一个营，我心里怎能平静呢？我匆匆向外跑去。

通信员迎面跑来：“报告营长，西北方向有枪声……”

接着，派往西北方向去的侦察员也回来报告：“蒙阴方面发现敌人！”

一切迹象表明敌人合围上来了。我一面派侦察员给首长送去情报，一面命令通信员传令各连集合，准备战斗。

根据首长的指示，我们立刻以两个连作前导，一个连为后卫，迅速向东转移。大约半夜时分，来到临朐县八区境内，前面又发现了敌人。为了避开敌人，我们又折回头南奔沐水、马站一带，准备寻找敌人的空隙，冲向外线。

抵近笛崗山的东麓时，天快亮了。情报又连续传来：

“沐水、马站一带发现敌人骑兵！”

“南面沂水的敌人向北开来！”

“西南蒙阴的敌人占领了桃花坪！”

“……”

被包围了！我预感到一场激战即将来临，迅速打开了匣枪的外套，扳起机头。



部队停在路旁，我匆匆地巡视了各个连队。战士们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我，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里射出坚毅的光芒，那肃穆的神色好像在说：“我们懂得怎样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下命令吧！”

我一边走，思潮也在不断起伏：凭着我们的500个战士，杀开一条血路，保卫首长和机关冲出去；或者我们把敌人吸引过来，给首长和机关闪出一条空隙……第二个念头像一根大钉扎在心里，越扎越牢。我想，只要省长和领导机关能安全地转移出去，就不怕流血牺牲。我慢慢地向首长跟前走去。

王建安副司令员站在路边一个土坡上，两臂背在身后，凝视着笛崮山。我知道他在思考什么，便停在一边。久久地沉默着……

“严营长！”他的声音坚毅而严厉，把我从沉默中唤醒。

我答应一声：“有！”

“占领笛崮山！”他目光炯炯注视着我，“准备战斗！”

我带领部队爬上笛崮山。王副司令员也紧跟在后面。

笛崮是一座东西一里来路、南北不到半里的小山。遍山岩石嶙峋，山头有一圈倒塌了的围墙和几处破屋断壁。东面是十多丈高的悬崖，石壁刀切似的齐陡，下面是一条铺满卵石的干涸河床；西面和南面是平坦的山坡，可以攀登；东北面一里多远的地方，有一块小高地，像一个卫士捍卫着主峰。

王副司令员把地形察看了一遍，指着东北面的小高地对我说：“在那里放一个排，作为笛崮主峰的前哨阵地。其余的部队以西面和南面为主要防御面。尤其是西面，要特别注意！”他强调指明容易被敌人突破的地方。

“是！首长。”我一面回答，一面在心里琢磨：该派哪个排到小高地去呢？谁带去好呢？这时候，他看了看表，严肃地说：“军区领导机关的安危，就要看你们这一天的战斗了！记住，一定要坚持到黄昏。坚持到黄昏，就是胜利。要顶到黄昏，最重要的是用各种方法保存你们的战斗力！”

首长的指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立即回到营的指挥位置上。

向小高地去的一个排出发了。我久久地目送着他们，直到那30多个健壮的身影完全消失在昏暗的夜幕中。这是全营战斗力最强的一个排，天亮以后他们就要首当其冲地投入战斗。通信员把一连连长和指导员请来了。我对他们说：“你们连是红军的底子，是有光荣历

史的连队……”

“营长！”连长王继贤打断了我的话：“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代表全连的同志请求把我们放在西边！”

指导员谢训也紧接着说：“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只要有一人一枪，决不离开前沿一步。”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紧紧地握着他俩的手嘱咐说：“要记住，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坚持到天黑。要注意保存力量，经常放在前沿的部队不能超过一个排。你们不到万分危急的关口，我决不给预备队！”“行！”王继贤一把抓住谢训说：

“老谢，我先上，你隐蔽，不到紧要的关口你就别出来。”这个急性子，说完以后，又孩子般地笑了。

部队进入阵地后，就构筑工事。狭小的笛崮山立刻响起了铁锹、铁镐的声浪。

天色渐渐亮了，曙光中模模糊糊看到敌人的骑兵在周围巡逻，步兵也正在向我蠕动。

霎时，远处一阵轰鸣，随着刺耳的尖啸声，东北小高地立刻升起一团团黑烟，敌人开始炮击了！战士们都伏在围墙后面，全神贯注地望着小高地。我也把身子探出工事，注视着那里的动静。可是，除了浓密的烟雾之外，什么也看不清。

猛烈的炮击持续了40多分钟，才渐渐地稀疏下来，停止了。接着，暴风骤雨般的枪声和手榴弹声，越响越凶。我几次暗暗地问自己：“应不应该派一个排去增援？”每当这个问号一出现，王副司令员的指示便立刻在我心中回荡起来：“……要顶到黄昏，最重要的是用各种方法保存你们的战斗力……”理智一次又一次压抑住了内心的激动。是啊，面对着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换取一整天时间。现在仅仅是开始，每一个人，每一粒枪弹，都需要珍惜、再珍惜！

一个钟头以后，枪声稀落下来，小高地周围的烟雾消散了，山头上露出了一面日本旗。我跳起来，放开喉咙喊道：“同志们！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为烈士们报仇！”

“报仇！报仇！报仇！阵地上立刻响起一片悲壮、激昂的呼声。我看着战士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誓死不屈的光芒。

十点三十分左右，北面大坪山上敌人的炮群，又袭击笛崮主峰了。山上硝烟弥漫，弹片和石块乱飞，不少同志负了伤。

敌人从三面发起了猛攻。闪着寒光的刺刀步步逼近。王继贤同志在前沿阵地上跑来跑去，指挥部队反击敌人。一排排手榴弹倾泻下去，敌人尸体越积越多。我们的伤亡也在不断增加。但战士们以坚强的意志和惊人

的勇敢，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午后一点多钟的时候，各连相继报告：手榴弹打光了。正在这时，西面的敌人冲上了一连的阵地前沿。只见王继贤同志带着十几名战士跳出工事，与敌人拼了刺刀。战士们激昂的呼号声，敌人尖厉的嚎叫声和刺刀撞击声响成一片。经过20多分钟的厮杀，敌人终于遗弃下10多具尸体，溃退下去。

又是一阵沉寂。王继贤同志匆匆地跑到我的面前，只喊了一声：“营长……”便停了下来。他满脸汗水和烟尘，棉衣裂开许多口子，手臂和腿上有几处血迹斑斑的刀痕。我明白他的来意，他需要增援。正当我考虑不应该给他增加兵力时，只见他紧皱了一下眉头，又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轻声地说：“营长，我回去啦！”说完，用力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抽身便向前沿跑去。我望着他的身影，想着他刚才把冲到口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还有那微笑的表情，心里有说不出的自豪。可是，就在他接近前沿的时候，一颗炮弹爆炸了。烟雾消散后，我扫视了一遍整个阵地，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我的心立刻一阵紧似一阵地收缩起来，视线也渐渐模糊了。我强忍着悲痛，厉声命令道：“谢训同志，带一个排上去。”我也跟随队伍冲到了前沿。

4点多钟的时候，军区机关的参谋、干事和首长的警卫人员都投入了战斗。离天黑还有两个多小时，我感到时间实在过得太慢，太阳迟迟地不落，恨不得一脚把它踢开！

在敌人第八次冲击的时候，谢训同志也负了重伤。他抹着脸上的鲜血，吃力地站起来，挥动着右手，激昂地喊着：“同志们！坚持到最后……”接着身体摇晃了一下，倒在地上。我扑到他身上，用力推着，大声喊着。可他一声也不回答，渐渐地合上了双眼。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久久盼望的时刻终于到了。

王副司令员叫我去受领新的任务。我抹了抹脸上的泥垢，整理了一下被弹片划破了的军衣。

他站在一块大光石的旁边。我跑上去，规规矩矩地敬了个礼。他点了点头，抓住我的手，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

首长亲切的话语，使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问首长有什么指示。王副司令员说：“现在我带机关突围，你带着战士们在这里钳制敌人兵力。我们走后二十分钟至半小时，你们就迅速撤退。记住，要机动灵活，懂吗？”他一口气说完了要说的话。

我肯定地回答：“懂啦！”随后又不安地加了一句：“没有部队保卫，首长们可要小心啊！”

“放心吧！我们都是战士，都可以战斗！”他笑了，

我也笑了。

机关已经走了，我不安地倾听着机关突围的方向，不断地看着表。战士们也不断地向我询问着时间。多么漫长的时刻啊！二十分钟终于过去了，仍没有传来枪声，大家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是今天第一次感到了轻松。

敌人十分清楚，天黑以后对他们非常不利，因此冲击一次紧接一次。我们只剩下14个同志，敌人最后一次冲击又开始了。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敌人，从三面步步向我们围拢。东面的倒下去，西边的又拥上来。打得正激烈的时候，一个战士忽然小声对我说：“营长，没子弹了！我问了一下其他人，每人也只剩下几发。敌人更加逼近了。根据时间判断，首长和机关已经突出了重围，于是我命令大家边打边撤。我们轮番掩护，敌人步步不离，紧紧跟来，退到东面悬崖顶上，再也无处可退了！”

一个战士看了看悬崖，轻轻地问：“营长，首长和机关能安全转移出去吗？”当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以后，轻松地说：“这就好了！”

大家站在悬崖上，谁也不说话，一齐看着我。我看了看每个同志，问道：“同志们，我们是什么队伍？”一声响亮的回答：“我们是人民的战士，共产党的队伍。”

“能让敌人抓活的吗？”

“不能！”

忽然，14个同志一下围拢起来，紧紧地抱着，互相看着，没有恐惧，没有悲伤，眼睛里充满了对敌人的无比的仇恨。沉默了许久，一声高呼迸裂：“跳！”一个高大的身影随即飞下悬崖。接着，一个跟一个，紧抱着枪，像一群雄鹰似的飞向深谷……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一阵剧痛，把我唤醒。我强力睁开眼睛，可是什么也看不清，只觉得昏昏沉沉，天旋地转。我索性合上眼，尽量追忆过去的一切，但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想不起来。“活着，我还活着。”这个念头一出现，立刻便苏醒过来。我伸手摸了摸四周，那大大小小的卵石，使我想起是在笛窑的悬崖下边，接着又听到一些轻微的呻吟声，于是又想起还有十三个同志……

我用力翻了个身，吐出摔掉了的四颗牙齿，一寸一寸向着发出呻吟的地方爬去。刚爬了几步，头上的冷汗直冒，浑身一轻，又昏厥过去……

大约又过了两个钟头，我才勉强能坐起来。我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去找其他的同志。六位同志牺牲了，另外七位也都已苏醒。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趁夜里坚持着爬出去。于是，我们带上武器，悄悄地向西方，向着

机关突围的方向爬去。

白天钻山沟，晚上找部队，艰难地奔波了五天五夜，终于在马牧池镇上找到了军区司令部。

在一个大院里，我们八个人互相搀扶着排好队。王建安副司令员来了，我喊了一声立正，转身向他敬礼：“首长，军区特务营完成任务，向您报告！”

首长匆匆走向队列，从排头起，一个一个握手，一个一个从上到下地看着我们。然后走到我面前，紧握着我的手，只说出一个“就”字便停住了。我点了点头，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他紧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转向全体同志，庄重地说：“同志们！不要悲伤！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要更勇敢地战斗，为那些光荣牺牲的同志报仇！”

我抬起头来，看了看其他七位同志，个个昂首挺胸，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我镇静了一下，又问：“首长，那天转移顺利吗？同志们都安全？”

“安全，没有和敌人接触，全部顺利转移出来了。”首长满意地说，接着递给我一张报纸。一眼看到一排大字——《笛窑突围记》，我贪婪地看着：“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立刻，那与敌人厮杀着的王继贤同志，那身负重伤仍指挥战斗的谢训同志，那纵身跳下悬崖的身影……壮烈的场面一个个重现在眼前……

沂蒙山雄伟地耸立着，它象征着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意志。浴血笛窑的烈士们的坚强精神，像巍峨的沂蒙山一样，万古长存，永垂不朽。



八路军向日寇发起冲锋

乾隆皇帝与郯城 (连载)

刘卫星 孙长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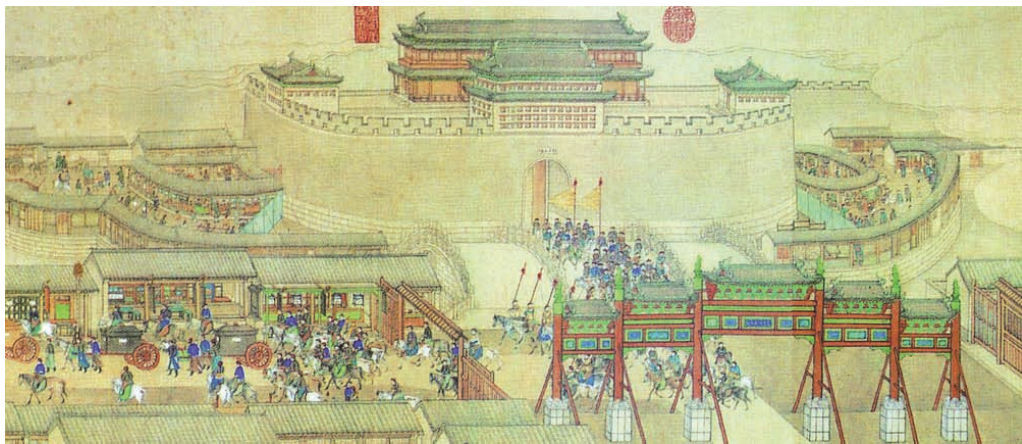
乾隆皇帝在郯城的诗联

乾隆皇帝酷爱写诗作联，常与臣下互相赠答，以联络感情。在郯城期间，乾隆也留下了三首“御制诗”和两幅“御制联”，我们不妨一睹为快。

(一)

龟蒙回望数峰尖，大野春光取次拈，
人意贪程催马策，晴曦送暖入车檐。
江声迎客行行近，诗趣和春旋旋添。
老幼初逢清蹕至，羽林呵禁莫教严。

这首七律写于乾隆十六年二月二日，皇帝初次南巡，兴致勃勃。据《沂州府志》记载，乾隆正月三十日驻蹕蒙阴桃墟西，二月一日驻蹕兰山黄梅岩，还绕到费县兴龙庄观赏蒙山雪色。从诗中看出，二月二日清晨即踏入郯城县境，忽见郯城四野开阔，大道平坦。回首背后是蒙山群峰，高耸云端；遥想前面有大江奔流，涛声拍岸；眼前却是晴曦送暖，春光无限，诗情画意，信手可拈。再看到郯城民众，老幼躬迎，触发了这位帝王的恻隐之心，迅速传令警卫人员，吆喝回避之声不要过于严苛。总的看来，此诗有景有情，对仗工整。诗中“龟蒙”一词出自《诗·鲁颂》：“奄有龟蒙”，此处系指蒙山；“清蹕”一词出典于《周礼·下官》，意指帝王出行时开路清道，禁止通行。



乾隆南巡图



(二)

观民指吴会，按顿莅郟墟。
少昊嗣封后，春风驻节余。
何当庭馆此，为愧盱宵予。
一宿园其籍，千秋迹信诸。
既成斯不说，至止偶相与。
谁与徵倾盖，因之试访书。

这首诗写于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二日，皇帝住在新建成的郟子花园行宫里，咏古抒怀。先说自己是视察民情风俗，主要目标是去江南的都会。今天在郟国的故城停留，是因为这里是少昊氏嗣封的地方，郟子为少昊氏苗裔，由来最古，春风常驻。接着话题一转：你们何必建造这样豪华的行宫在这里，这让我很惭愧，因为忙得不可开交，天黑了才能吃上饭，天不亮就得穿衣起床。我勤于政务，顾不得多住。以后不要再建造行宫，劳民伤财了。到此为止，下不为例。——说是说，做归做，乾隆在这座行宫里喜形于色，又是接见乡绅官吏，又是相互送礼品。还在这座行宫内御制对联一幅。其联是：

山容积雪融和盎
物象熙春迭荡披

应该说，乾隆的知识丰厚，诗词和对联中典故很多，所以又十分晦涩，不易读懂。诗中“盱宵”一词出自《左传》，意为帝王因心忧国事而劳碌。作为成语的“盱食宵衣”则出自南北朝时期郟城籍的文学家徐陵的《陈文帝哀册文》：勤民听政，盱食宵衣。联中“熙春”一词出自潘岳的《闲居赋》，意为和煦的春天，“迭荡”一词典出《汉书·礼乐志》，意为开阔清朗，其中“迭”字甚为冷僻。引典过多可能是乾隆诗词不受人欢迎而流传不广的重要原因。

(三)

郟子当年鲁附庸，哪能近百里提封。
庙朝少昊官迷悉，园去由旬里计重。
何事边旁行馆筑，更兼点缀曲池溶。
虽云图省驼装费，舍欲为辞愧先惊。

这首诗作于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皇帝驻蹕在增建的问官里行宫。这座行宫有三折桥、四方亭、六方亭、八方亭、海棠亭和通座游廊，引起乾隆的兴趣，但品味诗作，同前篇相似，并无新意，让人很难恭维，或许我们尚未读懂。乾隆同时御制一幅楹联，也无脱俗之处。其联是：

满窗松石无非古
一层烟云总是春

关于乾隆在郟城御制的诗作和楹联，我们粗略介绍到这里。能否领略其中的帝王气概，或者探寻到里边的

深邃意蕴，唯望有文学鉴赏水平的同志进一步研究。

乾隆皇帝在郟城的传说

乾隆皇帝在郟城的巡幸，前四次都是在农历的二月初二，与郟城民谚“二月二日，龙抬头”正相巧合。在当时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况下，老百姓把皇帝看成真龙天子，企望他普降甘霖，为民造福。善良美好的愿望也就演化成许多美丽的传说。这些传说流传很广，变得各处讲法不一，笔者采摘部分，考其虚实。

(一) 采莲湖的传说

采莲湖位于城西南十公里处。传说乾隆下江南时路过此地，因湖水阻路，便停车换舟，后人于此建庙，留下了停车庙的庄名。当地还有这样的歌谣：春秋郟国郟子娘，采莲湖里寻欢畅；乾隆遨游十三省，就此登舟赴苏杭。

还有一则传说是：乾隆下江南住在郟城，游玩散心时，忽然西南飘来一阵香风。乾隆和贵妃便问左右：哪儿来这股香味？有人报告前面有一大湖，荷花盛开，碧叶接天，香气扑鼻，景色迷人。乾隆心里想既有此景，何不一游为乐。随即命令停车，派人找来小船，皇帝和皇妃驾起小船向湖心划去。游兴正浓时，贵妃伸手采摘几朵荷花、几支莲蓬，献给乾隆，皇帝龙颜大悦，将这片大湖命名为“采莲湖”。

关于采莲湖和乾隆的有关传说还有一些，但只能是传说。因为康熙十二年修成的《郟城县志》第一卷的“山川形胜”篇即有关于采莲湖的记载，称“采莲湖离县城二十里，夏月荷花盛茂，香闻数里，今淤为民田，湖已废。”这就是采莲湖之名早在乾隆南巡八十年之前就有，并且已经淤塞，也无需他再给赐名，更不可能在这儿弃车登舟下江南。

(二) 大红门的传说

郟城北关有几棵古槐（现尚存三棵），槐树后原有一个大宅院，大门漆成朱红色，上有插花兽行门楼。前面有座图为“凤凰戏牡丹”的影壁墙，墙体为瓷质烧成。院落宽敞，占地四至五亩，人称“大红门”。

相传乾隆皇帝南巡住在郟城时，随从们严格挑选美女到驾前伺候。北城有一位财主，财主有一个女儿正值豆蔻年华，出落得如花似玉，算得上大家闺秀，温柔娴静，因之被选中送往行宫。这位姑娘人很老实，十分腼腆，虽侍奉皇帝一夜却一直站在门后。三更时皇帝问道：“你要什么封？”姑娘听成“外面什么风？”立刻跑到门外看了看天气，是时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姑娘回禀皇帝说：“万岁，没有什么风。”拂晓之前，皇帝

又如前问了一遍，姑娘依然出屋查看，如实回答“没有风”。皇帝叹口气说：“不用封就不封了。”因此这位姑娘就没有被册封成嫔妃或贵人。以后这位姑娘终生未嫁，当然也无人敢娶。皇帝觉得过意不去，才令人修建前面所说的这一座大红门宅院，赏赐给这位姑娘。姑娘去世时，被单独官葬在南园的一大块墓地，时人称之为皇林（陵）。

此说在郟城四关流传甚广，不少老年人都曾见过大红门，也有人记得皇陵孤墓的位置。虽然说法逼真，可惜史料匮乏，难以考实。详查县志的“烈女传”，亦无这位姑娘的记载。目前仅能根据县志的“巡幸卷”分析，此事如能属实，当在乾隆后几次南巡之中。唯有今后发现野史笔记，方可进行印证。

乾隆在郟城的传说很多，仅举以上三例，尚且未能考实。总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乾隆是来过郟城次数最多、住的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又是实际执政时间最久，在民间影响最大的一位帝王，在他离开这个世界200年的今天，了解和发掘这段历史，对研究古郟文化和进行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的教育是有一定意义的。

乾隆皇帝在郟城的影响

乾隆皇帝是一位文治武功有所作为的皇帝，也是目前影视作品里最上镜的封建帝王。他那风流倜傥、潇洒自如的形象在观众脑海里已成定势，足见其社会影响之大。

乾隆南巡又是他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称赞他六下江南，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兴利除弊；也有人批评他六次南巡，靡费特甚，败坏世风，劳民伤财。《简明清史》举例说：“自北京至杭州往返六千里，途中修行宫三十处，以备驻蹕。所经之处，地方官吏前来接驾，还有耄民老妇、乡绅生监焚香俯于道旁，皇帝赐酒赐食，所费不资。就连饮水都是远道供应。在直隶境内，用香山静宜园的泉水；到德州入山东境，用济南珍珠泉水；过红花埠入江苏境，用镇江金山泉水；到浙江，用杭州虎跑泉水。皇帝这样奢侈，而下王公贵族文武官员无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由俭入奢，世风日下，这正是社会衰败和动荡的标志”。乾隆后期，贫富对立愈加尖锐，清朝从盛世的巅峰上逐渐跌落下来。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都说明，乾隆南巡的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乾隆皇帝南巡驻蹕在郟城，对郟城的实际影响自然也是很大的。对此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开放的心态进行客观、辩证的分析。一方面要看到乾隆是封建统治者的集中代表，他维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乾隆后期重用和珅，南巡时和珅伴驾索贿受贿，造成腐败之风兴起，对郟城社会风气肯定有些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还应看到乾隆南巡的主观意愿并非是挥霍国资，浪费财力，他来郟城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而其影响也是复杂的，是应该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乾隆在郟城的“临幸”主要目的是宣扬皇恩功德。下旨增加官员的薪俸，不过是笼络地方官员；反复题诗作联，无非是展示自己的才华；赠送礼品给下属无非是藻饰盛世，扩大皇室的影响。众所周知，影响是双向的、相互的、联动的。在扩大自己影响的同时也势必增加了郟城对外部的影响，提高郟城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高宗皇帝都高看郟城，反复眷顾郟城，省州民官自然也不再把少昊册封的古郟视为弹丸之地的蕞尔小邑了。六次巡幸，六次驻蹕，三十座行宫郟城居其二，必然提高了郟城的知名度。

其次，乾隆皇帝南巡，最终勘定山东与江南的御路交汇于郟城。营修驿站，拓宽御路，开发了郟城的交通，增强了郟城同外地的物资集散和交流。集市贸易兴盛，吸引了大批商贾缙绅。“四方往来、皇化旌节、南船北马、百业萃聚”，必然促进当时郟城经济的发展。

再次，乾隆皇帝在郟城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接见官吏，赠送文物，题诗作联。尤其他不断提到“问官倾盖”、“少昊封嗣”，都是对古郟文化的肯定和赞扬。郟城士民修建感恩亭，立碑颂德并且集碑成林，也均具有一定文化蕴涵。行宫、碑林和感恩亭的建立又吸引了众多外地的



名人学者，或来郟城旅游观光，或在胜境学艺献技。因此，乾隆的郟城之行无疑也促进了郟城文化事业的发展，即便对后世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最后，《郟城县志》载述：当时，“郟为省南下邑，接壤水乡，十岁九灾，民生甚苦。”明末清初，兵荒马乱，地震旱涝，灾害不断，老百姓经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乾隆能够“按顿莅郟墟”，并且每次都豁免赋税，加赈灾伤，有时还拨款兴修水利，“对倒塌房舍各给修理银两，凡贫民有牛无力喂养者，每头给银九钱”。这些举措客观上给人民群众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诚然，郟城在当时还是现世都是一个“弹丸之地”，而且乾隆巡视郟城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方面的获益也仅限于一定时空范围内。但就专一地域而言，乾隆对郟城的影响是正面为主，利大于弊的。现这位乾隆皇帝已久离人间，郟城人民则迎来了朝气蓬勃的21世纪。
(全文完)

从“县太爷”到阶下囚（连载）

——民国年间赣榆县长王佐良浮华与苍凉的人生

时 麟 王秋侠

辛亥革命爆发近一百周年了，在苏北、鲁东南一带，民间还经常提到一个乡土名人——王二大人。

“王二大人”名佐良（1872—1935），字纬宸。原山东省兰山县朱樊村（今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村）人。清光绪年间江西省南赣镇总兵王得胜次子。其人自民国元年（1912年）起，先后担任赣榆县民政长、县长，主政长达13年之久。当年民间皆以“二大人”称之。

王佐良自幼深得父爱。其父在江西任总兵期间，他随父攻读诗书、兵法。王得胜从江西卸任后不久，又奉两江总督之命复出组织海胜军。彼时，王佐良初长成，他踌躇满志，加入海胜军，协助年迈的父亲昼夜带兵巡海。

王佐良曾为自己的画像作“自嘲辞”，其文曰：“体不胖，貌不扬，须稀眉浓，鼻高颈长。声粗而壮，色白而黄，心直口快无留藏。幼习科举业，壮且事农桑。虽秀才不酸腐，当少爷不荒唐。分统海胜军，身此列戎装。备员资政院，国事得参详。十载知事，捍卫家乡。愿祝永为军人，吁！建功立业于疆场！”

王佐良身为将门之后，既有戍边卫国、跃马海疆的历练，又素有文才（光绪年间秀才）。宣统二年，他当选为山东省兰山县资政院议员，步入政界。



赣榆徐福祠

剿匪成名

清末民初，苏鲁交界地区土匪猖獗。当地有“羽山到磨山，毛贼出万千”之说。而当时赫赫有名的总兵府——王家大院，就处于这土匪最活跃的地区。

宣统二年九月九日（1911年1月11日），王佐良趁资政院休会之际赶回老家，会同侄子王沂华（胞兄王泽凤的养子），捐资成立团练，招募乡兵以保家。同时，他又出面找到沂防营管带李鲁卿，共商剿匪之事，得到李的支持。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举义。海州属地土匪趁世蜂起。赣榆县境内以孙秩坠、王西斗等为首的各路股匪也不断骚扰各地，对县城和青口镇造成极大威胁。

然而，此时的赣榆县城的守备力量却十分薄弱。知县曹运鹏面对日益严峻的匪情一筹莫展；县城和青口镇的绅董们则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清咸丰年间，捻军攻打赣榆城时，知县方钧恳请王佐良之父王得胜来守城，才打退强敌。如今，为了抗匪保城，知县曹运鹏也不得不到王家“搬救兵”。民国八年版《赣榆县续志》有如下记载：“知县曹运鹏以兵力不足制贼，时山东兰山县资政院议员王佐良，由京旋见招募自卫，所居朱樊村与县毗连，其先人尝助赣榆城守有功，以故曹令以旧义感说，乞助于佐良……”

曹令诚意相求，又是父亲曾经出战保护的县城面临灾难，使王佐良感到义不容辞。于是，他和侄子王沂华商定：把乡兵们拉出去剿匪。他们又找到沂防营管带李鲁卿，请派兵合力作战。

王家乡兵得沂防营兵勇相助，首先向县境西南的磨山一带匪窝发起攻势。但因人生地疏，初战不利。于是，王佐良和侄儿王沂华商定：再度变卖家产，招募更多的新乡兵。

宣统三年十月初一（1911年11月21日），王佐良仍借助于沂防营兵力，率乡兵第二次向末（磨）山周围的土匪发起围剿。在战斗中，王佐良叔侄俩身先士卒，亲冒矢石之险，四出堵截匪徒，终获大胜。次日，又乘胜克复驻糞庄湖（今东海县青湖镇）的盐防营垒。

王佐良剿匪战的烽烟未息，十月初二夜，海州盐务营又发生兵变。海州的绅、商界听说王家乡兵剿匪勇猛，便火速发函请求王佐良前去海州平乱。王佐良因父亲王得胜曾在海州当过武官，便欣然同意出兵。

初六，王佐良和侄子王沂华率兵去海州，路过大沙河时，听说王西斗匪帮正在浦南烧杀抢掠，便于初七日黎明带领团练乡兵包围了浦南，击毙了王西斗和不少匪徒，解救了浦南民众。随后，他们进驻海州，镇守海州城。

因王佐良多次剿匪有功，不久被江北行督蒋雁行委任为“海州军政支部长”，后又提升为陆军少将，领“三等文虎嘉禾勋章军政执法官官衔”。民国元年他到赣榆县主政以后，又兼任海属警备队统带官。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帝国出面诱胁革命军与袁世凯妥协，“调停”南北的对峙关系；来自山东的沂防营兵勇也打算撤回。赣榆境内的残匪闻风蠢蠢欲动。此时，王佐良已有军职。当他得知赣榆县城仅有练勇50人，难以自保，就劝县知事曹运鹏扩兵防匪。但曹运鹏竟以难筹军饷推诿不办。

这期间，县内匪首孙秩坠的叔父正被关押在县衙大牢里。一个因侵吞公款在押的县吏也被捕收监。他与孙的叔父串通，买通一名狱卒，让其捎信给孙秩坠——由他们做内应，攻打县城。

此事被泄密后，王佐良马上写信给曹，要曹杀掉在押土匪，并严查为土匪传信的“内鬼”，消除后患。谁知这位曹令不相信县牢里会有这种“闪失”，拖着不办。到了腊月中旬，土匪来攻城的风声越来越紧。王佐良只好急命驻糞庄湖的马队来赣榆，加强巡城兵力。

辛亥年腊月二十一日（1912年2月8日），县内的土匪行动之前，南面响水县的海匪竟突然窜来，偷袭县北部的海头圩。王佐良只好暂离赣榆县城，带盐防营和商团兵40多人前去剿灭。恰在这一夜，全县各路土匪聚数千之众，打开了县城。县令曹运鹏只好缒城逃往青口镇避难。

第二天（2月9日），曹运鹏会同赣榆县商会和青口团练局的绅董们，向江北行督发电，报告了土匪陷城之事，并表示赣榆县已归顺民国，请求派兵剿匪复城。行督府随后命令海州民政长、十三协统领何锋钰发兵赣榆剿匪。何到赣榆后，安排本县的商团兵、盐防营，以及由他带来的完字营，合兵于十四日攻城。经官兵的轮番攻击，土匪于二十一日夜弃城溃散。

县城克复后，避难于青口镇的全县乡政局长和董事们，按照民国的章程，酝酿推选县民政长。因县令曹运鹏在剿匪守城中无所作为，而王佐良近年在多次剿匪中出力最多，大家便一致推选王佐良出任此职。会后，有人将该提议致电在外地的赣榆县名流许鼎霖，由许首肯，再上报江北行督府，得到允准。

是非县官

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王佐良就任江苏省赣榆县第一任民政长。

王佐良上任后，匪势依然严峻——最近被赶出县城的匪首孙秩坠虽已在出逃途中丧命，但少数亡命之徒混迹于民间。特别是有个叫仲兆琚（仲八）的匪首，他的匪帮占县城那几天，搜获了不少钢枪弹药。他们退出县城时，人马也没受损失，留下了巨大隐患。

王佐良深知：要想稳定地方治安，就必须先制服土匪。为此，他上任之初便加强了城防的军事部署。同时，他决定成立有马、步卒共180人的县警备队，由王沂华任管带，平时维持县城治安，战事守城御敌；保留商团300人专守青口镇；由商会筹款招兵勇150人，购两艘大船，并借许鼎霖属下的海丰面粉公司小炮三门（带炮手），装备护航炮船，驻防海口。

四月，为加强城防设施，王佐良又报请上级批准，动用税银1407元重修城墙、县署和监狱。

六月，城防工程刚竣工，窝在羽山的仲兆琚股匪又窜来夹谷山骚扰。于是，王佐良亲率县警备队进击，将这股装备好、从没吃过亏的匪徒消灭殆尽。从此，周边地区每有土匪出现，王佐良都派王沂华带警备队出征，且所战皆胜。经一段时间的肃剿，各地土匪的气焰大为收敛。

王佐良见大股土匪已经溃败，就通过各种关系，对可以争取的匪徒加以安抚。对此，有些人便制造传言，说王佐良“通匪”、跟某些匪首订有“君子约定”。

但在对付罪大恶极的匪徒方面，王佐良从来不手软，而且他有权拍板定案，将罪犯“斩立决”。

除制匪之外，王佐良对手下办事人员的管理也较严厉。民国二年，钱粮房雇员周振宗欠库钱一千二百串，畏罪潜逃。他下令追捕治罪！周母多方借钱、把儿子的欠账还上后，周振宗悄悄地回了家。王佐良闻讯后，嫌周不来县里主动自首，便再次派人把周抓捕归案，终将周“明正典刑”。

作为县民政长兼警备队统带官，王佐良除了对付土匪之外，还要处理民事、政务、商贸以及海防等诸多事宜。而在这方面，因为有时会触及地方势力的利益，就必然要受到少数人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王佐良有时不得不权衡利弊、腾挪躲让，甚至违心行事。据有关资料：王佐良之所以能长期主政赣榆县，其为官之道有三招——

一是依附豪门。在当年赣榆县的豪门大户中，以青口镇的许家势力最大。其代表人物许鼎霖是当时著名的实业家、政界要员（王佐良出任赣榆县民政长，也是经许首肯的）。王佐良主政赣榆后，许鼎霖虽然在外地，可他的大儿子许仲来还在家主事，他的四弟许鼎馨（许四）是青口商会的头头，六弟许鼎年（许六）也在外地为官。为依附许家这样的地方权势，王佐良主政赣榆后，凡有公务大事都要请许四商议。民国元年春，许六探家后回任所，想借商团长姜佩之的白马骑。姜不在家，其卫兵陈鸿玉不敢做主。许六吃了“闭门羹”，不高兴。王佐良听说后，为了给足许六面子，立刻叫人传唤陈鸿玉到公堂训斥。谁知陈鸿玉不服，与之力争。他一怒之下，竟令人将陈推出处决。正因为王佐良对许家礼让，在外地的许鼎霖对他也多有关照。民国二年，复辟派张勋打算为赣榆县改派新县长，许鼎霖得知后，又说服张改变主意，保住了王佐良的官位。为



此，民国四年许鼎霖病逝后，王佐良再次表示，青口镇仍由许四主政，他不插手那里的事。

二是重用能人。王佐良当县官，除依靠许四之外，还有几个心腹，即县参议长李裕泽（李三）、师爷仲丹魁（仲二飞刀）和县农会长乔文澜。仲丹魁原是县议会的录事，由议长李裕泽推荐给王佐良。仲有辩才，善架讼，深通律例，很快就受到王佐良的重用。王、李、仲三人关系密切。狐假虎威，中饱私囊，是当年官僚手下幕客们的发财之道。仲丹魁原是穷人，可被聘入县署之后，不几年就纳妾置田，成为他的家乡仲官河村首富，这里自然有贪脏受贿嫌疑。而在百姓眼里，王佐良、李裕泽与仲丹魁是同伙，他俩也不可能干净，于是就有人编顺口溜：“赣榆县三个贼，王二、李三、仲丹魁！”

三是稳住基层。王佐良为保住自己的“宝座”，对各乡镇的绅董们也很注意团结，以利用他们为自己办事。民国九年，在上海求学的赣榆人陈文彬等控告王佐良，状子递到督军齐燮元和江苏省署那里。督军要省署办理，省长王瑚遂密派两位委员到赣榆查访。王佐良与李裕泽、仲丹魁得知后，急忙调动了全县的乡镇董事齐聚青口，求见省里来的委员，为其辩护。这两人回省里之后，赣榆县的乡董们又选出以沙河镇名流朱寿石为首的40名代表，于民国十年春赴南京为王佐良伸冤。他们除向王瑚请愿外，还通过督军署参议、赣榆籍人余念慈、督军署军官王天党等向督军齐燮元传话，终于“保王”成功。

王佐良主政赣榆县期间，不仅要承受上头“查访”的压力，还要应付下面舆论的困扰。如赣马镇玉带河旁有个金蟹泉，水质很好。清康熙四年，赣榆知县李俊友将其整修为井。后来井壁坍塌，成为平地。为此，王佐良出资把该泉整修为井，并立碑为记。可对于这件公益事，却有人说他挖井是为了破坏张某人家的风水。又如民国八年，《赣榆县续志》和《附编》修成后，他捐资付印，并为志书撰写《序言》。因他在行文中提到“先君子尝捐二百金助剞劂，兹编脱稿，将付手民，予也捐金如数。为邑之士，夫倡盖不乐观厥成，亦以继先人之志云尔。”——意思是，先父（王得胜）曾捐资帮助志书刻板印刷，他也捐出一样多的钱印制志书。然而，他写的这几句实话，也被说成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未完待续）



清军与农民起义军作战

明初临沭地方迁民史

临沭县史志办公室

临沭县现辖537个村庄，其中明代立村的324个，清代建村的118个。明初立村的达60%以上。在地名普查工作中经查阅史料，寻访故地，终于弄清了临沭一带立村较晚的来龙去脉。

临沭一带属龙山文化区，历史上虽属古州郡县之边陲，但城邑、村庄较密，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实施暴政，靠武力征服汉人，累至元朝末年，形成地旷人稀的局面。《明史》称“苛政猛如虎，徭役重如山”、“山东连歉，民不聊生”，致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刘福通聚众十万人，红巾裹头，号称红巾军，攻城破寨，驰骋黄淮流域，几乎三分天下有其二，先后与统治者抗争达13年之久。其中由毛贵率领的起义军，自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就转战山东一带，曾率领东路北伐军两次经过山东，一直打到大都附近之通县。所以山东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战乱之地鸡犬一空，村庄城邑多变成废墟。据《明史》记载，元末明初“山东、北平数千里沃野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藜莽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加之自然灾害，如水、旱、蝗、瘟疫、地震等连年不断，这就造成山东地旷人稀、“荒无人烟”的史实。

明初，朱元璋对天下来朝之府州县官说：“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生息（《明史·本纪》）。”为此，他采取的安邦定国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实施宽、狭乡之间移民的办法，即从人口稠密的地区迁民于人烟稀少的地区。据《续文献通考》记载：“太祖至成祖间，屡徙山西、浙江民于河南、山左（即山东）。”又据《明史》记载，朱元璋颁诏从山西迁民于山东，始于洪武四年，“徙山后（指山西、河北及内外长城之间地区）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明史·本纪》载：“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山东。”又，“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泌、汾州，令其丁多田少和无田之家分其丁田，以实河北、山东。”上述是从山西往山东迁民的史实，但据对临沭一带族谱碑碣的考查，这里从海东当路



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图

(今海州灌云县) 迁民者更多, 这是由临沭一带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从山西洪洞县迁民

元末, 山东几乎成了“无人区”, 而山西凭借天险屏障, 多次战乱均未波及, 加之镇守山西的蒙古族名将察汗贴木儿和其子扩廓贴木儿统治严厉, 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生产得以发展, 生齿日繁, 成了人稠地狭的地区。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 为均衡人口分布, 发展生产, 恢复中原经济, 富国强兵, 采取了移民措施, 首迁山西之民于山东。当时的移民机构就设在洪洞县广济寺内, 所有移民均在此集结。寺内有棵大槐树, 移民们临行前在树下倾诉离恨别情, 或者以志不忘其本, 故临沭一带谱牒碑碣中多有某某始祖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老鹳窝”等迁居的记载。旺南庄《王氏族谱》载“我王氏一族传籍山西洪洞县, 明至山东莱州府胶州, 历有年所……后迁旺南庄”; 西日晒《傅氏族谱》载“吾族始起于版筑间, 籍山西洪洞县, 明代遭元季之乱, 由虞虢徙鲁”。其他诸如曹界前《曹氏族谱》、周庄《贾氏族谱》, 都有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的记载。据调查统计, 临沭一带从山西移民的有李、王、曹、贾、刘、付等姓氏, 分居二十多个村庄, 民谣: “问我始祖来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山东琅琊人张守仁有诗一首, 把山东和山西紧密联系起来, 抒发了思乡寻根之情。诗云: “危楼翘首望西方, 旧事重提到古场, 五百年前人去国, 二千里外客思乡。霍峰遥共文峰秀, 汾水知如沂水长。万劫不离大槐树, 春风秋雨几沧桑。”

从海东当路迁民

查本县碑碣家谱, 明代立村的324个村庄, 从海东当路迁来立村者达120多个。夏庄《高氏族谱》载“我高氏始祖前明之初由海东卜居于郟之夏庄”, 现分居20多个村庄; 山里村《胡氏始祖墓碑》称, “吾始祖洪武时自东海黄泥岭来此第一峪村(山里村前)居焉”, 至今23世, 分居14个村庄; 黄峪《李氏族谱序》载“吾始祖来自海东当路, 据传因在元末明初事关红蝇作疫被迫外出……, 始祖李大公迁于山东沂州府兰山县夹谷山西大黄谷峪”, 现分居12个村庄; 吴家月庄民国十四年《重修族谱序》, 王山头《王氏族谱序》、杨楼杨氏、沙窝孙氏、白旄刘氏、卢官庄卢氏、季岭季氏等20多个姓氏族谱、碑碣都有从海东移民的记载。

明初, 海东“倭患”经常发生。《筹海图编》记载“倭患”仅洪武年间就达七次之多。朱元璋深恐危及明王朝的统治, 下令“寸帆不准下海”。这一禁令使沿海岛民无法谋生, 沿海商民无由致富。逼迫之下, 他们“市通寇转为商, 市禁则转商为寇”。此令越禁越乱, 进而采取“裁海政策”, 即岛民一律迁往内地。《云台山志》载“沿海一带地方将各岛所说村庄俱令迁移内境, 云台山以向在海中, 一并禁为海外……”当时, 临沭一带地旷人稀, 离海东云台山尤近, 因而海东十八村之民多迁至临沭一带。当路村靠近内地, 是进出云台山的必经之地, 故成为十八村民的集结地。所以族谱碑碣中的记载是查之有据, 言之可信的。

综上所述, 临沭一带在历史上曾是繁荣富庶之地。城邑村庄星罗棋布。元朝末年, 兵连祸结, 民不聊生, 或死或徙, 十室九空。明王朝为医治战争的创伤, 发展生产, 恢复中原经济, 采取移民政策, 故从山西洪洞县和海东当路十八村两处迁来大量的移民立村定居。这就是临沭一带立村较晚的史实。

根植沂蒙沃土的艺苑奇葩 (连载)

——山东柳琴戏起源与发展概述

肖 民

欣逢盛世 花团锦簇

旧社会，柳琴戏及柳琴艺人社会地位很低，有时官府还以“淫词小曲，有伤风化”为由加以禁绝。除少数艺人曾到城市舞台演出外，绝大多数以“撂地摊”的形式在乡村流动演唱。再加大多数艺人是在草台班跟班学艺，很少有“坐科”的，因此，不仅倍受歧视，处境艰难，而且发展十分缓慢。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柳琴戏这一有着广大群众基础，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艺苑奇葩，也和兄弟剧种一起获得了新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早在建国之初，政府就把全省各地的流散艺人集中起来，先后在临沂、苍山、郯城、滕县、峄县（现枣庄市峄城区）等地成立起职业剧团。废止了旧的领班制，加强了党的领导，还为剧团配置了编剧、导演、音乐、舞美等专业人员。并大力培养青年演员，充实新生力量，为柳琴戏的发展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临沂市柳琴剧团为例，1953年9月经临沂地委、行署批准，正式成立临沂专区柳琴剧团。建团之后，广揽人才，并请京剧艺人帮助从身训到表演、化妆、舞美等进行系统培训和提高，使演员素质、艺术水准有了很大改观。主要演员李春生，还被送到北京，参加了中央文化部组织的全国戏曲演员讲习班。建团第二年，柳琴剧团即以《小书房》、《打干棒》等剧目参加了山东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张金兰、李春生、邵瑞武等，分别获得了演员一、二等奖。自此，临沂专区柳琴剧团名声大振，曾相继赴青岛、烟台、济南、



苏北、河南、安徽等地巡回演出，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经济效益也相当好，不仅使演员生活有了可靠保障，而且剧团的灯光、服装、道具也不断有所添置和更新。1956年又参加了山东省戏曲会演，张金兰和邵瑞武演出了《休丁香》，分别获得演员一、二等奖。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临沂地区柳琴剧团有演职员近百人，行当齐全，设备完善，已经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这期间，上演了大量的优秀传统剧目和现代戏，如《秦香莲》、《丝鸾记》、《三不愿意》、《打干棒》、《小书房》、《休丁香》、《灵堂花烛》、《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小女婿》、《小二黑结婚》、《沂河两岸》等。1964年，剧团以大型现代戏《青石峪》（地区剧目组集体创作，王慎斋执笔，庄兰田导演，李春生、邵瑞武、张金兰主演）参加了山东省现代戏汇演。同时还编演了数量可观的反映临沂人民治山治水、战天斗地，建设新农村事迹的现代戏。

十年动乱中，柳琴戏遭到很大破坏，剧团大部被解散。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恢复和又一次的蓬勃发展。苏鲁豫皖各省的剧团，纷纷恢复上演了遭禁的传统剧目，创作了大量新编历史剧和优秀现代戏。滕县柳琴剧团改编的聊斋故事剧《瑞云》参加山东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文艺演出活动，受到好评。临沂地区柳琴剧团，苍山县、郯城县柳琴剧团也获得了新生。他们在恢复上演优秀传统剧目的同时，创作演出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戏，参加省及省际艺术活动，得到了好评和奖励。如苍山县柳琴剧团编演的《虚实图》（李润德、裴恩亭、邢宝玉编剧）获山东省戏剧汇演二等奖。临沂地区柳琴剧团排演的《卧龙求凤》（编剧裴恩亭、王成君，导演吴华宁），参加山东省1982年戏剧演出月获优秀剧本、导演、表演等多项奖励；新编大型现代戏《彩石峪》（编剧张铁民，导演白节箴）参加苏鲁豫皖首届柳琴戏剧节，获优秀编剧、导演、表演、音乐等多项奖励；现代戏《蟹子湾》（编剧李绪臣，导演吴华宁）参加山东省艺术节暨苏鲁豫皖第二届柳琴戏剧节，获多项奖励；新编大型现代戏《沂蒙霜叶红》（编剧张铁民、吴华宁、赵从月，导演吴华宁）参加1991年山东省优秀舞台剧评奖，名列榜首。赴省参加了建党70周年献礼演出，获得好评。剧团还以《山里红》等小戏，参加中国剧协举办的‘博兴小戏节’，赢得了许多赞誉。

2007年，临沂市柳琴剧团创作、上演了大型新编历史故事戏《王祥卧鱼》（编剧张彭、张铁民、李应该，执笔李应该），同年，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和苏鲁豫皖四省区共同举办的“中国柳琴戏剧艺术节”，荣获优秀编剧、优秀导演等13项奖励。2008年，《王祥卧鱼》代表山东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得到了领导、专家、观众的肯定和喜爱。并获得了山东省艺术节银奖，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

我省滕县柳琴剧团的《山乡锣鼓》、《匡衡进京》也频频在山东省戏剧演出月中获奖。现代戏《山乡锣鼓》、大型新编历史剧《墨子》还曾进京演出，受到首都专家的赞许和观众的欢迎。

国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后，山东柳琴被戏先后列入山东省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源远流长的古老剧种，终于得到了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精心保护。

附：1、山东柳琴戏流布路线

2、山东柳琴戏演员世系及演员简介

附表一：

山东柳琴戏流布路线
(临沂地区)

郯 城

峰 县

滕 县

新 安 镇

邳 县

海 州 (淮海戏)

徐 州

大 路 东

大 路 西

滕 县

丰 县

涡 阳

沛 县

泗 阳

肖 县

泗 州

碭 山 县

灵 璧

蒙 城

宿 县

蚌 埠

滁 县

附表二:

山东柳琴戏演员世系及演员简介

(据1982年调查)

柳琴戏演员的数量很大，因没有文字资料可供查考，无法系统介绍。现将调查所知的部分演员(主要是家在山东的)，按其师徒辈份列表如下：

金 × ×

黄 × ×

× × × (佚名)

庄 王

× 从

× 明

杨顺宏 王增起 王同起 张维先 张维光 翟守宽

张 寰 刘 刘 冯 王 于 王 马 王 王 王 王 沈
仲 福 文 廷 士 玉 张 春 敬 春 富 春 桂 凤
怀 俊 义 文 选 凤 氏 怀 山 举 文 玲 银 云

刘延礼 邵瑞武 徐宝芹 于彩亭 张金兰等

(本组演员为马敬山、冯士选口述)

上表中的演员，自称为“黄门腿”。均为临沂地区人。主要活动在临沂、苏北等地，其中一部分也曾到皖北演唱。

金 × ×

邱 × ×

刘老四

田贵才 杨二和 曹礼吉 赵兴贵 姜玉太

盛	何	吴	吴	吴	梁	张	宋	陈	高	王	刘	孔	窦
连	从	彩	德	德	清	贵	成	庆	兴	守	福	宪	福
信	友	霞	俊	彪	玉	贤	仁	荣	富	坤	春	云	田

王	刘	曹	宋	陈	季	姚
顺	延	玉	月	怀	良	富
忠	忠	龙	英	英	奎	春

韩福起 姚秀云 等

(本组演员为曹玉龙、陈怀英、刘富春、季良奎、刘延忠口述)

上表中的演员，自称为“邱门腿”，绝大多数是临沂地区人，主要活动在郯城、苍山、新沂、邳县、东海一带，一部分人曾到皖北一带演唱。

邱××

鲁四大锤

赵 六 鲁茂珍 于洪胜 吴 四

赵	宋	刘	刘	王	张	郑	彭	刘	张	刘	梁
德	其	广	凤	丰	文	曰				广	学
胜	法	玉	山	臣	起	贵	三	恩	宽	森	惠

关	张	王	张	张	耿	喜	茂	薛	薛	李	张	董	李	李
洪	成	六			春			宝	继	忠	洪	凤	仁	忠
友	仁	春	二	三	田	春	春	兰	恩	志	春	和	贵	仁

董祥瑞 李春生 李厚山 孔春兰 等

(本组演员为李忠志等人口述)

上表中的演员全部都是临沂地区人，主要活动在临沂地区，也有一部分人曾到苏北、皖北演唱。

武大、武二

李金山 叶大戏 小 春

孟纪文 陈 二

李化邦 李光玺

刘衍庭 刘断先 马学成 等

(本组演员为马学成、刘衍庭等口述)

上表中的演员，除武大、武二为临沂地区（据传为沂水县）人外，其余均为现枣庄人，主要活动在峰县、徐州、涡阳、蒙城一带。

李文喜 袁玉梅 王青亮 吴庆芝

石仁玺 卜端品 刘嘉祥

刘沂海 赵崇喜 卜玉萍 王兆兴 冯自友

刘长春 等

(本组演员为刘沂海、王兆兴、冯自友等口述)

上表中的演员除刘嘉祥为临沂地区郯城人外，其余均为滕县人，主要活动在滕县、峰县、徐州一带。

邱×× (葛××张××)

马文肖 耿天宝

马从德 杨明忠 房友凤 徐超明

顾 姿 马 尹 尹 徐 魏
延 登 文 成 成 开 光
春 春 江 刚 潭 功 才

李 尹 尹 尹 尹 尹 李 庄 魏
进 春 佐 佐 佐 佐 兰 景 玉
富 玉 玲 东 俊 春 亭 福 楼

尹传合 尹桂霞 尹传启 左运乾 等

(本组演员为尹佐春等人口述)

以上六表中所列的演员，仅是按辈份排列的，不一定是直接的师承关系，其辈份也很难保证绝对正确。从表中不难看出邱××、黄××、武大、武二等人，对于拉魂腔的流传是有重大贡献的，在这一代艺人之前的金××，是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最早的拉魂腔艺人。

上述演员中，对柳琴戏影响较大的简述如下：

金××——事迹无法查考，距今约200多年前即演唱拉魂腔。

邱××、黄××——距今约200年，是早期拉魂腔最有影响的艺人，对于拉魂腔的形成、发展、流传贡献很大，被东路、南路拉魂腔艺人敬为祖师。

武大、武二——据传为沂水人，距今约200年，最先将拉魂腔传入峰县、徐州等地，对“肘鼓子”与拉魂腔的结合，做出过重要贡献，被中路拉魂腔艺人敬为祖师。

葛××、张××——据传与邱、黄同时，很可能也是早期拉魂腔非常有影响的艺人。

梁学惠——临沂地区郯城人，至今约110岁左右，主要活动在临沂一带，传授艺徒很多。他虚心好学，把从京剧学来的锣鼓经应用到拉魂腔中去，为柳琴戏武场创始人之一。

卜端品——山东峄县人，至今约百岁，是滕县一带著名丑角。会戏多，演技高，很受群众欢迎。在滕县一带，提起拉魂腔演员，群众便讲“金妮银妮卜拉门”，卜拉门即卜端品。

刘嘉祥——艺名银妮，临沂地区郯城县人，至今约100多岁，为滕县早期享有盛名的艺人之一，对拉魂腔在滕县一带流传做出较大贡献。

石仁玺——艺名金妮，滕县人，为当时滕县一带有名艺人，23岁去世。

田承玉——郯城人，他在梁学惠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拉魂腔的打击乐，并把一套比较完整的锣鼓经传到峄县、徐州、滕县等地，对拉魂腔武场的发展贡献最大。

王兆兴——滕县人，唱大生，在滕县、徐州一带很有名。

冯自友——泗水人，现年79岁，在滕县一带很有名，至今仍会唱锣鼓铎子。

赵崇喜——滕县人，自幼随母学艺，在峄、滕、徐州一带较有影响。

刘衍庭——峄县人，12岁学艺。后参加徐州柳琴剧团。

马学成——峄县人，15岁学艺。会戏较多，经常外出教戏，曾到徐州柳琴剧团传授剧目，训练学员。

冯士选——郯城县人，现年75岁。16岁学艺，早年唱旦角，后改唱生，活动在小陇海、峄、滕、蚌埠等地。1953年加入临沂柳琴剧团。他会戏多，做戏认真、细腻，影响很大，颇受艺人们敬重，曾灌制《三击掌》唱片。

李忠志——苍山县人，8岁学艺，14岁从师梁学惠，1953年加入临沂柳琴剧团。他会戏多，发展全面，为挖掘传统剧目做出较大贡献。

张金兰——郯城县人，中国戏协会员，曾任临沂县政协委员。6岁学艺，1953年加入临沂柳琴剧团。曾获山东省戏曲观摩汇演大会演员一等奖，并灌制《丝鸾记》、《王三姐剃菜》等戏的唱片。

李春生——郯城人，11岁学艺，1953年加入临沂柳琴剧团。他是一位唱、做、念、打均有较高造诣的优秀演员，曾被保送至中国戏曲班进修。1956年在山东戏曲观摩汇演大会上获演员一等奖，并灌制《丝鸾记》等剧目唱片。

(全文完)



柳琴戏迷

鼓词《民国十七年太平歌》注释

高雷

手抄本鼓词《民国十七年太平歌》发现于河东区汤河镇，鼓词曾是杨花柳絮，春风一度，每个街面上都有的说唱艺术。然而时光不再，几十年的光景，这种艺术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我们才能体会到它的珍贵。全册鼓词，只有一首是抄录了蒲松龄先生的《问天》，并由郯城秀才张宝信作注，其他部分经对照现存鼓词目录，不见经传，应为演唱者自己撰写。精彩部分就表现在这里。

今年是辛亥革命成功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革命的历程波澜起伏，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北伐之所以胜利，中国共产党所以在沂蒙山区立住脚跟并得以发展，鼓词《民国十七年太平歌》作了很好的注解。

此篇以朴实无华，犀利生动的笔触，客观真实的描写了大革命时期沂蒙山区的生存环境和临沂人民的历史追求。现注释如下。

民国十七年如何，春上有雨夏天里干，要紧就是年成坏，又少吃来又缺穿，地里不打白瞪眼，嗑呀唆唆，要做买卖缺少本钱，缺少本钱。

正月里来春气和，到处联庄创地甚多，拧垂子枪头打一个，葛杈杆锯半截，拉牛就



山东大鼓演出资料

是吹别列，唛呀唛哟，加钢的刺子腰里就掖，腰里就掖。

注：（1）联庄指联庄会，民间自卫组织。（2）别列：方言，牛角号。（3）刺子：匕首。

二月里来龙头抬，湖马子占了旦彰街，刘东沂进城去报告，方军长把兵派，大野炮支在沟子崖，唛呀唛哟，前楚庄围子安着粮台，安着粮台。

注：（4）湖马子也称马子，土匪别称。（5）旦彰街，沟子崖，前楚庄均为地名，在今临沂市河东区汤河镇。（6）方军长：指方永昌，北洋军阀奉系直鲁联军第四军军长。

后二月里是上元，河东的马子又要招安，大臭、二臭、坠子把，大元宝、武占山，圈吉子也要做高官，唛呀唛哟，日本国发兵占了济南，占了济南。

注：（7）武占山：股匪首领，1928年春接受北洋军阀招安后复叛，后带队投靠北伐军为“苏鲁义军”先遣队。大臭，二臭等人不详。

三月里来艳阳天，方军长退却又上潍县，白塔保里查着路，丢了枪，甩了弹，撇了军装和洋面，唛呀唛哟，仅仅地剩了机关枪连，机关枪连。

注：（8）白塔保：今河东区太平镇白塔街。

四月里来南军来，临沂县城里四门大开，南军本是名誉好，招安队也正派，有告状的去办差，唛呀唛哟，花上了洋钱才得免灾，才得免灾。

注：（9）南军指北伐军之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

五月里来热难当，一个命令叫拆城墙，各营军队齐下手，搬垛口，刨土隍，不叫民人去帮忙，唛呀唛哟，南军的心眼真是更强，真是更强。

六月里来三伏天，蚂蚱的老家出在江南，拧着绳条往北过，豆子吃，棉花餐，各样的青苗不必打算，唛呀唛哟，谷子不掐，蜀黍不扞，蜀黍不扞。

注：（10）蜀黍：高粱。

七月里来七秋凉，招安队驻在相公庄，马子的亲人来告状，铙人的遭了殃，红眼鹌鹑来收枪，唛呀唛哟，大家小户俱都沾光，俱都沾光。

注：（11）招安队：此处指由北伐军招安的土匪赵家粉部编成的招安先遣队。（12）相公庄：今河东区相公镇驻地。（13）铙：方言，击打，射击。铙人的，指开枪打过马子的人。（14）红眼鹌鹑：被招安的土匪。



北伐军入城

八月里来月正圆，河东的马子又成万千，甄家沟素称保险地，开了火大半天，北门以里起狼烟，唛呀唆叻，里应外合杀得可怜，杀得可怜。

注：（15）甄家沟：今属莒南县相沟乡。

九月里来去登高，大寨里投降袁振去招，相公庄扎住队，县城门关得早，招安的委员他又跑了，唛呀唆叻，大小尤家这才糟糕，这才糟糕。

注：（16）大寨：今属河东区相公镇。（17）大、小尤家：今属河东区郑旺镇。

十月里来春小阳，茅子河以西甚是急慌，黑日就当白日过，各巷口派上岗，老婆头子也站墙，唛呀唆叻，提心吊胆怕打排枪，怕打排枪。

注：（18）茅子河：沭河别称。（19）急慌：方言，情况紧急。

十一月里来雪花飞，薛司令领兵又把贼围，贾家宅会长挂了彩，联庄会，警备队，齐声喝彩来助威，唛呀唆叻，虽然人少，没吃大亏，没吃大亏。

注：（20）薛司令：山东省第八区区长、警备队司令薛家斌。（21）贾家宅：今属河东区郑旺镇。

十二月里来叫过节，发下来大兵过了茅河，马子一阵全冲散，四不像情管捏，会上跟着抠死鳖，唛呀唆叻。老子民滋得唱太平歌，唱太平歌。

注：（22）大兵指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杨虎城部。（23）滋：方言，高兴。

我今唱罢太平歌，新国文明我再说说，不烧纸省钱钞，泥神搬富户捏，老婆头子再放脚，唛呀唆叻。婚配自由男女同乐，男女同乐。

民国十七年即公元1928年，此时国共第一次分手，而北伐正在进行。作为北伐前线沂蒙山区人民则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备受煎熬。全篇共为十五段，以时间为顺序，分六个层次，一条主线，采用步步递进的手法，表述了沂蒙人民的苦难和对太平的渴望。

全篇共分六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开篇的旱灾，作为全篇的铺垫，作者点到为止，虚写了百姓的啼饥号寒，同时表达作者为民请命的胸襟。

第二个层次是匪患，贯通全篇，这也是全篇的主线。自年初到年末，通篇表现了土匪的嚣张和衰亡。描绘了广大民众对土匪的刻骨仇恨与结社自保，其中更牵扯到了北洋军阀对土匪的先征讨后招安，国民革命军对土匪的先招安后征讨。

第三个层次描写的是兵灾。治国无能，盘剥百姓的北洋军阀，面对匪患，只会招安，终究被革命的大潮推出了历史的舞台。

第四个层次是叙述六月里的蝗灾。“豆子吃，棉花餐，各样的青苗不必打算，”颗粒无收，衣食无着，天灾人祸完全断绝了人民的生存希望。

第五个层次说的是兵匪一家，祸害百姓。那些打着国民革命军旗号的招安队，是货真价实的土匪，这更促成了民众的觉醒。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六个层次表现的是老百姓在国民革命军帮助下消灭土匪后无以言表的畅快，大家情不自禁，高歌太平。

作者的出身，手抄本中有所披露：“临沂县东乡相公庄，有一个道士剪发的和尚，自幼聪明好编戏，八仙桌，靠粉墙，闲来无事画书箱。”仅此而已。

张宝信评价此书说：“将古今不平之事，一一招出，编成艳段，以写其磊落肮脏之气，歌哭笑骂，皆是文章，虽稗词，实奇书也。”

无论如何，作为地方文献，鼓词《民国十七年太平歌》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洗礼所描绘的形象依然鲜亮照人，所涵盖的历史史实大于思想，对于研究民国地方史和革命根据地史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饱经雨露霜 其中苦酸甜

——忆念小古

钱勤来



王小古（1915-1982），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原名王崇古，又名笑古。江苏灌南县人。少年时代酷爱绘画，1937年考入苏州艺术专科学校，解放前在江苏东海、新浦一带教书。在苏州艺术专科学校肄业后，得江苏省画家唐鲁臣赏识，收为入室弟子。

时光匆匆，星移物换，王小古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

1965年我初来沂蒙，分在临沂师范，与王小古先生为同事。然而我到师范时，他却不在临沂。后来，在饭厅里，有人告诉我，这就是画家王小古。那个时候，画家、作家等等的头衔在人们的心目中分量是很重的，也决不像当今那样，画了几张画，写了几篇文章就自称什么家、什么家。于是，我与他开始交往。他是江苏灌南县人，虽离临沂不远，但在饮食习惯上却与我这个上海人比较接近。那个年代，正是沂蒙山区稻改成果辉煌的时刻，大米又好又便宜。我置办了一个小小的钢精锅，买上了大米，冬天经常在办公室焖米饭。焖米饭是一种技术，是一种习惯，也许是我们南方人的专利，临沂人往往是隔水而蒸饭。而小古却在行得很。有时，我去上课了，锅在炉子上，他对我挥挥手，意思是放心好了。等我沾着一身粉笔灰回来时，他已经把米饭做好了，也买好了菜。于是，我们同吃一锅饭，共尝一道菜。吃过饭，他就画画，我看他随意得很，只一二分钟，几只雏鸡在飘拂的柳条下栩栩如生，一纸稚态可掬的生命写意，一幅绝妙的水墨渲染。对他的艺术才华，我虽是初次领略，心中却暗暗称奇。但是，他的作画，令人叫绝的一幕是学生告诉我的。说是他在课堂上，把一张宣纸往墙上一挂，一言不发，侧身稍稍一瞄，挥起画笔，两抹三涂，意象迭出。可惜，我一直未能领略小古先生那种教师兼画家的奇特风采。我每当见他作画时，总是凝神聚志神采飞扬，这种不竭的灵感，大概也是比较少见的。小古先生在不经意中，曾经给我留下了许多幅画，我很喜欢，收藏在我的抽屉里。可惜后来在“破四旧”时，连同我多年的日记，均被付之一炬。

我到临沂十个月以后，也就是结识小古八个多月后，风暴来了。1966年6月15日下午，临沂一中的红卫兵们在临沂师范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于是，知识分子厄运临头了。小古是第一批“牛鬼蛇神”，当时有许多教师一夜之间被关进了“牛棚”。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在我心目中就是这么开始的。而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的文章，一夜之间风靡全国，大兴文字之狱，无限上纲上线，成为一种迫害知识分子的普遍的模式而屡试不爽。批判小古的所谓“战场”我无缘“加盟”，全校的批判王小古的大会上我是一名听众。现在记得起来的，他们所谓“罪行”是：他画了一幅雄鸡报晓图，画上有一只雄赳赳的独立的金鸡面对太阳高唱。于是，就由“公鸡”“太阳”变成为“攻击太阳”，“太阳”就是毛泽东，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嘛。他抄录了毛泽东的一首词，词牌为“水调歌头”，其中有两句是“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而“江”字误写成“沙”字，成

了“万里长沙横渡”。什么东西在“沙”里爬呢，王八而已，于是又是一条弥天大罪。而说得最邪乎的，也就是当时的所谓爆炸性材料，是说小古在某期的《中国青年》的封面所刊登的毛泽东头像上，写了“王小古”三字，在额头上写一王字，两只眼睛和一个鼻子上写上“小”字，嘴唇则改写成“古”字。这大概是王小古这个名字的不幸，如果换了另一名姓，就不可能改写得如此巧妙，天衣无缝。言之凿凿，落地有声，小古是要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小古成了专政对象，在校园中接受红卫兵的监督劳动，每夜在“牛棚”里写认罪书。

谁料风云又变，所谓“资反路线”被打倒了，造反派起来了，一大批受压迫的师生把矛头针对“工作组”和“走资派”，文化革命继续在延伸。只是“革命的对象”换了另一群人而已。小古于是得以暂时喘息。在那段时间里，我只见过他两次，他只是摇摇头，茂腔茂调对我说：“哪有这样的事啊”，神情显得十分无奈。也许是阴错阳差，也许我对他人心存好感，也许是他“大罪”连连，在前一段风云激荡的日子里，我俩竟什么关联都没有，事后想起来，真是要感谢上苍。如果当时把我弄到批判他的那个“战场”，情势会逼迫我身不由己，或多或少会说出一一些违心的、伤害小古的话语。这种结果没有出现，他见了我还能说几句真心话，但他已经不作画了，也不练字了。我想小古当时的内心一定是很苦涩的。

好景不长，1968年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小古又被作为专政对象了。也就是在这年的5月15日，我的父亲，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干部被迫害致死。小古与我一起劳动。那时候，“革命”得很，一个好端端的操场被开垦成农田，种上了大豆、小麦，收豆时节，我与小古两人，只是我们两人，一起背负着沉重的碌碡一遍又一遍地压着豆子。小古长我父亲三岁，平静之后，我常说：“小古，我该叫你王大爷了”。可那个时



王小古老师示范作画



候，我俩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在炎热的中午，我俩只是默默劳作，相对无言，唯有一声叹息。而那个时候的小古，我想，他内心一定很酸楚的。

谁料，更大的不幸在等待着又瘦又高的小古先生。1970年，所谓“一打三反”开始，小古曾悄悄对我说“他们给我照了相，不知什么意思。”我亦是以“待罪之身”出现于公众面前的“另册”中人，未敢多言，只是安慰他：大概都要这样做的吧。小古只是微微颌首，脸上一片迷茫。事实上，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操作了，小古注定是在劫难逃了。先是让我们去参观“一打三反”展览，其中赫然陈列着小古囚犯式的照片。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讲解员大概是出乎一种当时的语言习惯，说了一句“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小古同志”，众皆惊愕，她却浑然不觉，以后就不见其身影了。而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王小古与九中的校长张伯扬等在当时的工人俱乐部会场上被公开逮捕，关进了高墙之内。当时的场面是杀气腾腾、口号震天，核心材料还是那个在领袖脸上写字，我在会场上更是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感猛然袭来，心中像坠了一块大石头，令人欲哭无泪。

大概事过一年左右，我正在校办工厂劳作，一天上午，突然又见到了小古，他刚刚从狱中放出来，脸色苍白、浑身虚肿，我朝他含笑致意，却见他神情呆滞，怔怔地看了我几秒，一声不响。两天后，他被一辆拖拉机拉到相公庄去养猪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过了几年，听他一起相公劳动改造的同事回来说，小古的日子好过一点了，有些高层人士开始向他求字索画了。那段日子里，我又被下放了一次，已经离开临沂了。我只能在心中遥祝他早日解脱。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历史终于结束了本来不该发生的苦难。当我再度见到小古时，已经是1979年了，八年未见，他状态极佳。临时借住在聋哑学校，似乎又焕发了青春，侃侃而谈，带着往昔的自信，还有几分狂狷之气。其实，他只是一名流浪汉，他的问题远远没得到解决。我受王汝涛先生的委托，向小古说明我们正在选注《太平广记》，请他作几幅绢画作为彩色插页以壮此书声色。毕竟他已年愈六旬，又一眼半明，我怕他婉拒，因为画彩色绢画是很费功夫和眼力的，不料，他二话未说欣然同意，索去原文字稿，买来黄绢，专心致志地为我们配画，三卷《太平广



记选》一共配绢画16幅，稿费仅仅几百元，他还是兴致勃勃地与我们合作到底。进入80年代，对小古来说是一个创作丰收期，不足两年，他画了大约两千多幅画，其中还有应我之求为香港一位朋友画的工笔仕女图，我对小古的画路之宽广、思路之敏捷，惊讶不已。他又在培养后学，又为日本等友人作画，又在撰写一本国画专著，还时常出去写生，根本不像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可是，他的“恶政”罪还未解除，有人还公开扬言他就是一个反革命。说实话，象小古这样的文人，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在政治上是从不设防的，应该说是一头绵羊，一个弱者。面对政治的狂风暴雨，他只能逆来顺受，毫无抗争之力。说他在毛主席像上写他的名字，其实完全是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而要推翻它，却必须拿出证据。这就是荒唐年代的荒唐逻辑。但是“文革”结束的80年代初期，我们还在理直气壮的尊奉这种逻辑。小古对此百口难辩。好在他的妻子是九中(现二中)图书管理员，有点常识、有点经验，也有点心机。经她仔细查询，从《中国青年》出版的第一期，一直到“文革”前的最后一期，结果却大出某些人的意料，原来，《中国青年》的封面上从来没有刊过毛主席的画像，真是谢天谢地，终于可以还小古一身清白了。可又节外生枝，又有人说，是写在《红旗》杂志封面上的毛主席像上的。而《红旗》杂志的封面在文革前一直是白底红字、明快简洁的风格始终如一，谣言不攻自破。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文革”前的全国的所有杂志包括一些政治杂志，恐怕压根儿没有登过毛主席画像，我想，这还是要感谢他老人家的。

而小古就是背着如此沉重的精神十字架重返画坛，重新拿起笔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会焕发出一种生命的独特的风采，小古的艺术被人民所接受，被人民所喜爱，小古先生也就重新找到了他的人生坐标。他作画写字，谈艺育才，声名四播。终于，山东艺术学院要请他去做教授了。这个时候，小古的内心是宽实的，甜蜜的，他的艺术也在日臻完美。可偏偏在这个时候，他心脏病突发，遽然逝世。这不能不说是山东艺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的追悼会开得十分隆重，由当时的行署副专员高广田亲自主持，省艺术学院院长于希宁教授专程前来吊唁。小古作古，风范长存，小古可以安息了！

小古先生是一位知名画家，他的作品被很多人收藏，有人说，王小古的画作以牡丹最为出色，我并不是美术批评家，不敢妄作评论。但是，我对他全部画作中的其中一幅画感受最深。我曾经多次见到这幅画，面面上是一串成熟的葡萄，上题“饱经雨露霜，其中苦酸甜”两句诗，还有小古的印章及何时所画的题款。每当我见到此画，总是凝视良久，思绪万千，这是小古遗作的珍品之一，这两句题诗，似乎是对葡萄自然成熟过程的一种白描，然而它所蕴藉的形象的内涵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破的，她是小古先生沧桑人生的艺术写照，还是对生命意识的某种象征，只能见仁见智了。希望喜爱小古艺术的人，读过我的上述文字之后，对这幅画的感悟能萌生出某些新意，我也就十分欣慰了。



冠山记

王兆军

临沭有冠山，方数十里。山之阴多松柏，间有青檀，阳坡则杂树繁复，略无阙处。草木丘壑中，多有流泉涌出，其水清凉甘冽。山中有古道观，传为尹喜布道、张良成仙处。三国徐庶、唐将罗成亦曾寄身于此。观之侧有千年银杏，奇伟而繁茂。近年各处古迹得以重修，新镌老子五千言于摩崖之上，蔚为壮观。昔日荒径，皆植花草及楠竹。曲折之处，筑坝为塘，蓄泉为湖，更添几多清幽。游人置身其中，仰观俯察，体会烟霞氤氲，常有得道之感。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仙自何来，未为闻焉。又云，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龙行何方，亦未为闻焉。夫名灵之说，盖出乎一地之气韵。极地冰山，巍巍兮岩万仞，而寒气肃杀，故亲之者寡。古刹隐于沧海，茫茫兮不可及焉，而朝者众，何也？人有所亲敬、有所寄托也。乱世求安，盛世求福，身处污浊则叹莲荷之不染，困于奢靡则羨山野之无华，而心灵之求又远甚于衣食之需，是以山水每有体现，人辄给予附会，名灵于是生焉。冠山峰峦葱茏，涧谷清秀，外得简约而内涵生动，形而下者足以休闲身心，形而上者则可付诸性灵，虽不能羽化成仙，然游目骋怀，亦可悟大道于须臾，是以老少咸集，雅俗接踵，此冠山之所以兴隆也。

或曰：王侯将相，文治武功，而今安在哉？唯神仙故事、文人墨迹延绵不朽，足见百年事功不如方寸文章。非也。文人赋事，多有所据，史官记述，岂容雌黄。是必先有其人、其事、其功、其德，然后有史文比兴、传奇风流、化身精灵。阴阳交锋，则雷电并作；时势呼唤，则英雄辈出；民意所爱，则山水得名。

古蒙祠与万寿宫

李常松

古蒙祠与万寿宫位于蒙山主峰南麓，是游览蒙山主景区和攀登主峰龟蒙顶的起点。现在人们泛指蒙山万寿宫，主要包括西部古蒙祠和东部万寿宫两处古代建筑的遗址遗迹及其现存的近现代建筑，而古蒙祠和万寿宫在建筑时代、性质、特点和影响等多方面是各不相同的。

古蒙祠原称蒙祠，始建于西周初期，春秋时是颛臾国王主持祭祀蒙山神的主祭处，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颛臾是太昊后裔，夏商时已为东夷方国，西周初年周成王重新分封，令其附庸于鲁，主祭蒙山。由于时代久远，西周春秋时期颛臾国主祭蒙山的具体参与人员、时间、仪式等已不得而知，大致上讲每年在几个(如新年、立春、立秋等)相对固定的日子里，颛臾国王代表周天子，率文官武将一行前往蒙祠用黄土修筑的祭坛前虔诚叩拜，敬献祭品，宣读祭文，祈求蒙山神显灵，护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战国至清代官方祭祀蒙山神的活动时断时续，其时间、规格、规模、仪式等不尽相同。1981年4月，古蒙祠遗址中出土一件重达2000克的宋代亚腰形银锭（俗称银牌），该银锭是宋元时官方到古蒙祠祭祀蒙山神时按礼仪埋入祭坛前边土中的证据，为国家二级文物。同年广东文物走私分子黎某将其偷运海南岛，公安人员破案追回后现藏于平邑县博物馆。宋代熙宁八年(1075年)，神宗赵顼封颛臾王为灵显潜应侯后蒙祠一度改为灵仙庙。宣和五年(1123年)，徽宗赵



佶加封颛臾王为英烈昭济惠民王后又改称颛臾王庙。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诏去历代“岳镇”、“海渎”封号后改称古蒙祠。千百年来,古蒙祠历代崇祠蒙山神的祠址、沿革十分清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特别是宋代宣和五年以后)蒙山地区祭祀蒙山神的颛臾王庙很多,但西周春秋时期颛臾国主祭蒙山的蒙祠(如同泰山上只有一个主祭泰山的岱庙)只有今平邑县万寿宫西邻的古蒙祠一个。

关于历代蒙祠的建筑规模、形制,未见史书记载。清末民国时期,其地上祠庙建筑已毁,祭坛除西边部分被河水冲毁外大部分尚存。20世纪70年代,万寿宫林场在此翻整土地时祭坛大部分被毁,现仅原祭坛东部偏南一小段尚存。

万寿宫为道教建筑,原名玉虚观,始建于宋代,宋、金、元、明、清时期是蒙山地区最大的道观,在道教中地位很高,影响很大。玉虚观首任住持临沂人贾文,笃信道教,淡于荣利,乐于苦己利人,居此30余年,主持创建了玉虚观正殿三清殿等建筑。宣和元年(1119年),宋徽宗闻知后召进汴京为官,赐以度牒、紫衣、象笏,贾文坚辞不就,仍乞归蒙山,恬退自守,后在此坐化,上赐谥“清虚文成公”。金代玉虚观改称佑德观,贾文弟子周守先“知蒙山佑德观兼灵显庙事”,这一方面说明金代蒙山佑德观主持权力很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佑德观(即宋代玉虚观,今万寿宫)与灵显庙(古蒙祠)有所不同。金大定年间,该道观主持皇希金率道众在观内外广植松柏,树木成林后,“远近视之,若云气郁兴。数百步外,清风洒面,宛若洞宫仙府,不类人世”。明代佑德观复称玉虚观,后亦称玉虚万寿宫,清朝直称万寿宫。清康熙年间万寿宫香火极盛,时道观规模扩大,道众300多人。清末,曾任蒙山万寿宫兼白云岩清虚观道长高云溪,后升为道教第一丛林——北京白云观第20代主持方丈。慈禧太后封其为总道教司,管理全国道教事务。1938年,万寿宫尚住有道士100多名。

蒙山万寿宫与其附近的柘沟村,抗战初期曾是中共山东省委机关驻地。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发动了徂徕山起义,组织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简称“四支队”,洪涛任司令员(1938年5月洪涛病逝,廖容标任司令员。廖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省委书记黎玉兼任政委,赵杰任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林浩负责政治部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为扩大影响,同年3月3日,黎玉和赵杰率领山东省委机关及四支队一部进驻万寿宫和柘沟村,在这里抓紧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帮助地方建立党组织。中旬,省委在柘沟村组织成立了中共费县

工作委员会。3月28日,中共费县工委派平邑城南石崮庄村党员高锡贵作向导,护送省委书记黎玉从柘沟村出发去延安汇报工作。黎玉离开山东期间,林浩任省委代理书记兼四支队政委。现在柘沟村尚存黎玉、赵杰等住过的房屋,群众中还流传着省委书记黎玉与当地百姓和万寿宫道长友好相处的故事。为支援抗日,万寿宫道长捐出了部分粮食和护院枪支。

原万寿宫的主体建筑为正殿三清殿,殿内祀玉皇大帝,清代“凡朔望、万寿圣节(皇帝生日)、元正”供奉皇上万寿牌。配殿祀风神、雨神、雷神、财神、药王等诸神。万寿宫西侧贾成公祠,原为硬山式房屋建筑,始建于金皇统四年(1144年),清乾隆年间改为两层阁式建筑,底层仍称成公祠祀贾文,上层为纯阳阁祀吕洞宾。总的看,古蒙祠与万寿宫原来所有古建筑均体量较小,这主要是因受当时经济、技术条件限制,同时也与宋以后朝廷不太重视有关。进入21世纪,平邑县为加快蒙山旅游开发和古蒙祠、万寿宫的保护利用,投巨资在万寿宫及其附近陆续修建了蒙山广场、仿古街、沂蒙山地质公园地理标志碑、福寿康宁鼎、万寿宫玉皇殿等一批大型代表性文化建筑。古蒙祠、万寿宫已今非昔比。

随着古蒙祠、万寿宫景区景点的修复和交通、旅游设施的不断改进,蒙山知名度的提高,慕名前往该处旅游观光、度假的游客越来越多,省内外许多会议、培训活动在其附近的沂蒙人家、东山宾馆、职工之家举办。近几年,平邑县连续举办七届蒙山长寿文化旅游节,每届旅游节登山活动的起点和其他主要活动项目都在古蒙祠、万寿宫附近的蒙山广场举行。特别是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万寿宫庙会,期间,古蒙祠、万寿宫及其周围游人如织,众多善男信女成群结队到此烧香许愿,观看文艺表演,进行物资交流。万寿宫庙会已成为蒙山民俗旅游的一项重要内容。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东城门外关帝庙 (清末)

杨家巷杨新仗义 正气巷正气弘扬

临沂城普照寺后有一杨家巷，巷中有户杨姓人家，其祖在清代做过武官，到民国时已经没落了。这杨家有一子弟叫杨新，终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故以他为题的歇后语非常多，现在已无人知道了。1938年日军占领临沂后，这杨新倒做了一件大好事，弘扬了民族正气。

1939年夏，杨新手提画眉笼，拿着长烟袋，来到魏家巷东首的大槐树下乘凉。这棵大槐树像一把大伞盖一样遮住了这个十字路口，树下乘凉的、卖西瓜和小吃的甚多。当时，北面有一巷名叫正气巷，因巷中有座关帝庙，庙门上悬一匾，题曰“乾坤正气”。这巷中住着一大户人家。那天，此家中有一年轻妇女回住处，一名日本兵跟着进入，接着就听到这位妇女的呼叫声和日本兵的狞笑声，口口声声说：“花姑娘害怕的不要！”这时，乘凉的人无人敢去救人，这杨新不由自主地骂道：“你这些人不是中国人，见死不救，都没有种！”别人反唇相讥：“你有种，你为什么不去救？”这杨新道：“谁说我不去救，给我看着鸟笼，我这就去！”说着跑进了宅院，只见日本兵已将妇女按倒在地。这杨新见有一块大石头，顺手搬起向着日本兵的头上砸去，因用力甚猛，只听得哇啦一声，这日本兵已脑浆崩裂。这杨新骂道：“你奶奶的，回老家去吧！”说着和那位妇女跑了出来。这妇女给杨新磕了一个头，答谢恩人。众人知道杀死了日本兵大快人心，皆道：“杨大爷真是仗义！”

后来，侵略军到处抓人，但谁也没有说出是杨新杀的。风声紧时，信仰天主教的杨新夫人就把他藏在教堂内，直到他因病去世。纪家女子以女儿身份给他送葬，以报答他的救命之

恩。以后，众人皆道：“杨家巷杨新仗义，正气巷正气弘扬。”从此，临沂城又多了一句歇后语：“杨新杀日本——有种”。

关帝庙关公显圣 破戏台从此无戏

临沂城城隍庙南有一大戏楼，楼西路南有一尼姑庵，名唤衍庆庵。这庵西有一巷叫破戏台巷。这巷名从何而来呢？原来，这巷中路北有一关帝庙，庙南有一座戏台。每年旧历五月十三日逢庙会，还要唱戏三天，甚是热闹。但自民国后，每年只有庙会，而不再唱戏了。原因是在清光绪年间戏台上发生过一次事故，这就是传说中的“关公显圣”。

这年又逢旧历五月十三日关公庙会。戏台上正上演着关公戏《古城会》。只见那张飞正擂鼓三通，这关公手起刀落，那演蔡阳的演员立刻倒地，再也没有起来。原来是关公用力过猛，一刀正打在那演员的头上，致使其一时休克，后被扶起，并未死。但民间却传说，这是“关公显圣”木刀杀人。从此，再也不敢在这戏台上唱戏了。戏台也逐渐倒塌，成了个破戏台，那条巷也就叫破戏台巷了。

双井口真鬼遇假鬼 准提庵老尼救少女

“双井口”是城内有名的古井。此井甚大，上修双口，既保证提水人安全，又可两人同时提水。此井所处之巷就称“双井口巷”。却说这巷有一墙旮旯，正对着准提庵。夜间行人过此甚感可怕，并传说旮旯里有一“逼墙鬼”，故夜间行人多绕道而走。

1942年的一天夜晚，有一日本军官名叫小川，酒醉后到双井口南面的石巷去买糖炒栗子，边吃边哼着日本的胡歌野调，向着塘子巷走去，因塘子巷对过石头路东有日本的“慰安所”，欲去寻找作乐。正走到准提庵前，可巧有一中国少女从东走来。这位少女是为父治病刚从药店取药回来，见日本兵迎面而来，已经躲避不及了。她急中生智，闪身躲到墙旮旯，可是已被小川发现，大声喊道：“花姑娘的，大大的好！”这少女想到平时传说中“逼墙鬼”的故事，于是急中生智，散开头发，面上蒙一白手帕，回头向里。这小川一把将她转过来，这一转不要紧，展现在他面前的不是什么“花姑娘”，却是一个披头散发、白面无目鼻的女鬼。这小川登时被吓得哇啦一声倒地休克了。

且说双井口旁的准提庵内有尼姑三人，老者曰觉隋，其徒曰广慧，徒孙名大云。夜间正在打坐，庵外

的声音早已听到，急忙令大云开门观看。少女乘机逃进庵中，向老尼述说遇险的经过。于是，老尼姑将她藏了起来，继续念经打坐。这时正是隆冬，忽然下起一场大雪，这小川因无人搭救，就在雪中冻死了。天明后，日本兵找到了小川的尸体，未查出有伤，只好上报说是酒醉后被雪冻死。直到日本投降后，才从庵中传出少女吓死日本兵的故事。从此，双井口也就更有名气了。

九弯巷富豪征联 三孔桥秀才挥毫

临沂城内有一奇怪的巷名：九弯巷。原来，此巷东起北三孔桥巷，西至颜家巷，因曲曲折折，共有九道弯，故称“九弯巷”。这北三孔桥又名“一步三孔桥”，原来巷北是大水汪，怕行人夜间落水，故于汪边建墙挡住。为了排水又在墙下留有三个排水洞，故称一步三孔桥。因城南还有一处称“南三孔桥”，此即称“北三孔桥”。

这九弯巷东首原来住着一大户人家——颜府。因他家是复圣后裔，世袭五贤祠奉祀官。颜家还出了一位书法家颜世钦，但到民国时业已败落，将颜府卖给了大富豪钱光汉。这钱光汉本绿林出身，后被张勋招安，官至统领。张勋复辟失败后，钱光汉回到家乡临沂，买下整个颜府建成一座大的宅院。钱光汉干了不少坏事，成为临沂城的土豪劣绅。他感到九弯巷的名字不雅，东又靠三孔巷原名狱西巷，更是不吉。故他在春节时悬赏征求一副好的门联，言称选中者赏大洋一百元。且说这年正是年终腊尽，城内穷人最困难之际。城里热衷慈善事业的人正筹划救济善款。其中有清末秀才陈伯熙、商会会长蒋幼泉等人。商会义捐大洋百元，中医会议捐百元，但穷人甚多，钱还不够。此时，传来钱府悬赏征联的消息。老秀才刘宪邦说：“给我再多钱，也不给他撰联。”其他人也皆道：“钱三(他排行老三)为富不仁，谁也不给他写。”这时只有陈伯熙言道：“钱三之财乃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当以计取之，还给穷人，大家都知道《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吧，我甘愿撰联取来大洋，正好救济贫民。”大家一听，皆道有理。并言道：“你能撰写得什么好联，能被选中？”陈伯熙不慌不忙地提笔写了一联给大家观看。大家看后，皆道好联，定能选中，忙找来信封封好，差人送去钱府。却说这钱府中已收到不少的撰联，但皆未选中。忽见有人送来一联，连忙打开观看，只见上面写着：门外九曲天河，府在三山东嶽。

这时，钱三和几个帮闲连声道好：将九弯巷比作天河(传说天河有九道弯)将三孔改为三山，狱西改为东

嶽。这钱三问来人这是谁人所撰，那人道：“乃老秀才陈伯熙所撰。”这时一个帮闲又道：“钱老爷既已选中，就请老秀才给书写吧！”于是派人去接来陈伯熙，但陈伯熙却道，既要付撰联费，也要付书写费。这钱三满口答应。陈伯熙书罢，带走二百元大洋，正好完成了救济金的数目，让临沂城的贫民过了一个好年。从此，这钱府也年年贴着老秀才所撰的门联。

沂州府姚知府惹祸 唐公馆老师爷灭迹

清代沂州府衙门坐落在考棚街的东段，其路南是一处私人住宅，原先是一个马姓住宅，并建有花园，俗称马家花园。后来卖给了退隐的绍兴师爷唐乐臣。府衙与对过的唐公馆在清末发生过一件大案。原来，北京到南京跑文书的官道，自蒙阴进入临沂经过青驼寺、半程，直达府城。在府城如遇夜晚，跑文书的人可以住宿。但文书要放在知府大堂上保管。在清末光绪年间，一件文书泄密的大案就发生在沂州府。

这年冬天，从北京来了一件文书。当晚，文书包挂在知府大堂上，跑文书的人去休息了。这位知府叫姚联奎，晚上在花厅吸足鸦片烟后，忽然想偷看大堂上挂着的文书，命人取来拆开观看，因靠近烟灯太近，被火烧着，连忙灭火但已烧去一角。这可招来了大祸，《大清律》明文规定，私看文书是杀头大罪。这知府忙招来师爷，这师爷吓了一身冷汗。最后，这位师爷建议去找唐师爷想办法吧。这时，已过三更，命打着灯笼到对过的唐公馆，给看门的一吊钱，才给开门。可巧这位唐师爷也正在吸鸦片烟，见知府半夜来找，定有大事。忙问：“太尊，有何要事？”知府言明此事后，唐师爷也说事关重大。说着，只见更楼上打过了四更。他们更是着急，因为打过五更，跑文书的就要动身。这时，唐师爷忽然言道：“太尊，您说个数吧！”知府伸了一个手指，唐说：“不行！”，知府伸了两个手指，唐说：“这还差不多。你给我这个数(2000两)，我保住了你的人头，却害苦了多少个十年寒窗苦呀！”说着，将那文书丢进了火盆，登时灰飞烟灭，烧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把空文件袋封好，放进文书包。五更后让跑文书的人上路了。

文书到达南京后，当堂开读，打开一看是空信封。就知道中途出了问题，朝廷因无法追查，便将中途所经过住宿的州县的官员一律罢官。沂州知府早准备好行装回家了。这事直到民国后，那位唐师爷才敢对人言讲。他说，我为了这2000两银子，丧了良心，救了一个人，害了一大群人。最终，这件大案未能破案，唐师爷说出后才在民间流传。（未完待续）



老城一角（清末）

《沂蒙金文辑存》前言

王汝涛

《沂蒙金文辑存》编辑于1984年，作为国庆献礼工程，由张寿民先生题词、刘家骥先生选图、王汝涛先生审定并撰写前言，临沂众多专家参与编写的一部考古专著文稿。该书选材慎重、考据充分、集思广议，是研究东夷文化与山东境内方国的必备文献，其精华尽在前言之中，特予刊载。



王汝涛教授

临沂地区，远古时代，即为人类聚居、活动频繁的地区之一，经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不少古文化的遗存，陆续被发现：沂源县发现的猿人头盖骨和牙齿化石，莒南、日照、沂水、蒙阴发现的旧石器文化地点，均证明本地区的人类活动，至少可以上溯至距今四十余万年前。比较晚一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继临沂凤凰岭细石器遗址被发现，又接连沿沂、沭流域，在蒙阴、沂水、莒县、临沂、临沭、郯城境内发现了八十处遗存的地点，为研究我国细石器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至于属新石器时期的，无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遗址及器物，亦均在临沂户台、大范庄、日照东海峪、尧王城及莒县陵阳河等多处地方发现。而其中莒县陵阳河的陶文，临沂大范庄、户台的蛋壳陶，尤呈异彩，总之，从猿人时期到岳石文化，在我区都可以找到文化遗址或遗存，这说明这一地区的古代文化是源远流长并且持续不断地发展着的。对于了解我们的过去、了解中华民族的古老而灿烂的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区的这种古代文化，特别是新石器时期的文化，某些学者以为，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严文明先生在《龙山文化龙山时代》一文中说：“山东省运河以东的全部和江苏北部，仍然构成一个比较统一的文化区。”他在研究了岳石的石器和陶器之后，便作了一个推测：“这种文化的居民，应是夏代前后的夷人。考‘夷’文献资料或统称之为‘东夷’，或分别称之为‘莱夷’、‘九夷’、‘徐夷’、‘淮夷’等。其活动地区即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专治东夷的史学者以为：古代东夷文化不但自成一体，并且在当时毫不低于甚或高于华夏文化，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及其他文化相融合，才形成了灿烂多采的中华民族古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研究东夷文化。

可惜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这一地区的文化亦即东夷文化，好像突然泯灭、消失了。《后汉书》曾立《东夷列传》，上溯夏代，下及春秋，只是记载了夏、商、周三个王朝与东夷之间的多次战争，文化方面则失记。殷虚卜辞中有片段。涉及东夷材料者，亦少涉及文化范畴。《史记》立夏、殷二本纪，对于东夷，也只是记载他们或“叛”或服及屡遭征伐而已。并且，由于我区属于东夷腹地，王朝的军队一般深入不到这里，即使有关夷夏战争的记载，这个地区也不大被提到，只在《楚辞·天问》中提到了，“桀伐岷山（按，音转，岷山即蒙山），

何所得焉？”算是透露了位于我地区的一些封国及附庸国莒、郟、鄆、郕、向、鄆、颛臾等的名称，并且于叙鲁事时，间或记载他们的一些事迹。然而《春秋》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记载中把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视为“蛮夷之邦”，并不认为他们有很高的文化。

从有很高的文化，变成没有什么文化的蛮夷，这个突然的变化是否可信呢？即便可信，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而成的呢？这些，在文献资料中是一片空白。“无征不信”，给打算研究本地区这一阶段历史的人，带来不小的苦恼。

感谢我区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而这些字数或多或少的铭文，经过初步的辨认，已能发现它们提供了若干研究信息，而这些信息，恰恰可以部分地补上（由于字数及体例的限制，青铜铭文不能详细地记事）这一段空白。这一批器物上的铭文乃是极有价值的瑰宝，而器物本身的价值尚未计算在内。

先后陆续出土或收购集中的这一批青铜器，连同其铭文，相当大的一部分，曾在《考古》、《文物》及其他刊物上刊载文章予以报道。有关的铭文，也由专家学者作了考释。这些成果已经被应用于学术研究中，而还有一部分，尚未报道。我们考虑到，所收集到的这一批青铜器，已经具有铸作时代和国别齐全（就本地区范围而言）的特点，分散性的报道研究文章，很不容易涉及比较研究的范围，又，文章散见于各处，从整体研究时，一时又不易收集齐全。因而，将它们尽量收集在一起，排比整理，加上一些必要的研究工作，辑为一书，以供国内外研究者参考应用，乃是必要的工作。

本书收录范围，原先只限于解放后在临沂地区出土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后来为了便利研究工作，适当选入了解放后出土存于外地博物馆的我区器物 and 收录于解放前《山东金文集存》上的部分器物。统计收入一百一十五件。就时代而言，包括商、西周、春秋、战国四个时期。就器物而言，计有鼎、觶、鬲、盘、匜、豆、卣、尊、盃、壶、觚、爵、角、簋、罍、盆、斝、铃钟、戈和剑等，包括了几乎全部的礼器、酒器和兵器。就分布地点而言，我区县市，除沂南县外，都有器物出土。

铭文多者七十余字，少者一字，有一部分可判定为族徽，还有一小部分未能释出。根据铭文及族徽考察，器物的铸造者，有属于商代的部族（或方国）的史、巫、戎、举；属于周代（包括延续及于春秋）的诸侯国和城邑曾、费、郟、莒、專、郕、鄆、徐、莱、鲁、朱、诸、蒙、陈、黄等，另有显然是由外地注入的

器物，如左徒戈等。倘若与建国以前比较一下，便可以看出发掘收集的成果是巨大的。建国前，著录于《山东金文集存》、《两周金文辞大系》、《邃斋集古录》、《善斋吉金录》、《三代吉金文存》等书中的我区器物，不超于二、三十件（专指有铭文者），对这一地区商周史研究的文章付之缺如，大约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因此，可以预料，随着这一大批有铭文的器物问世，鲁东南古国史的研究、东夷文化的研究，大约可以开创一个新局面。




我们尚未来得及对这些铭文作综合的深入的研究，现在谨根据初步的考察、探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作引玉之砖，就教于专家学者之前。

（一）文献中，关于商代东夷活动情况，是有记载的，《后汉书·东夷列传》说：“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二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寔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诸夷内侵及蓝夷作寇事，诸书语焉不详，李白凤先生以为蓝夷作寇一事与《史记·殷本纪》中“仲丁迁都于囿”一事有关，囿邑在今河南郑州市一带，蓝夷逼迫仲丁迁都，显然其所居地也邻近郑州，与我区无关。值得注意的倒是“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二语，东夷从哪里向淮岱迁移的？这一事件有没有实物或文献证据？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查一下文献记载，殷商一代，今之临沂地区没有一个封国或方国，仅在今徐州市附近有一个称为彭国或大彭国的（地方志上还说今莒县地商代为姑幕国，无旁证，不取），其余地方，似乎一片空白，而根据青铜器的铭文看，则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辑入的一批商器，证明至少在出土地点的今苍山、费县及平邑附近，曾有不只一个文化颇为不低的部族（或方国）存在。这批商代器物约略可以分为四组。每组当由一个部族所铸造。

苍山东高尧村出土的一组带有“戎”字族徽的器物，是件随陶出土的，似为一批窖藏物，窖藏原因不明，“戎”字乃根据后之释文而定，康殷《古文字学新论》曰：“象执戈、甲（盾）的戎士形，由大（人形）、戈、甲三形构成。”但是在金文中，戎的字形多作“𠄎”（《孟鼎》）或“𠄎”（《虢季子白盘》），不作人执干盾形。《三代吉金文存》中所收的《且丁尊》中有铭文作“𠄎”《父己殷》中有铭文作“𠄎”，《古文字类编》列于“族徽”中，不以为是文字。按，后一说法较为恰当，因为同时出土的尚有两器，一器上的铭文作“𠄎”，虽不可识，显然也是一个族徽。另一个即第四图《商·宁女觶》上的三个铭文。第一字似“旅”字而写法稍有不同，第二字可以释作“女”，也可以

释作“母”（据郭克煜副教授见告）。三字铭文不可解，仍以释作族徽为合适。澳大利亚州国立大学的巴纳先生在《研究金文族徽的一种新方法与其成果》（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一文中附录的第十页中M271、M284、M1125诸图均与戎字族徽相近。他又说：“那些现时还有疑问，但其解释看来很有可能成立的图形，当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新资料的发现而得到解决”。对于后面两个族徽，我们期待着由将来的新资料来解决。至于戎字族徽，因见于其他著录，可知用此族徽的部族，不止分布于苍山一地，它可能是个大的部族。那末，这一批青铜器的出现，至少可以证明，在商代，我区西南，有一个强大的部族存在，从青铜器物、工艺水平、纹饰等看，这一部族的文化还是很高的，很可能是一个史籍失记的方国。

苍山县晒米城出土的《商巫尊》为第二组，其铭文字，固然可以依据《巫姜鼎》释作巫字，但是前引巴纳的文章中，第十页M116及M271的右边边图中，均有一个形族徽，M271图此族徽并且和戎字徽同在一图中，这与徽和戎字徽同在苍山出土似乎不是偶合，故“巫”字，仍以看作族徽为是。陈邦怀同志在《商代今文中所见的星宿》（《古文字研究》第八辑）一文中说：“我今年整理商代金文拓本，曾留意所谓‘族徽’铭文，发现商之族徽有多种，有些取于地名，有些取于职名，有些则取于星宿之名。”巫应当是取于职名一类的，‘戎’说不定也属于这一类。

费县出土、现藏于北京博物馆的一套带有“举𡗗”或“𡗗举”铭文的器物为第三组。“𡗗”固然可以释作“举”字，但实为族徽，《三代吉金文存》及《续殷文存》共收有此字及其变体六七种之多。以此字为族徽的青铜器，在外省亦多发现。似可认为是一大部族名，此部族后又有分支，则又于举字下更加一字，以作分支部族之标志。此部族曾定居今费县，是一个有意义的信息，如果说东夷族自山东东部向淮岱一带迁徙的话，是可能在费县一带定居下来的。

平邑出土的《商史爵》及《商𡗗觚》为第四组，带有文字铭文的青铜器，各处有发现，但《商史爵》上的“𡗗”字仍是族徽而非铭文，对这个问题的考证，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王恩田先生有专文论证（论文载于陕西出版的《古文字研究》），他以为以𡗗为族号的部族或方国在今山东薛城附近。平邑发现𡗗器，或可说明此族分布之广。至于另一器，因𡗗字尚未释出，是否成族徽，遽难断定，但既与《商史爵》同在一起出土，又同属商代器物，也许不无联系。

综合四组商器，可以看出，由平邑经费县至苍山，在商代有几个大的部族在那里定居，即使尚不能证明它们就是属于“分迁淮岱”的东夷，至少可以证明在大彭的东北方，那时并非空白点，而是由有相当文化的部族居住着的。这，可以给后之研究殷商史者，提供一批有用的实物资料。

（二）西周初年，周王朝与位于山东的东夷族各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关于这一事件，文献记载非常简略，《史记·周本记》记道：“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蒲姑。”《竹书纪年》作了点补充：“（成王）四年，王师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正在奄，迁其君于蒲姑。”《逸周书·作雒》也有记载：“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叛）。”从上述记载中，看不出周征东夷，攻打哪些地方，灭掉哪些国家。而传世的一些西周青铜器的铭文，却记载了不少文献失记的材料。综合《保卣》、《盥方鼎》、《禽簋》、《鬯劫》、《旅鼎》等器物铭文的记载，大体得知如下情况：东夷曾帮助管叔、武庚等反对周王朝，周公等于平定武庚叛乱以后，集结力量，大举向位于今山东的东夷进攻，北路灭掉位于今博兴一带的蒲姑，南路打散了徐夷，淮夷，攻下了炎（郟），中部直取今之曲阜，灭掉在今益都一带的商奄。铭文中提出了周师到达的一些地点，如丰、海眉、东陲等，今尚不能考知确在何处。上述这些材料，有一点令人不可解，即周师到达的地区，北面止于今益都一带，中路止于今曲阜一带，南面止于今郟城一带，而北至沂水、莒县，南至临沂、西起平邑、费县、东连日照的这大大片地区，究竟是否属于反周的东夷国，周师对他们进行征伐没有呢？研究这个问题，对于了解先周时这一片地区的情况及向、莒、郟、郟等国是怎样建成的都有关系。然而，前述那些文献及考古资料，没有能提供答案。

我区出土的青铜器，却有两件能对研究这个问题提供线索。（1）在费县上冶，一九六五年出土了《徐子余鼎》，铭文之首作“余”，当为徐国之器。“徐”周时称徐戎或徐夷，人们已知它位于今徐州一带，然而周伐东夷以前，它的地理位置在何处呢？《尚书》中有《费誓》，其《书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东郊不开，作费誓。”伯禽，是参加了征东夷的（见《禽簋》），曲阜的东郊不开，显然是东方有与伯禽为敌的人。誓是征伐誓师之辞，周公向东方征伐，在费地誓师，这个费地，在今费县城西，正与出土《徐子余鼎》的上冶相近。王献唐先生有篇遗著，对徐夷作了考证，他以为，徐夷的东北面疆土原在今费县、峄县一带，后来受周人压迫，才向南方退去。《徐子余鼎》在上冶出土，看来不是徐器流入费县，而是费县原即为徐夷之地。这样看来，《逸周书·作雒》所记的“叛乱”的“东徐”，应该就是费县的“余”，这个“余”，与商末以戎反举 馯为微号的部族，是否有递进的关系，就值得研究了。（2）日照奎山崮河崖村出土的四个鬲，其铭文首字作“厘”。杨深富同志在《山东日照崮河崖出土一批青铜器》一文中，释此字曰：“据陈公柔先生见告，传世铜器铭文中之厘伯，皆作器者用以称颂其父祖……孙诒让云，厘、疑即莱，故莱国。这对于研究东夷文化和莱国的疆域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物资料。”考“莱”，即莱夷，《尚书·禹贡》有“莱夷作牧”之语，可知是一个古国，其地理位置一般均以为在胶东半岛的黄县境内，莱夷也是东夷的一支。然则莱夷之器为什么会在日照发现呢？这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陈公柔先生虽然说“这对于研究……莱国的疆域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物资料”，然而他的态度非常审慎，并没有下断语，这当然因为一则没有其他证据，再则即使莱在商周之际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很难想象它的疆域竟然能扩张到今之日照附近。但是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即厘人在特殊的机缘下来到了今日日照县，并且可能住下了呢？曰：有的，只是对于证实这一可能的证据，学者们尚有不一致的看法而已。传世的《明公簋》有人以为非周成王时器，《师寰簋》有人以为是周康王以后器，但李白凤先生却以为二器均为成王时作，铭文皆记成王伯禽征东夷事。《明公簋》曰：“王命明公（伯禽）遣三族伐东国（即东夷，其他器或称为东反夷）”。这三族都是什么族呢？《明公簋》没有记载，《师寰簋》中却有这么一句：“今余肇命汝，率齐币、莱厘、夔尼、左右虎臣征淮夷”。李白凤先生以为，齐币、莱厘、夔尼、就是《明公簋》所说的三族，其中的莱厘即厘莱，亦即莱，从国名说为厘，从族名说为莱。他还以为莱本为东夷的一支，周师东征，他率先投降，并在周王廷任职，因此得以参加随征淮夷。由胶东半岛南下，便有可能取道日照。而就有莱器留于日照这一点而言，也可能因南征有功而疆域扩张及于今之日照了。当然以上据说，只是一种推理，证据尚嫌不足，不过，日照发现莱器，就不能排除日照在商周之际属于东夷地区这一点。

《徐子余鼎》与《厘伯鬲》虽尚不能说补上了周征东夷达到了今之临沂地区的一段空白，但至少也提供了一些研究的线索。

（三）春秋时，在我区最为活跃的国家有三，即莒、鄆与郯。我们所辑入者，有郯器一，莒器四（莒叔九钟算一器），曾器二。为数虽不多，亦颇有对前人研究成果有所突破者，最明显的是两件曾器。近来湖北随县一带出土了大量曾器，如《曾侯乙鼎》、《曾侯乙鬲》、《曾侯乙簋》等，而山东省苍山县又有一鄆国，其事迹屡见于《左传》。山东之鄆与湖北之曾是一是二？倘若是一，山东之鄆有没有传世的青铜器？如果有，与随县曾侯墓出土之器有无区别？这些疑问，上海博物馆藏的《曾子游鼎》与临朐出土的《曾般殷鼎》二器，基本上予以解答了。原来，周初，以曾为名，本有两个封国，都是姒姓，一个在今山东苍山境内，一个在今河南泌阳县东南地方，西与申国接壤，南与随国接壤。它后来被随国所灭，随灭曾后，改己国之名为曾。随本为姬姓，因此在今之河南、湖北这间，便出现了一个姬姓的曾国，而姒姓的曾国只剩下了苍山境内的一处。姬姓曾国，近年来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特别是几套编钟，已是国内驰名，而姒姓曾国的青铜器却不多见，几乎使考古界不再注意还有这么一个曾国，遇到曾器，便统以为随县之曾所铸。今《曾子游鼎》的铭文，开头便说，

“曾子旂择其吉金、用铸彝彝之”，惠于刺曲。”这实在是极其有价值的资料，据马承源同志研究，这是曾国后代国君铸出献与开国之君刺曲的。刺即“烈”字，金文中多见，刺曲即烈曲。按，《通志·氏族略》三引《世本》文：“曾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郟，襄公六年莒灭之。”这个曾既为莒国所灭，自然是山东之曾了。其始封者曲烈，应即据《曾子旂鼎》改为烈曲。此器的出现，不但证明了传世青铜器确有姒姓曾国之器，并且明显表现了它与姬姓曾器的区别，即姒曾之曾，作“𠄎”，为平底，姬曾之作“𠄎”为尖底。《曾般殷鼎》的铭文基本与《曾子旂鼎》相同，曾亦作“𠄎”，知为姒曾之器。而从其铭文中，又得知苍山之曾被称作“上曾”。这一些，都补了史籍缺文，至于曾的改称为郟，当是春秋以后的事，李白凤说：“凡从邑(即阝)之字，均系春秋前后孳乳的新字”，其见解是对的。

传世莒器，见于《山东金文集存》者，即《莒侯簠》等三器，均已流散外地，且据其铭文，无从断代。而莒南县出土的九件《莒叔钟》，却为我区建国后出土之物，它不但铭文多至七十字，且有铸钟者的名字“莒叔之中子平”。《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的作者以为“这里的平，也可能是后来作了莒国国君的兹平公，兹平公在位时的时间相当于鲁僖公时，为春秋的前期，与该文所断定的二号墓（游钟出土之墓）的年代应在春秋中期”，似乎稍有出入，但这一点不能掩盖九件游钟的价值。

此外，我区出土的莒器尚有一个莒戈，从器形看，亦是春秋时的兵器，此器出土于蒙阴，似乎有些奇怪。然而据《左传》记载，公元前五百五十五年，以晋为首的十二诸侯国连兵伐齐，莒要求“车千乘”从东南方向攻齐，十二诸侯之兵南至今沂源的一带齐之南疆，这件流散蒙阴之戈，是否反映了这次战争呢？

郟国之器，只辑入一件郟戈，由于铭文简单，无法据以提出什么看法。

(四)今之临沂，为春秋时郟国之地，然而，本区没有收集到郟器，诚属憾事。另外，本区的小国及地区器物，有流入江西省的《鄆车季鼎》和沂水县收集到的《蒙戈》。鄆国旧址在今郟城东北，鄆器传世者不多，虽然从铭文中无法考知鄆国历史，然而有此一器，可以证明这个附庸小国也有其不低的文化，蒙戈似为战国时器，然战国时无蒙国，知为地名。

又，本书辑入了邹县出土的《费敏父鼎》，春秋时有二费，一在今费县，一在今鱼台县，此器似非属于费县之费，辑入姑以备一国之器。

(五)我区又出土了不少外地流入之器，其国别有诸、黄、陈、邠、鄆、鲁、杞、楚（左徒戈）、曹等，流入的原因似乎各有不同，一时也考证不出。另外还有些器物，由于铭文残缺或其他原因难定其国别，只好存而不议了。

青铜器，本是寿世之物，不易毁坏。然而在旧中国，经战乱兵火而散佚之器物已不在少数，比较起来，著录于纸上者有时其传世的寿命反而更长些，我们辑录沂蒙金文的用意，盖亦在此，当然，这工作还只是开头，我们希望，以后将有金文辑存的续编、三编相继问世。

孤高名士的自由追求

——王献之书法故事

刘长春

唐《述书赋》记述晋代书坛之盛况，说是“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但是，艺术的持久力和它的永恒性是要接受历史的检验的，随着时间的过滤和汰选，有些人湮没无闻了，有些人却经久不衰，并且越来越显示出他的卓越与不朽。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以“二王”并称，而且视为至今难以超越的典范。

“二王”之一，便是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小圣”的王献之。

孤高傲世 宠辱不惊

王献之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如果说王羲之以“骨鲠”而著称，王献之则以“孤高”而闻世。有一天，王献之随兄长们去看望谢安，谢安、王徽之、王操之议论世事，滔滔不绝。不知道是他厌恶这种不着边际的清淡，还是什么原因，他竟一言不发。一次，王献之路经湖州，游一名园，其时湖州当地的一批名士正在宴集。王献之却旁若无人，视而不见。有人就当面指责他“非礼非道”，还贬损他是北方伧奴。王

献之轻蔑地连眼珠也没有翻转，走了。由于他在书法上的盛名，当时请他题字写字的人很多。有一次谢安也找上门了，让他为太极殿题榜，以百世流芳。谁也没有想到，他也不给面子推辞了。这样一种宠辱不惊的人生风范，可以衔远山，吞长江，送夕阳，迎素月，直与洞庭同其广，日月同其新。

对王献之来说，真正把自由的个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还是他的书法。“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在王献之那里，写字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待价而沽的商品，而是精神诉求的释放——从心灵中流出。有一天，他漫无目的地在会稽城的小巷里闲逛，却见一堵刚刚粉刷的墙壁又白又净兀立在前边，好一张刚刚铺就的白纸啊！他忽然来了灵感和激情，便以扫帚为笔，用泥汁作墨，径自在那粉墙上横扫。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没有人这样写字的？有没有人看过这样写字的？一时轰动得满城风雨，古之会稽人也算是大饱眼福了。

还有一次，王献之到乌程县去看望他的弟子羊欣。当时羊欣穿着新绢裙正在睡午觉。不知是洁白的新绢裙



王献之 字子敬，东晋琅琊临沂人，书法家、诗人，王羲之第七子。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触动了他的书兴，还是羊欣午睡的酣态引发了他的情思，他不声不响地在桌上抓过笔来，饱蘸浓墨在羊欣的绢裙和衣带上写满了字。在王献之那一方，无非是兴之所至极其随便地信手涂抹，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可是在羊欣那一方，醒后一见，瞳仁却放出喜不自禁的光芒，那可是一件精品。书法艺术这东西说起来也很有点神乎其神的，你很想把这幅字写好，有时可能就怎么也写不好；有时随心所欲地写去，却出了意外的精品。拿苏东坡的话来说，这叫“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羊欣是有眼力的，他午睡醒后，喜不自禁，连忙脱下绢裙和衣带，把它们珍藏起来。“偶其兴会”的激情发挥，“皆发于衷”的创作状态，把一个卓越的书法家王献之概括完整了。

勇于创新 敢于超越

中国书法史上不乏子承父业的传统。但是，艺术是最怕重复的。王献之的高明处在于：他决不仅仅是王羲之书法的忠实步武者，而是大胆地寻求自我的突破，追求“我自为我”、“自有我在”的境界。王献之为谢安幕府时，书名已经很盛，也就自然有人拿他与王羲之来比较。一次，谢安问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你道王献之怎么回答？他说：“固当不同！”（本来就是各有千秋），谢安又说：“物论殊不尔！”（外界的议论并不这样看啊），王献之接着又说“世人那得知！”（世上的人哪里真正懂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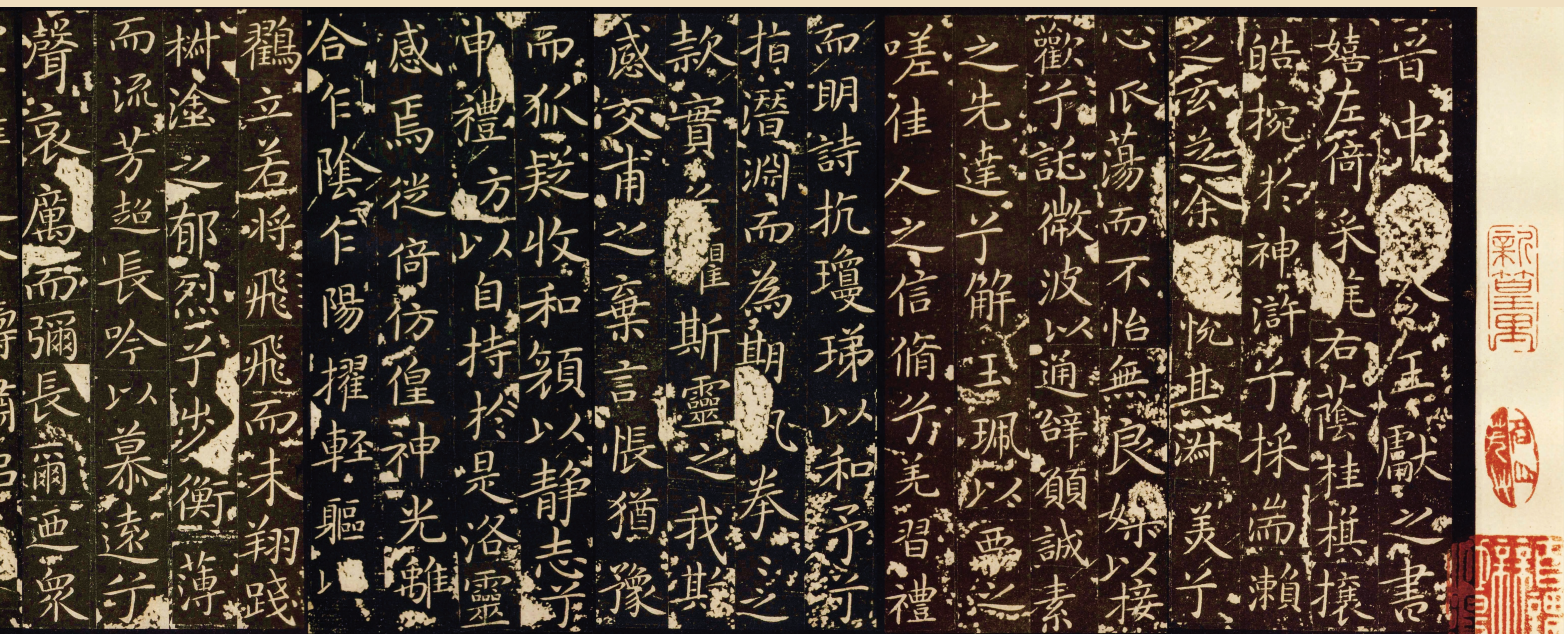
好一个“固当不同！”

好一个“世人那得知！”

置公众舆论于一边，连“书圣”的父亲都可以不放在眼里，问古今天下还有第二人否？根据笔者分析，“盖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固然与晋人张狂的个性，大胆的反圣贤排礼法否定束缚，回归真实自由的人生境界有关，但又分明折射出王献之反对盲目崇拜，敢于超越前人的不凡气度。不过，它的前提也是严酷有加的：必得以一生的磨砺和心血的浇灌为代价。俗传：王献之洗砚曾经染黑了家里贮水的十几口大缸；他七八岁时染翰，无间临池，全身心地投入到苦学苦练中，其父曾经想从背后抽他手中的毛笔，竟然纹丝不动。除了笔成冢，墨成池，循序渐进地掌握数不清的笔法、章法、墨法等技巧，还需有感悟“锥画沙”、“印印泥”等妙理的灵气，时不时地还要小心不被名利之索绊倒了自己。放弃尘俗而不断品味冷清、孤寂和苍凉，然后才能超然神会，推陈出新，进入到融会百家而自成一家的境界。后人评论王献之“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其书则“有若行风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对王献之来说，冲破先父的樊篱，更开一门，展示自己有别于王羲之风格的新的气度，无异于在一座高峰面前重新耸立起另一座高峰，其所经历的路程可谓十倍艰难于他人。可是，王献之成功了，书坛冉冉升腾起一颗耀眼的新星！

从此，“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这段历史是被后人肯定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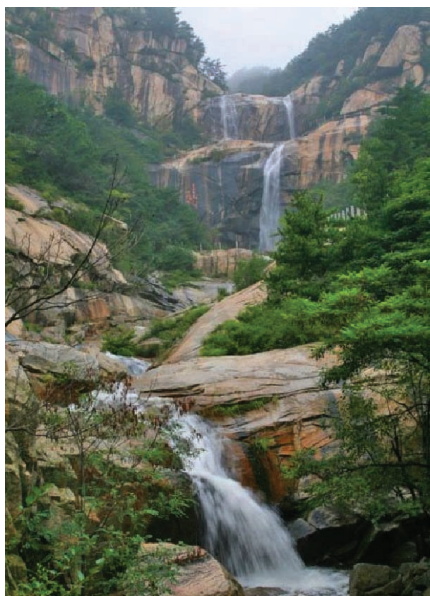
王献之为王羲之最小的儿子，字子敬。当年谢安品评王家兄弟，曾有过“小者最胜”的赞誉。谢安毕竟是谢安，他的眼界确乎高人一筹。



蒙山茶飘香 采茶歌动人

——《沂蒙诗话》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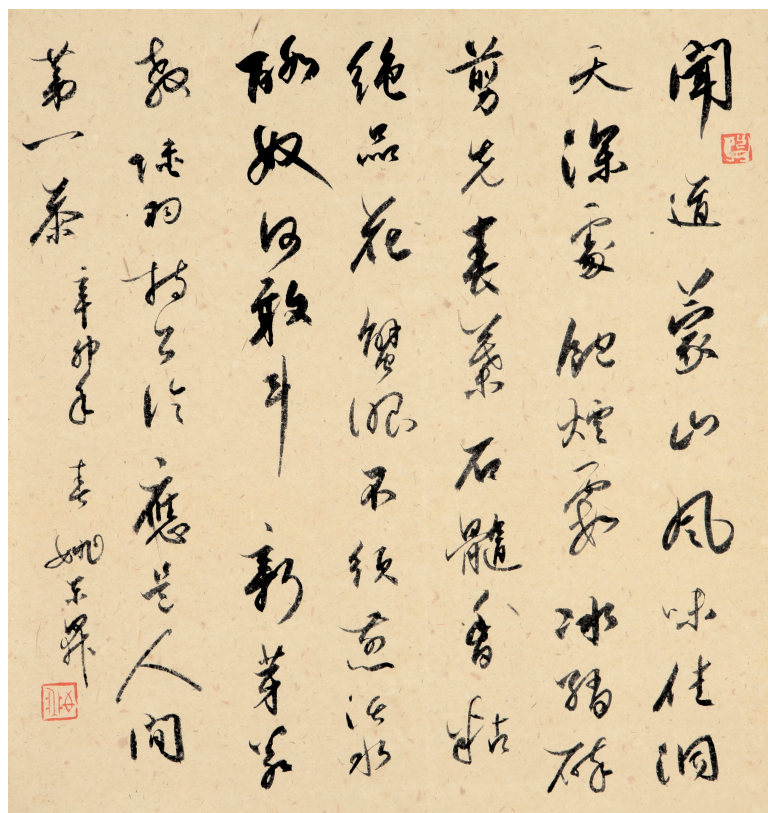
李兴河



蒙山绵亘百里，千峰竞秀，万壑泉鸣，云霞缭绕，气候宜人。所产云芝茶，性寒，能消积滞，世称“绝品”。唐人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是说茶成为饮料，由神农氏开始，从鲁周公对茶作记才传于世。周公茶记的具体内容，已难以稽考。按理推测，鲁国的蒙山茶应在其记述之中。后世论茶者，对蒙山茶多有赞誉。清初人陆廷灿在《续茶经》中引《山东通志》说：“兖州府费县蒙山石巔，有花如茶，土人取而制之，其味清香迥异他茶，贡茶之异品也。”又引《輿志》说：“蒙山一名东山，上有白云岩产茶，亦称蒙顶。”咏赞蒙山茶的诗，更是代有佳作，各尽其妙，脍炙人口。或赞蒙山茶的色香品质，或咏蒙山茶的生长环境，或写蒙山居民采茶的艰辛情景，角度不同，形式不一。

宋人文彦博曾任宰相，写有《蒙顶茶》诗：“旧谱雅称蒙顶味，露芽云液胜醍醐。公家药笼虽多品，略采甘滋助道腴。”诗赞美蒙顶茶如“露芽云液”，胜过最美的乳酪，饮蒙顶茶，能养神健体，有益于入。元人刘思温也写有《蒙顶茶》诗：“烟锁天南一黛存，冰姿玉液产云根。何人识得仙家味，不与先春并日论。”茶以产于山巔多云雾处为佳。蒙山茶正是产于蒙山之巔云起烟锁之处，所以茶的品质极佳。用“冰姿玉液”来赞美蒙顶茶之名贵，并非过誉。作者说蒙顶茶是一种“仙品”，茶的味道，一般人是难以品尝到的，即是名茶“先春”，也不能与蒙顶茶相提并论。元释明昙在《蒙顶茶》诗中说：“悬崖险峻石如林，一种仙芝不易寻。若向人间问绝品，东蒙顶上白云深。”作者称生在东蒙顶上、白云深处的茶是“仙芝”、是“绝品”，足见蒙顶茶名重人间，非他茶可比。

明人王越历任山东按察使、兵部尚书等。他写的《咏蒙山茶》诗别有神韵：“闻道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绡碎剪先春叶，石髓香粘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斗新芽。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这是一首七律，格律严谨，对仗工整，用典贴切，新颖流畅。诗的首句称赞蒙山茶风味之美。诗的次句写蒙山茶生长环境之胜，是长在藏有洞天、烟霞弥漫的蒙山高深处。诗的第三句写蒙山茶嫩叶的姿色光泽，新芽卷舒象光洁的冰绡剪裁而成。诗的第四句写蒙山茶的天然香味，说超群的茶花粘附了石髓的香气。石髓，即石钟乳，入药，古时称之为仙品，服之可延年益寿。诗的第五句写煮蒙山茶应掌握的火候，即煮到水初沸泛起的水气泡像“蟹眼”似的就恰到好处了，倒不必用活水。第六句写蒙山茶的品质之好，说嗜茶的人也不敢拿自己的名茶与蒙山茶的新芽相比美。诗的七、八句写蒙山茶的品级之高，若是请陆羽来秉公论茶，他会认定蒙山茶是“人间第一茶”。陆羽，唐初人，以嗜茶出名，善品茶，著《茶经》三篇，为我国关于



姚东升手书明人王越《咏蒙山茶》

茶的最早著作，后世民间卖茶者祀陆羽为茶神。

清初，蒙阴人王运升写有一首古风《蒙山茶歌》：“凡茶皆是水所胎，未闻石亦有根菱。独见东蒙山之顶，数石产茶不须栽。世传内有水帘洞，鬼谷曾以为蓬莱。贺仙又在此修炼，烟雾云霞长徘徊。云雾烟缊精华聚，不枝不干天花开。瓊文莹质揉而沸，色类金菊香盈杯。初虽如蘖继如蔗，雀舌龙芽并让魁。化滞清痰有异效，涤烦消暑屏诸灾。仙品流传海内外，或疑雨余石积苔。不知产在绝巔上，非在山腰他石堆。采者梯倚千寻壁，些子疏虞七尺颓。不见白骨横岩下，谁识茶从险处来。”这首诗可分为三层意思。诗的前八句为第一层，写蒙山茶生长的环境得天独厚。蒙山向有“七十二峰，三十六洞，古刹七十余所”之说。山之绝顶，云霞徘徊，洞天深藏，灵泉漱玉，被道家视为修炼养生长寿的“蓬莱仙境”。蒙山茶正是生长在这样的山水胜地，所以才成为“仙品”名茶。诗的中间八句为第二层，写蒙山茶的特色品质。蒙山茶凝聚云气之精华，润滋石髓之异香，光洁似美玉，色泽类金菊，香味浓郁，有“化滞清痰”“涤烦消暑”之效。其品级当在“雀舌”、“龙芽”等名茶之上。诗的后八句为第三层，写蒙山茶产在山之绝巔，采之不易。同时进一步为蒙山茶正名。蒙山茶本是“仙品”，已“流传海内外”，却有人怀疑这种茶是“雨余石积苔”。之所以产生这种怀疑，是因为怀疑者不知道蒙山茶产生在绝巔，采自险处。王运升是岁贡监生，曾参与清康熙十一年、康熙二十四年两部《蒙阴县志》的编修。地近易核。他在诗中对蒙山茶的描述，应该是更真实的。

采茶，是蒙山居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关系到一年的生计。唐人陆羽在《茶经》中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清蒙阴人张淑躬在《蒙山采茶词》中生动地描绘了蒙山山民春季及初夏采茶的风情。歌颂了山民的辛勤劳动，赞美了山民的深厚友谊，表现了山民对温饱生活的追求。这一组诗共十二首：

五更餐饭早早忙，唤起邻家姊妹行。山径不须怕露冷，岸头红处是朝阳。
牧笛樵歌乱午晴，绿螺深处见人行。携篮不辨茶多少，风度林坳笑语声。
几年同住隔溪湾，情谊深深彼此关。今岁采茶多与少？相逢偶语过前山。
闲将紫草问根芽，越涧穷岩记不差。恍得数茎如合拱，也应胜采一年茶。

偶来溪上问山村，十户人家九闭门。采得新茶春便好，不嫌蒸晒到黄昏。
 春归夏日又天长，依旧山家采采忙。小女辛勤儿更奋，直将茶事比农桑。
 傍壑山林入翠微，百花丛里更芳菲。趁时贪采归来晚，一担青青带落晖。
 朝来山雾作阴寒，长怕新茶湿不干。盼到午晴刚晒得，携筐又复上危峦。
 几番来往白云丛，手著荆榛鬓任蓬。盼得今年添饱暖，十分掇满翠篮中。
 山外人来各备粮，借栖茅舍近溪傍。流泉汲水早餐罢，一样忙茶到夕阳。
 杜鹃开遍石嶙峋，终日辛勤趁晚春。折得山花红几朵，一时聊作晓妆新。
 山鸡喔喔渐朝晖，囊起炊烟莫敢违。好语儿童勤掇采，青钱卖得制冬衣。

作者在诗序中说：“采茶风景，游蒙所见，大略如此。因道俗情，故用《竹枝词》体。”诗采用竹枝体，形式为七言绝句，语言通俗形象，富有生活气息，格调活泼，民歌风味浓。既是亲见，自然真切，历历如画；采用民歌，更显情趣，有音乐美。整组诗浑然一体，如一曲美妙的乐章；每首诗又各有重点，像一幅幅风情画。十二首诗，紧紧围绕采茶这一中心，或写人，或写景，或写事，通过不同画面，把蒙山采茶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情景交融。

蒙山产茶，居民向有饮茶习惯，品茶也是一种乐趣。清白云岩道人王本敬在《琴台》诗中写到：“宝鼎茶烟绿，深林落照红。”清诗人孙善述在《游苍岩山》诗中也写有：“药草人随觅，山茶客到煎。”这都反映了宝鼎煮茶、煎茶待客的习俗。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春日游览蒙山，写下诗篇《夜宿东蒙道上》：“客行杖策鲁城边，东访春风百里天。蒙顶出泉茶辨性，龟田加火谷占年。野蚕养就都成茧，村酒沽来不费钱。我亦东山狂李白，倦游好觅主家眠。”这首诗没有正面细写蒙山山景的奇丽，而是精心选取了蒙顶泉茶、龟田加火、野蚕成茧、酒美价廉等几种最有地方特色的事物，反映了蒙山的物产富饶和民风淳朴。其中，蒙山茶久以“绝品”名世，再加用蒙顶名泉水煮泡，其茶味之美更可想而知。蒙山客店的主人能用最好的蒙山茶来招待诗人，可见蒙山居民的热诚好客。店主人的热诚，自然也使诗人倍受感动，品茶之后，就美美地进入了梦乡。“我亦东山狂李白，倦游好觅主家眠”，这两句诗与李白的“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咏物诗贵在反映事物的本质特点，并有所寄托，才能耐人寻味。



祖母 菩萨 战士

——印象李志方

刘凤才



临沂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志方女士，还有很多的头衔：各级、各种专业学会、协会的主任、常务理事等证书可以堆一大摞，都证明着她的杏林实力。她身上又有很多的光环：“优秀”、“先进”、“红旗”等奖章可以挂满胸前，更荣获过“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医药卫生工作先进工作者”等国家“金牌”，都彰显着她的贡献。认识并了解了以后，看她那慈眉善目的样子，听她那在儿科工作30多年的故事，倒更觉得她像一位最疼孙子的奶奶，救命的“菩萨”，又像是一位能打硬仗的战士。

最疼孙子的祖母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有患儿的家长，都希望医生对他们的孩子像对自己亲生的一样，这才能把心放在肚子里。李志方感同身受。母疼子，祖疼孙，隔辈尤其亲，她对待就医的小病人儿，年轻的时候像妈妈疼儿女，今天的她则如同奶奶疼孙子。孩子活蹦乱跳、咿呀说笑的时候，都是顶在头上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更何况突然间又哭又闹、像个蔫了的小嫩苗苗呢！她常对大家讲：“来我们科的病人都是年幼的孩子，像我的孙子年龄一样大、一样的可爱，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地为他们诊治。只要孩子安全、健康，哪怕我累点苦点，也心甘情愿”。

奶奶疼孙子那叫个任劳任怨。小娃娃们对病情的“主诉”最多的方式就是哭闹，对治疗大部分都以挣扎来“对抗”。除了高超的技术，最重要的是耐心，最根本的是爱心，这些李志方皆堪称楷模。她从没因孩子们哭闹而心烦、因孩子们不听话而嫌弃，也从不因孩子们病情严重难治而放弃。近年来，儿科年门诊量都超过20万人次，出院病人逾万人。高峰期日门诊量高达1200余人次，一个病区就挤满100多名患儿。人满为患已经不堪、何况来得都是“患人”。李志方这个“半大老太”只能带领大伙儿全力以赴，超负荷运转。

奶奶疼孙子那叫个没黑没白、“急手拉脚”。几乎每次下班后，别人的方向是回家，她的第一目标却还是病房，不再去走一趟、查一查、看一看，她的心没法安稳下来。多少个节假日、除夕夜，人们终于可以放飞身心、陶醉快乐了，她还是坚持在病房，孩子们的健康与快乐，才是她最大的“节日”。每遇到危急重症患儿，她的心都会一下揪到喉咙眼儿，一溜儿小跑，带领大家迅速抢救，分秒必争而又有条不紊，风风火火而又干净利索。一天深夜，在家刚刚睡着的李志方被急促的门诊值班电话铃声惊醒：接到一个病危的患儿。疲倦不堪的李志方立即睡意全无，急忙赶到医院。经过紧张

抢救，孩子终于脱离了危险，此时灿烂的阳光已经洒满了病房。汗流浹背、腰疼腿酸的李志方的脸上，露出的是欣慰的笑容。

奶奶疼孙子那叫个心细如丝。她常常拽着大家的耳朵根子交待：“儿科最需要的是严谨细致，再忙再累也要确保安全和质量。”除了管理工作，多少年来她一直还坚持坐门诊、查病房。无论是记病历、查医嘱，她都一丝不苟。“医学来不得丝毫马虎和虚假，写病历和给病人看病一样，都要认真仔细，不能因为数量而放弃了质量。”在她的影响带动下，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绷紧了弦，没有敢打马虎眼的。经李志方诊治过的病情较重的患儿，她都如数家珍，哪些要每天查房，哪些要重点关照，哪些要定期巡访，都一一装在心理，排满了日程。

慈悲的“救命菩萨”

某天，一对父母抱着一个不足周岁的患儿冲到了门诊的李志方面前。李志方赶紧为孩子做检查。患儿已处于昏迷状态，并伴有呼吸循环衰竭，确诊为“重症脑干脑炎合并肺出血”，命悬一线，已近垂危。绝望而茫然的父母泣而长叹：“这孩子命里注定，要不就不治了吧。”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放弃一个小生命，这是李志方从医的大愿。在说服孩子父母后，她马上组织大家进行抢救，随即精心制定了治疗方案。整整10天后，奇迹出现在患儿身上，终于渡过了危险期，保住了小生命。一个月后，孩子痊愈出院。孩子父母感激万分，制大红锦旗致谢李志方与儿科；逢人就讲：“李医生心慈手巧，什么病都能治好”。

李志方和她的同事们经常不断地创造着让患儿起死回生的神奇故事。儿科疾病往往突发性强、危重程度高、风险大。危重患儿的紧急抢救与治疗在儿科是经常的“急难险重”活儿。每当此时，李志方这个主任既要当突击队长，又要坚持到夺取最后胜利。监护病房经常就是她的主要战场，明亮的灯光让她忘记了白天和黑夜的存在，有时能一连呆上几天几夜，除了吃饭和打个盹儿的时间，寸步不离。她不时地从这张床前走到另一张床前，仔细观察患儿的细微情况。每张床头的监护仪都紧紧连着她的心跳，每当仪器响起“嘀嘀”声，她会立即弹簧样第一个冲到患儿的床前。她不时亲自动手，为患儿们吸痰、翻身、敲背……她经常和上级专家们、同事们，反复地讨论病例，研究方案，慎之又慎，周密精细。这一切，都是为了尽最大努力、尽最快速度，从死神手中夺回那些不幸而可爱的小生命。

既要救命，也要解难，才是全菩萨。尽量让患儿少花钱治好病，是李志方和同事们的善行美德。对每一个患儿，她们都研究制订出最合理的用药方案，决不盲目处方。对十分困难的家庭，她们还拿出自己有限的工资帮助垫付医药费。李志方还带领医护人员自发地开展帮扶救助贫困患儿活动，或给患儿买饭，或从家中拿衣给患儿穿，或买玩具赠送给患儿。儿科实施了一系列便民措施，开设了便民服务箱，为患儿准备了卫生纸、纸杯、衣服、玩具等，24小时供应开水。还开通了24小时咨询电话，为大家提供疾病、心理、预防、保健等咨询服务等。在李志方倡导下，医务人员用真情与美德打造了靓丽的儿科服务品牌。

医患深情，感恩、祝福与理解，是李志方得到的最好回报。她诊治过的许多患儿及家长，每逢重要节日，都忘不了给她送来一份祝福和关心。有的家长带着康复的患儿，不远百里从山沟赶来医院，等候一个上午，就为了再向这位救命恩人表达谢意。一位患儿的家长曾经说：“李主任和她的同事们真的是尽心尽力了，她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不管孩子救得活救不活，我们都会感激她们”。

能打硬仗的战士

疫情，关于手足口病的疫情！一声声警报，惊动了多少人的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手足口病这只从“潘多拉盒子”中逃出的魔鬼侵入我国。它的罪恶魔爪主

要伸向无辜儿童，每每于春夏之交兴妖作怪。此病传染性强，传播快，传播途径复杂，流行强度大，使无数可怜的孩子惨遭戕害。为此，2008年5月我国正式将此病列为丙类传染病，对其下达“必杀令”。

李志方及儿科的同事们当然首当其冲、责无旁贷。由于目前尚无公认的特效治疗手段，又由于李志方是领导又是专家，她既要做保护治疗患儿的天使，又要担纲执行“必杀令”的重任。这是一场硬仗，此时的她是一位冲锋在前的战士。从2008年始，在连续3年的手足口病高发季节中，李志方和儿科的全体同志，没有上下班，没有夜与昼，忘掉了自己忘掉家，像一只急速的陀螺连轴转，又像一支拖不烂累不垮的钢铁部队，始终战斗在最前沿。在李志方的带领下，她们不但敢打硬仗，还善打硬仗，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及时总结，深入研讨，取得显著成绩。该院的救治流程和用药方案等，为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成功救治打下了基础，获得国家卫生部专家组认可并在国内推广应用，成为制定全国诊疗指南中重要的临床依据，大大促进了救治水平的提高。期间，李志方还参与承担了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十一五课题”《重症手足口病早期识别及治疗学研究》，目前又承担了市科研课题《重症手足口病并肺水肿、肺出血预警因素的分析》，并已申请省科技攻关项目。她们用坚定意志、顽强拼搏、无私奉献、过硬医术，使受害的患儿得到最好的治疗与保护，使不少的孩子化危为安，得到了上级的特殊表彰，也赢得了患儿家长的普遍信赖和赞扬。

有了金钢钻，才能干瓷器活。从医30多年来，李志方坚持精益求精，钻研创新，一刻也不放松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对新领域的探索。她特别致力于小儿神经疾病的研究治疗，在很多重、难、疑、罕病的诊治上，都积累了不少经验，提出了新的见解，有很深的造诣，成为学科带头人。她主持开展的多项科研项目荣获省、市科技进步奖，发表省级以上论文30余篇，在全省乃至全国小儿神经专业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李志方带领儿科医护团队不断开拓发展，加强学科和门诊建设。儿科由5年前50张床位发展成到现在的260张床位，并且设置了新生儿、神经、呼吸、血液、心肾、儿保、门急诊、重症ICU等专业科室，发展为小儿内外科各专业齐全的院中院，成为省内同级医院中规模和工作量最大、技术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都走在前列的重点专科。



老子故地孝义村考

张宗云 郭永远



老子出生于春秋末期的楚国，确切地说是“楚苦县厉乡曲里人也”，即现在的河南省鹿邑县人。

根据《史记》记载：老子可能生于公元前571年，比孔子大20岁。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他在青年时就做上了东周王朝掌管典籍的管吏。中年时由于受东周王朝权贵们的迫害，一度避难于鲁国，四十多岁以后，周王朝又将他召回，仍任掌管典籍之职。后来，周景王死后，周室发生大内战，周景王之子在与悼王、敬王争夺王位中失败，便“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据《史记》说：老聃“居周之久，见周之衰，乃遂去”，“莫知其所终”。也许客死于秦地了。

从《史记》中可以看到：老子见周王朝日趋衰败，只好离开故土出关，路上碰到关令尹喜，关令尹喜见老子有遁世之意，便让他为自己著书立说。于是，老子写下了五千余言的《道德经》，即《老子》一书。

据《高士传》等书载及后人考证，老子一度避难于鲁国时，携全家老小，在人烟稀少的蒙山之阳(现在的山东省平邑县柏林镇孝义村)安家落户，“垦山播种”、“打柴狩猎”，过着安静的日子。为防王室追寻，化名为老莱子。孝义西去二里许有座遇圣桥，据说是老莱子外出打柴时恰与登蒙山(古称东山)的孔子在此相遇。现“遇圣桥”及“遇圣门”牌坊额石联尚存。明代诗人王雅量在《登蒙山绝顶》诗中写到：

大观擅东鲁，一径薄天门。
 绝顶红轮耀，中腰白雾昏。
 泰山堪伯仲，诸阜尽儿孙。
 不受秦封辱，老莱遗迹存。

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黔南仙山夏谟允题“路礼门”牌坊额石联也记载，老子在此巧遇孔子，以及迎接圣驾时曾在路上行礼。

老子因周王朝典籍南迁失去职位，不得不离开周王朝西出函谷关流落到秦国，但并未客死于秦地而是又辗转回到鲁国故地隐居，在此侍奉父母安度晚年。老子对其父母百般孝顺，一天到晚总是守在父母身边，茶饭伺候，无微不至。老子70岁那年，他的父母都已90岁高龄。每天，两位老人坐在堂屋，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事便默默发呆。老子想，怎样才能让二老双亲每天都高高兴兴地度过晚年呢？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找来妻子的一件五色彩衣穿在身上，学着小孩的动作在父母面前又跳、又扭、又唱，两位老人还是高兴不起来。这时老子又想起来一个新法子，借给父母提茶倒水之际故意跌倒，把水洒泼了一地，然后顺势在泥水里一边打滚，一边甩手捏着鼻子学婴儿的哇哇啼哭声。两位老人见年过古稀的儿子如此“撒娇”、“出洋相”，便忍不住笑出声来。当时老人的高兴劲就甭提了，此情此景，清代诗人杨仪廷在《咏怀古迹·老莱居》中写到：

垦山播种蒿为室，菜子当年早息机。
 道路几千甘避地，年华七十尚斑衣。
 居邻孔氏心应惬，驾税楚王愿已违。
 宅里至今传孝义，蒙山治水仰清晖。

后来，老子只要见父母不高兴，便马上趴在地上翻打滚，用手捏着鼻子学阵子婴儿啼哭让父母高兴起来。

相传，老子的父母病故时，他仍然是用打滚啼哭的方式送殡安葬，表达悼念之情。因此，老子成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大孝子。孔子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楚成王也不远万里从江南赶来，向老子请教治国理政之法，并让他回楚国做官，他最终拒绝了，并对楚王说：“鸟兽之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

现在，山东省平邑县柏林镇孝义村，就是因老子在此行孝而得名的。为纪念老子村中曾立“善孝”碑一通。

老子博学多才，道德高尚，著书十五卷，可惜多已失传，现仅存《道德经》一书。《道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分道经和德经两篇，而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老子》，则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因此，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和故地遗迹考证，老子避难在鲁国的栖身之所，以及后来的隐居之处都是孝义村，老莱子即老子。老子的大半生都在孝义村度过，孝义村应是老子故地。

郑玄与平邑郑城的历史渊源

孟君



郑玄，字康成，东汉儒家学者，中国著名经学家之一。北海高密县(今山东高密市)双羊镇后店村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卒于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他一生不慕名利，不倚权势，潜修学问，遍注群经，融会贯通今古文经学，有“经神”之称。被称为“通儒”，其经学成就及由其学术而形成的学派后世称“郑学”或“通学”。

《太平御览》卷一八零，引《郡国志》：“密州高密西有郑玄宅，亦曰郑城，玄后移葬于属阜，墓侧有稻田万顷。”无独有偶，在平邑县城南50里也有一个乡镇名叫郑城。《后汉书》中记载：“南武城西北有舆城。哀十四年，司马牛卒于鲁郭门外，葬诸丘舆，即此城矣。又有郑城，在县西南七十里，相传为郑玄所居。”正如郑樵在《通志》中说：“康成故里近稻城，亦曰郑城，此亦云而者，以康成当居此得名，如高密之郑城也”。《平邑县志》有关于郑玄衣冠冢的记载：“郑玄衣冠冢，位于郑城镇康成庄，封土高3米，直径10米。南城山西南麓有‘康成石室’遗迹，迤北10公里有郑城，因郑玄曾居于此而得名。死后人们感其功德，葬衣冠冢于郑城北1.5公里处松林村东岭”。可见，平邑县的“郑城”地名的由来也与郑玄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现就平邑郑城与郑玄这一渊源关系作一考证，敬祈方家学者不吝赐教。



郑玄年少时，曾做过收税小吏。但他痛恨黑暗的官场生活，于是立志于学。他天性笃实，不尚虚荣，博涉经史，孜孜以求。《太平广记》卷215引《玄别传》记载：十一二岁的时候，他曾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在座的十多位客人都衣着华美，个个夸夸其谈，显得很有派头。唯独郑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学都赶不上人家。其母见状，感到面上无光，便暗示他不要懦弱，要显露点才华，表现点阔绰。郑玄却不以为然，说这些庸俗的场面，“非我所志，不在所愿也”。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黄巾军攻占青州。郑玄便离开高密，逃到徐州避乱。此时，徐州牧为陶谦。他听得郑玄到来，极为欢迎，以师友之礼相接待。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注释《孝经》。南城又名南武城，现在的郑城当时就属于南城。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化名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注》：

“泰山南武城县”。《輿地志》：“南武城县，子游为宰者也。”战国时被齐国占有，西汉置南城县，《史记》称南武城，《后汉书》称“南城”。参照《古今地名对照表》可以得知，现在的郑城、魏庄等地都属于西汉所设置的南城县。

郑玄避于南城后，仍以办学堂、倡导教育为要任，带领广大农民兴修水利，深受当地人的尊敬与爱戴。有关郑玄避难于南城的史实，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历史典籍中获悉。《经义考》云：“南城山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回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经》处”。郑玄在其所著的《孝经序》中说：“仆避难于南城，栖息于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中也有对南城山描述：“南城山在山东费县西南八十里，即曾子葬父处，亦名曾子山，又名毓秀山，论衡所谓南城之冢也，山有康成石室外，郑康成遭黄巾之乱，客于徐州，注孝经于此”。《太平御览》卷四十二对郑玄避难南城的事迹有着详尽的叙述：“郑玄汉末遭黄巾之难，客于徐州。今《孝经序》，郑氏所作。其序云：仆避于南城之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盖康成微逊时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回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经》处也”。

从以上典籍中可以看出，众多有关郑玄避难南城的记载都提到一个石室，即康成石室，石室的遗迹在今平邑县南武城故城西南南城山，为一石灰岩溶洞，面积约5平方米，除康成石室外，当地还保有一注经台，光绪二十二年《费邑古迹考》记载，“注经台在蒙山前武安村之东南”。注经台上曾建有行宫，光绪《费县志》载：“乾隆三十年，圣驾南巡，二月初三日，奉皇太后銮輿驻蹕荣安营，是营后改为注经台行宫”。注经台及行宫遗迹现已不存，曾在其址附近发现碑刻一通。碑呈长方体，平首，高1.8米，宽0.7米，厚0.2米，阴刻隶书“注经台”三字，字径0.3米。碑刻无纪年落款。何人何时所立，现不能确认。此碑现在平邑县博物馆保存。从现在的地理位置上看，魏庄和郑城接壤，都在西汉南城县的辖区。而郑玄避难于南城时，主要的活动范围就在这个地区。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黄巾起义平息。郑玄自南城(今平邑县郑城一带)返回高密。建安5年(公元200年)，袁绍与曹操会战于官渡。袁绍为壮大声势，争取民心，逼迫郑玄随军，郑玄无奈，只好带病而行。行军到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境)，郑玄病情加重，同年六月病逝于该县，享年74岁。郑玄死时正处于战乱之际，所以葬礼从简，最初葬于剧东(今山东益都境内)，后又归葬于高密县西北50里刘宗山下的厉阜。现在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郑玄祠庙。

郑玄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其避难之地命名为“郑城”，亦名“郑司农城”。并将其衣冠葬于郑城镇康成庄西北的松林村东岭，原名“郑玄坟”，后讹传为“郑仙坟”。此墓系黄沙土堆筑，在“文革”后期，被夷为平地，成为农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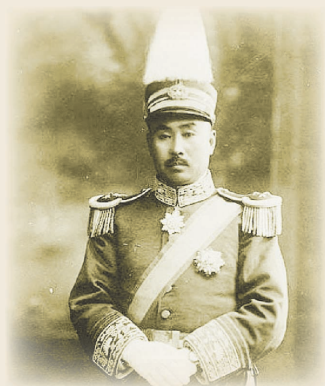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郑玄为避黄巾之乱，于公元191年避难于平邑县郑城一带，一直到公元196年才离开此地返回高密。在郑城的5年中，他以注释《孝经》为主，兼作其他学问，留下了许多文物古迹。自然，“郑城”的由来也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国时期山东历任军政长官

井窥斋 大荒堂主/整理



孙宝琦



周自齐



田中玉

民国时期山东省之最高军政长官凡25人，归属有别，或属“北洋政府”，或属“南京政府”，或属民主政权，或属汪伪政府。且称谓不一，或曰“都督”，或曰“督军”，或曰“将军”，或曰“督办”，或曰“主席”，或曰“省长”，可谓“流水的衙门流水的官”也。兹列于下：

一、北洋政府时期

1、孙宝琦（1867—1931），浙江仁和人，1911年11月13日山东独立，由巡抚改称山东都督，旋又取消独立，被称为尴尬的巡抚或尴尬的都督。1931年病逝于上海。

2、吴大洲（1884—1918），山东胶州人，1911年12月12日南京政府任命他为临时山东都督。1916年与薄子明起兵反袁，率领山东护国军先后攻克周村、济南。黎元洪当政期间，吴被北洋政府骗至北京后逮捕，死于狱中。（无图）

3、胡瑛（1886—1933），湖南桃源人，1912年南京政府任命他为山东都督，任职两个月后于1912年3月19日辞职。1933年病逝于南京。

4、张广建（1864—1938），安徽合肥人，淮军聂士成之部下。1912年3月15日由山东巡抚改称山东都督，3月28日免职。1938年张拒日不仕，遭到汪伪政府迫害，病逝于逃难途中。

5、周自齐（1871—1923），山东单县人，光绪甲午中顺天乡试副榜，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监督）。1912年3月28日任山东都督。1923年病逝于北京。

6、靳云鹏（1877—1951），山东邹县人，行伍出身，入段祺瑞幕府，1913年8月暂代山东都督，至12月正式任命，1914年6月改称泰武将军，兼督理山东军务，1916年5月免职。1951年病逝于天津。

7、张怀芝（1861—1933），山东东阿人，行伍出身，1916年5月由察哈尔都统调署济武将军，兼督理山东军务，7月改称山东督军，1918年调离。1933年病逝于天津。趵突泉畔万竹园即张怀芝私邸。

8、张树元（1861—1934），山东海丰（无棣）人，行伍出身，1918年6月护理山东督军，1919年3月任山东督军，“五四运动期间”曾在省城镇游行示威的爱国群众，逮捕学生，并杀害回教救国会领袖马云亭。1919年12月改任北京政府将军府谦威将军。



9、田中玉（1869—1935），直隶临榆人，行伍出身，1919年12月调任山东督军，1923年10月因临城劫车案引咎辞职。1935年病逝于天津。

10、郑士琦（1873—1935），安徽合肥人，少年随父（官绿营军游击）居山东，行伍出身，1923年10月任山东督军，1925年1月改称山东督办，4月调离，同年被授予“济威将军”。1935年病逝于济南。

11、张宗昌（1881—1932），山东掖县人，少年时闯关东沦为土匪，后投奔山东都督胡瑛，后逐渐发迹，1925年2月任山东督办，1928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张宗昌兵败下野。1932年被郑继成刺杀于济南站。



张宗昌

二、南京政府时期（上）

12、石敬亭（1886—1969），山东利津人，出身书香门第，1928年4月代理山东省政府主席。1969年病逝于台北。

13、孙良诚（1893—1951），直隶静海人，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十三太保之一，1928年5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移省政府于泰安。1942年率部投奔汪伪政府，1945年率部投奔蒋介石政府，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率部投诚，劝降刘汝明部，被刘汝明扣押，释放后移居上海，上海解放后被捕，1951年病逝于苏州狱中。



孙良诚

14、陈调元（1886—1943），直隶安新人，出身寒微，弃文从武，保定军官学堂毕业，湖北陆军学堂教官，之后投奔冯国璋、结交张宗昌，1923年因处理临城劫车案而名声大噪，1929年3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43年因喉癌病逝于重庆。



石敬亭

15、韩复榘（1890—1938），直隶霸州人，西北军冯玉祥部将，1930年9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37年12月日寇侵华，率部弃济南城南遁，1938年1月被蒋介石处决于汉口。

16、沈鸿烈（1882年—1969年），湖北天门人，本为张作霖与张学良麾下高级将领，1929年，同江之役中率部重创苏联海军而声名大噪。1938年1月至1942年1月任苏鲁战区副司令、山东省主席，期间曾与八路军多次摩擦。1950年到台湾，晚年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



韩复榘

17、牟中珩（1900—1981），字荆璞。山东黄县人。早年投东北军。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任山东省主席兼省保安总司令。1944年12月调任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1948年济南战役中被俘。建国后，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常委，1981年在济南病逝。

三、日伪政权时期

18、马良（—1947年），回族，直隶清苑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1937年12月投靠日军，1938年1月任济南维持会会长，3月任日伪山东省省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捕，1947年保外就医期间病死。

19、唐仰杜（1886年—1951），回族，山东邹县人，1939年1月任日伪山东省省长，5月兼任新民会山东总会会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捕，但迟迟未判决，1950年初押解济南，1951年4月被枪决于济南。

20、杨毓珣（1895—1947），安徽泗县人，前巡抚杨士骧之侄，1944年任日伪山东省省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捕，1947年病死于狱中。



沈鸿烈



何思源

四、南京政府时期（下）

21、何思源（1886—1982），山东菏泽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1944年12月至1946年10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1946年11月调任北平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全国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



王耀武

22、王耀武（1904—1968），山东泰安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七·七事变”后，王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重创日军，随后多次率部参加抗日会战。1946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68年病逝于北京。

23、秦德纯（1893年—1963年），山东沂水人，字绍文，中华民国陆军上将。1935年奉上令与关东军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抗战胜利后，任国防部次长、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任山东省主席、青岛市市长；后迁居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63年9月于台湾省台北市（今台北市）病逝。

五、民主政权时期



黎玉

24、黎玉（1906—1986）原名李兴唐。山西崞县人。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总同盟3万余人反帝大罢工。1940年8月至1941年3月任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参与领导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任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1945年8月至1949年3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秘书长。他是第三、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康生

25、康生（1898—1975），原名张宗可，字少卿，山东胶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1949年3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员之一。



《颜氏家训》析感

颜世谦



颜之推画像

颜回公元前521年生于鲁国，41岁卒身。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之首，孔子殿下四配之冠，以德著称。他同曾子一起协助老师孔子创立和缔造了儒学思想，成归一派，立以正体，被历代统治者作为定国安邦之本，也被历代有识学人予以奉尚。自唐代以来被中央政府嘉封：孔子为至圣，至高无上的圣人，天下文官祖累代帝王师；颜子封为亚圣，其地位在儒学范畴中列为第二位；曾子封为宗圣。所谓宗就是儒学的宗系之首了。

公元前372年以后孟子又将孔颜曾三人缔造的儒学创造性的弘扬和丰富，使这部学说更加完美。明代以后，历代王朝对前四位伟大人物的封赐又有新的排序，孔子至圣不变，颜子封为复圣，其意与孔子重复，曾子仍为宗圣，孟子为亚圣，为第二里程碑。

《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字介湘，生于公元530年，卒于591年，琅琊临沂人，系复圣颜回第三十五代裔孙。出身书香世家，先世随晋南渡，几经搬迁，寓居建康（今江苏南京）。颜之推身处社会动荡的年代，一生经历梁周齐隋四朝，三为亡国之人，阅历之丰富，遭遇之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以至于晚年有了看破红尘之感。而他学问广博，精通儒、道、佛各家学说，《北齐书》本传称其“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坎坷的生活阅历与博学笃行的处世节行，为他晚年撰著完成《颜氏家训》提供了最好的准备条件。

《颜氏家训》自问世以来，即被视为士大夫人家的家教范本而广泛流传，历久不衰。宋代学者陈振孙以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直斋书录解題》），这既是古人也是我们今天的共识。

《颜氏家训》是颜之推遵循了颜氏一世祖颜回（渊）的遗训，总结了他的曾祖父颜延之的“庭诰”和颜延之的曾祖父颜含的“靖侯成规”之精华，加之个人儒学修典而成的。既是家训又是儒学典著，既是他一生社会实践的结晶，也是家族文化的沃土孕育的必然结果，召示后人有必要对他产生的历史沿革和社会价值进行研究。

颜氏后裔历代传承，千百年来嫡传传人居曲阜翰林院五经大博士府（简称翰博府）。二十四世颜盛东迁琅琊临沂后，颜子后裔的卓越行为形成一条巨大的链条，代代有仁，多代王朝把袭居琅琊的颜回、颜盛后裔之寓所封赐为孝悌府。后历经多次迁徙，其主长支师古系返迁曲阜继袭翰博府封赐，琅琊孝悌府封赐传脉由三支勤礼后裔袭承。

颜氏家族后世优秀儿女对家教非常重视，颜回二十四代孙颜盛从曲阜迁居琅琊临沂，其曾孙颜回二十七代孙颜含就开始编撰家训，他居官近30年，清廉、雅正，以孝友著称。治家教子，素为整密，对后人的仕官、前程及儿女的婚配大事非常重视，曾作“靖侯成规”以戒之，“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他把家训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颜含曾孙颜延之生活在晋宋之际，仕途险恶，性命违忧。他疏诞好酒，以狂放举动抒发愤懑之情，并作“庭诰”为子弟设计处世方略，告诉子弟要立德立言，振兴家声，父慈子孝，兄弟友爱。“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

亦立梯。务前公税，以远吏让，无急傍费，以息流议，量时发敛，视岁穰俭，省贍以奉己，损散以及人。”他要求子孙先交国家税赋再考虑自己的花费，节俭度日，顾己惠人。交友的原则是“游道虽广，交义为长。得在可久，失在轻绝。久由相敬，绝由相狎。爱之勿劳，当扶其正性；忠而勿侮，必藏其枉情。辅以艺业，会以文辞，使亲不可衰，疏不可间，每存大德，无挟小怨。”为人谦虚谨慎，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严于律己，反悔在我，而无责于人，必有达鉴，昭其情远，识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宽默以居，洁静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他最强调“怀道”与“贫穷”之间的关系，能以怀道为念，必存从理之心。道可怀而理可从，则不议贫，议所乐尔。或云：贫何由乐？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贵同贫贱，理固得而齐。身获仁富，明白入素，气志如神，虽十旬九饭，不能令饥；业席三属，不能为寒，岂不信然。他教导后人饮酒要有节度，“可乐而不可嗜”，施舍的原则是“贍人之急，虽乏必先”。他要求后人禁“奇服丽食”、“节欲”注意饮食养生，“称体而食”、“量腹而饮”。

综上所述文句皆出于颜延之“庭诰”之训，“庭诰”对颜子后人修身养性、交义为友、律正宽人、克己奉公、守法纳税、勤俭持家都有谆谆详尽之训。“庭诰”对社会书香宦官之家的家庭教育也有重要的影响。颜之推在撰写“颜氏家训”时称“庭诰”为“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他在“颜氏家训”中借鉴和丰富了“庭诰”的内容，而且《教子》、《兄弟》、《治家》、《慕贤》等篇，几乎是“庭诰”的翻版。

“颜氏家训”共7卷20篇，是颜之推关于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主要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家庭教育的基础。“圣贤之书，教人诚孝”，“礼为孝本，敬者身芳”，“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他要求颜子后人从小就要研习儒家经典，“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颜之推把父子、夫妇、兄弟关系视为人伦之重，“不可不笃”，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总之以儒家道德思想教育后代子弟是“颜氏家训”最核心的思想。而笔者认为儒学思想当中，理顺上级与下级、父与子、夫与妇之关系是较为绝对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而颜之推把这些关系用客观因果关系的观点占有主导地位的加以风化是比较科学和实际的。他的家训思想极为深刻的影响着社会和族人，孕育了层出不尽的名贤，如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颜真卿（颜之推五代孙）等优秀中华儿女，忠君尽责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笔者系颜回七十七代孙、颜之推四十二代孙，以浓厚的儒学家规感和社会责任感认为：现国富民食足，求安思道者为多，当费力粗论贤规，以效世人，特将“颜氏家训”按章节析解，学识浅薄，望海教。

序致第一

【原文】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教，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虐，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鬪，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傅婢寡妻耳。

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韶龠，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涂离散，百口素然。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导示不切。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二十已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交，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

【译文】

古代圣贤的著述，教导人们要忠诚孝顺、言语谨慎、行为检点、立身扬名等道理，也说得够完备了。从魏、晋以来，各种学派的著作，道理重复，内容雷同，互相抄袭模仿，犹如屋内建屋、床上架床。我现在之所以又来写这类书，并不是想用它来做事物的规范、世人的榜样，只是想用它来端正自家的门风，提醒、教导子孙罢了。同样一句话，有的人相信，这是因为说话者是他所亲近的人；同样一个吩咐，有的人照做，这是因为吩咐者是他所敬服的人。要禁止小孩过于淘气、顽皮的行为，则师长的告诫还不如侍婢的劝阻有效；要制止兄弟间的斗争，苦告以尧、舜的教导还不如他们妻子的劝告。我希望这本书能被你们后辈子孙所遵从，并能胜过侍婢、妻子所起的作用。

我家的门风家教，一向严谨。早在幼儿时期，我就时常受到长辈的教导教诲；每次跟从两位兄长去早晚侍奉父母，一举一动都循规蹈矩，神色安详，言语平和，恭敬谦和，好像朝见威严的君主一样。而父母总是鼓励我们，询问我们的喜好志向，勉励我们扬长避短，态度总是十分恳切。我刚九岁时，便遭逢父母相继去世，家道中落，全家毫无生气，冷落萧条。慈爱的兄长抚养我长大，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他心地仁慈而缺乏威严，对我教导不够严格。我虽然读过《礼记》、《左传》等书，也喜欢写点文章，但与社会世人交往而颇受习俗陶染，放纵私欲又信口开河，还不修边幅。到了十八九岁时，才稍稍知道要磨练自己的品行，但已习惯成自然，很难一下子彻底改正。二十岁以后，我很少犯大错了，但经常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理智与情感总相互矛盾，夜晚察觉到白天犯的过错，今天悔悟昨天的过失，我可惜自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导，以至于到这种地步。如今回想从前的教训、真是刻骨铭心，那是不同于古书上的劝诫，仅仅看一看、听一听而已的。所以特意写下二十篇《家训》，作为你们的前车之鉴。

【析感】

颜之推系颜协之三子，士大夫之后，既有前辈遗训戒规，又有早年丧失父母、受长兄之仪和次兄之奇所抚养的不幸遭遇，且成人后抚养四弟之善读书、科考，一生身置官场沉浮之中，“家训”是历史和现实结合的必然，残酷的现实形成的彻悟。

上苍赋予百姓生命，所有人都挣扎着带着希望而来，离开人世的一瞬间，都在静静的回味着过去，带着遗憾而去。生时的希望是固有的、娘给的，是不可添减的，离去的遗憾是各不相同的，为给自己少留点遗憾，加强自身的修养是必要的。天赋和修养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人生，且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后人。人的一生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而更重要的是对亲人负责、对家族负责、对民族负责，乃至对全社会负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励行勤耕陋食、节饮素着，按照清白为人，认真做事，人无完人，事重于尾的修身原则处事为人、忠君尽责，当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应在衣食之足后，努力行做立功、立德、立言不朽之为。



琅琊谱碑亭

县志篇目设置要突出地方特点

杨永早 李祥琨

一切文学艺术都讲究典型性、个性化，即指要突出事物特点。歌德说过：“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莱布尼茨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即每个事物都是“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马克思《致敏·考茨基》），都强调了突出特点的重要性，方志当然也不例外。现结合莒南修志实际，谈谈我们对篇目设置方面如何突出地方特点的认识和实践。

一、首轮修志篇目设置在突出地方特点方面的不足

地方志要突出地方特点，这已是史志界的共识，许多史志名家权威人士的讲话和文章中也多有论述，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如实地、恰当地突出地方特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第一轮修志过程中，因为开始大家对如何修志尚不熟悉，处于摸索阶段，不知如何安排归属、详略、先后次序，经常引起议论、争辩，意见不统一。这时省市方志专家拟出了基本篇目样式，领导机关传达下发了参考意见。从此，各县市单位就基本按照上面定的基本格式进行编写，一般都是先建置沿革、地理环境，下面是人口，再下面是农业、水利、工业、交通邮电、商业、建设、财税、金融等经济部类，接着是政党、群团、政权、政协、司法、民政、人事等政治部类，再次是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文化部类，最后是风俗、宗教、方言、人物等社会部类内容。当时这个基本模式是较为科学、实用的，对第一轮修志的功绩是巨大的，到现在仍是我们修志的重要依据。

当时虽然强调突出特点，但并没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多是忙于按格式安排内容，认为各部内容归属得当就行了。另外，对哪些是本地特点，如何突出特点的认识尚处于朦胧状态，认识不到位，所以在内容安排上，往往把重要特点淹没在部类的框架中，篇目设置上就只见地理、农业、文化等部类篇章节目，而特点的内容没有突出出来。如马鬃山只放在地理环境编中，地貌章内山脉一节第三目《望海楼山脉》条下，单列的一小子目内，只有110字。而莒南最辉煌的亮点是1940—1945年，作为当时中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中心，号称“山东小延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山东省党政军群组织的首脑机关都长期驻扎在这里，刘少奇、罗荣桓、陈毅、肖华、谷牧等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在这领导指挥了轰轰烈烈的反扫荡、土地改

革、大生产运动、抗战文化教育宣传运动及经济斗争，进行了建党、建政、建军的重要活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军支前，出现了无数动人的典型，创造了辉煌的革命业绩，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一段光辉历史却被分散到文化、民政、军事等部类中。如大众日报社被放在文化编中的“报刊发行”目中，抗大一分校被放在教育编中“成人教育”一节中，北海银行被放在财税、金融编第三章第一节“金融机构”的附录中，以小子目出现。影响华东，受到联合国援助的山东大药房只在卫生编的第一章第一节医疗机构的附录中第五个子目中叙及，完全无法引起读者注意，其他类似情况还有一些。这样，无形中把地方的特点、亮点、重点，湮没在泛泛的共性内容中，得不到彰显，无形中使县志的价值受到削弱，使外界认识莒南受了很大局限，也妨碍了本地的广大人民对自己地方光荣历史的认识 and 了解。

二、在二轮修志篇目设置方面突出地方特点的有益尝试

在第二轮修志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觉察到这个问题，意识到突出重点、特点、亮点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好的构想和建议。为此，我们在设计县志篇目时做了许多重大的改革、改进和变动，大胆地调整了篇目和内容结构。

在制定编目时，我们根据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要求，经过充分调查论证，统一认识，确定了本县的几大特点。

（一）山水之特——马鬃山。此山为鲁东南名山，不光山势高峻巍峨，景色特异，资源丰富，而且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宋金时期著名的农民起义军红袄忠义军根据地就设在这里，山上有营垒仓储，山下有天顺政权宫殿。红袄军强盛时，势力范围北到蓬莱，南到荆州、扬州，西到深州、忻州，东到大海。他们的斗争不仅是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斗争，更是反对异族侵略和奴役的民族斗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红袄军在这一带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其中女首领杨妙真更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巾帼英雄，在这一带妇孺皆知，深入人心。其次，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在这儿也曾演绎过反抗异族压迫的威武雄壮、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为明朝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另外，汉代的赤眉军，唐代的瓦岗军大将秦琼、罗成，宋代的穆桂英及其受业师傅道安均在此留下许多传说和古迹。明代白莲教起义和李自成别部曹武生起义在此亦有活动。宋代名儒、宋仁宗的经师杨光辅曾在此设立书院，全国各地来求学修业者甚多。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及山东党政军领导机构曾驻此处，罗荣桓、肖华等领导人驻山下村庄领导山东军民抗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八路军兵工厂、后方医院曾设在山上；大众日报社、北海银行等机构设在山下，这一切都构成了马鬃山以“三红”为特点的独特人文历史和景观。许多重要内容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独有的。

（二）名胜之特。一是卧佛寺，乃汉唐古寺，门前有唐槐，至今枝叶繁盛。绝妙之处在于寺北有一山，形似大佛袒腹仰卧，惟妙惟肖，号称天佛。二是王璟祖莹。王璟是明朝成化至嘉靖五代元老，官至左都御史、太子太保，一生为官清廉，正直有为，在《明史》中有传，清代文坛巨擘王士禛的《池北偶谈》等著作中都有专章文载。三是孙镗纪念馆。孙镗是明代抗倭英雄，本来是我县在吴越经商的大商人，因见倭寇祸乱中华，挺身而出，尽捐家产，输资佐军，自己亦投身抗倭，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并回乡招兵，把家乡亲族中青年招募入伍，赴闽浙，抗倭卫国。孙镗最后壮烈牺牲，朝廷褒扬，诰封光禄大夫。这是一位典型的民族英雄，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壮举值得永远学习和颂扬。

（三）物产之特。一是蟾酥。采集历史悠久，产量全国第一，药用价值高。采集制作工艺完善，采集人最远到达江浙、山西、河北一带。二是黑陶。以大店镇薛家窑村所产黑陶最为著名，远销江北数省，连甘肃嘉峪关城楼的陶瓦都曾是薛家窑产品。此处制陶历史上溯可达龙山文化源头，前几年村中曾有蛋壳陶出土。至红袄军起义的时期，此处陶业曾为军管官营，规模很大。其产量大，品类齐全，在千百年中都是人民生活重要器具用品。现已研制出精美的工艺

品和保健用品。三是花生。莒南自古为花生产业大县，历年来产量居全国第一，质量优等，是本县支柱性产业。且品种甚多，近年已出现黑皮、紫皮花生和小粒花生。四是石刻。莒南石刻历史悠久，主要有坊前和坪上石刻及石沟石碑等。石材以花岗石、大理石、紫砂岩及玉石为主，产品有石碑、石狮、石灯、园林石雕及玉石雕件饰品，产品远销北京、上海等省市及日本、东南亚诸国，影响极大。五是柳编。莒南柳编历史悠久，古代主要以编织箧子、篮子、簸箕、柳条筐子等生活、生产器具为主，大小不一，门类甚多。上世纪以来，以编制花篮、礼品、饰品等出口产品为主。在广交会上受各国客商青睐，出口量很大，已成为一种特色产业。产地以板泉为主，已出现万亩柳条田，万家搞编织的景象。六是莒南绿茶。莒南制茶史悠久，古代即有马鬃山茶，甲子山云雾茶等，但未形成规模。自1965年后，开始引种南方茶叶。至20世纪90年代后，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产业快速发展。莒南绿茶质量优异，独具特色，在国内外市场上日益受到重视和欢迎。另外，还有木梳、板栗、樱桃、油石磨具、驴肉等特产，不再赘述。

（四）历史之特。大店地主庄园。大店庄氏从明末到清末，300年来，出过进士7人，举人20人，贡生36人，当官为宦者甚多，成为鲁东南名门大族。大店地主庄园做为一种社会形态，有其发展、兴盛、衰亡的自然轨迹。这里面有其读书致仕，封建经济，封建伦理，爱国卫道，儒家文化传承，也有等级观点，剥削压迫，享乐腐化等封建社会种种弊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激烈转折，在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崩溃转型，最后融入到社会大潮中。庄氏家族成员绝大多数拥护并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经受了革命洗礼和考验，成为革命人民大众阵营中的组成部分。许多人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骨干精英或高级领导干部，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只有极少数顽固反动分子、腐化堕落分子与人民为敌，在革命大潮中被冲击、扬弃或消灭。也有少数人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如今也被社会潮流唤醒，积极反对台独，为两岸和平统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地主庄园300年的兴衰史，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走向衰落灭亡的一个缩影。其中许多正确的东西，如重视教育，经济管理及资本运营探索，许多爱国志士投身抗清、抗日，革命仁人志士投身革命，与封建家庭决裂，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都值得大力肯定和弘扬。也有一些反面的东西，如封建落后观念，对农民的压迫剥削，腐化堕落，醉生梦死，道德败坏，少数人逆历史潮流而动，坚持反动立场，仇视

革命，与人民为敌，最后走向灭亡。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很好地总结和借鉴。

（五）人物之特。一是历史人物。王璟、孙镗介绍见上文。另外清末翰林庄陔兰担任过孔府76代衍圣公孔德成及其姐孔德懋的教师，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要求帝国主义归还青岛的活动，曾编修《重修莒志》，影响很大。二是老红军。莒南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山东根据地的中心，是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1943年定为山东实验县。当年115师中的许多红军将士长期生活、战斗在莒南一带，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因伤残或年龄大的原因，转业在地方工作或退休，莒南是山东省安置老红军最多的一个县。1943年开始，陆续安置江西、四川、山西等籍转业老红军46人，占临沂全地区安置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二，杨云、曾炳华等曾受到华国锋、江泽民、乔石等中央首长接见。三是著名烈士。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著名烈士曹玉海，是38军中最著名的英雄，其具有传奇色彩的事迹感人至深，被国家和中央军委公布为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和抗美援朝英雄营营长。他所带领的342团一营，仅在朝鲜战场四次战役中就消灭敌军2034人，其中美军1451人，是朝鲜战场歼敌最多的营。

（六）红色之特。莒南县是山东老革命根据地中心，中共中央山东分局、115师司令部、山东省党政军群领导机关长期驻扎在此地，领导了山东根据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山东最早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山东游击第四支队即是由沂水的邵德孚，莒县的郭友邻、王玉璞等领导的莒县（莒南当时属莒县）抗日游击队，和莒南的谢辉、张子亮、刘怀川等在1937年8月组织成立的十字路游击大队组成。1938年8月，山东省委的主要组成部分，鲁东南特委在大店成立。因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改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鲁东南特委实际已实施山东省委职能。1941—1945年，莒南成为山东革命首脑机关驻地，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政府在本县大店成立。刘少奇、罗荣桓、陈毅、饶漱石、肖华、谷牧、刘兴元、陈士榘、张仁初等许多国家党政军领导人曾在此领导革命工作，与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山东的许多重大会议在此召开。1945年10月罗荣桓率十万将士和6000名地方干部从这里出发，挺进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发展成第四野战军。解放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南下干部从这里出发，到南方刚解放的广大地区建立红色政权，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功勋。战争中，许多的英雄模范人物在这片根据地上涌现。他们无数动人事迹已成为红色经典。渊子崖村淳朴善良的农民在遭受日军侵略时，用

铁镐、木棍、铡刀和鸟枪、土炮与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军血战整日，付出147人的生命代价，消灭日军120余人，体现了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战中老百姓宁可自己吃树皮、野菜、花生壳，把省下的最后一点粮食送给八路军。许多大娘大嫂为了哺育八路干部的孩子，宁可让自己的孩子饿死。刘永良老人，把三个儿子全部送上前线，儿子先后为国捐躯。老人一门三烈，仍不要国家照顾，靠自己劳动生活。张秀菊大娘强忍丈夫、儿子在孟良崮战斗中先后英勇牺牲的巨大悲痛，仍带领全村妇女做军鞋、送军粮，积极支援前线……无数的动人事迹催人泪下，撼人心魄，这段红色历史光辉灿烂，足以永垂史册。

（七）毛主席批示的三个典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莒南人民为医治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改变全县贫穷落后的面貌，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发挥了无穷的创造力和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硬是用双手，凭借简陋的抬筐、小车、铁镐，把全县几百万亩荒山改造成能排能灌、平坦肥沃的丰产田，修筑了水库和渠道，掀开了经济建设的光辉一页。在建设中，厉家寨人治山治水，改土造田，农田水利化建设成就非凡，在全国树立了榜样；王家坊前村群众自觉入股筹资，解决了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为发展经济创造了经验和先例；高家柳沟在合作化过程中，创办了记工识字班，短期内解决了全社识字、记账等问题，快速培养了文化人才，创造了教育事业奇迹，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范例。这三个典型先后被毛泽东主席发现，并亲笔批示，在全国推广、学习。这三个单位的经验，对推动全国农村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事业，推动经济文化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

以上特点，都是莒南县独有的光辉亮点。处理好这些重点、特点、亮点，更能彰显莒南的风采，体现莒南的真实面貌，让外界能更好地认识莒南；也使莒南人增加自豪感，更加自觉积极地爱国、爱乡，鼓舞他们建设家乡的积极性、主动性。

基于以上分析论证，在本届修志中，我们重新审视了志稿资料，理清思路，重新设计了县志篇目，把突出特点和亮点当成一个新的突破点。我们把红色根据地、毛主席批示典型、大店地主庄园、马鬃山等单独升级为编，把黑陶、卧佛寺单独列为章、节，加以重笔专述，使志稿更加靓丽出彩，增加了志书的可读性、可用性。

从农家小子到嫦娥功臣

——记沂蒙骄子王广利

葛瑞强



王广利，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民盟委员会委员，上海天文台民盟支部主委。1965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沭县大兴镇山西头村，198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测绘学院大地测量系。1988年王广利被免试保送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同时攻读上海天文台天测天力专业研究生，2000年获上海天文台天测天力专业理学博士学位。

“嫦娥一号”的发射已顺利完成，卫星目前正在按照预定的轨道顺利运行，承担卫星测轨的VLBI技术在这次发射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卫星发射到现在，所有测轨数据都在10分钟之内完成，没有出现一次计算失误。而其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也在不断显现：有了VLBI技术的突破，中国人仅投资了14亿元（二公里地铁的造价）就完成了探月卫星的测轨探测任务，此次VLBI技术被誉为国际航天界运用在深空探测领域的一次创举……而这一壮举的创造者之一，就是沂蒙骄子——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理学博士王广利。

2010年12月19日，记者来到了临沭县山西头村，走进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见到了王广利博士年近八旬的父母，了解到了王广利的成长历程。

才俊出寒门

山西头村是一个只有1062人的小村，去年人均收入仅3100元，但“上学为荣”的观念却深深根植于村民心中。村民可以不建房子，但孩子不可以不读书。该村的农民喜欢“攀比”，但不是比穿，比的是谁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好、考取的大学是名牌。据统计，自恢复高考以来，该村共走出了156位大学生，其中有1位博士后、5位博士、近20位硕士研究生。王广利兄弟姐妹6个，虽然家庭贫困，但父母节衣缩食供他们读书，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没让一个孩子辍学，他们家走出了4个大中专学生，而王广利则是该村走出的第一位博士。

出乎人们的意料，少年时代的王广利不是文质彬彬，却是一个武术爱好者，曾经四处表演。王广利的童年留给父母印象很深的是他的勤快、好动、点子多，年龄很小的时候王广利就经常帮助父母做家务：扫地、割草、洗碗，兄弟姐妹一起拣地瓜干，王广利是拣得最快的，小小的年纪他还帮助家里上树砍柴、编藤筐、织鸡网。

但王广利也让父母感到头疼，家里仅有的几件电器都被他一一拆装过，当然拆装以后也就基本报废了。王广利6岁时走进了该村的小学堂，一段时间后老师给他的评价是“这孩子太愣，什么不懂，学习成绩很差”。但王广



利很懂事，学习越来越刻苦，从三年级开始，学习成绩明显提高，之后年年都是三好学生。王广利读高中时，他的数学成绩最好，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1984年上高三时，王广利夺得临沭一中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高考时老师建议他报考了北京大学数学系，王广利果然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但因人数限制，被调剂到第二志愿的武汉测绘学院。上大学后，他每学期都能获得一等奖学金。

1988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免试保送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一边工作一边读研。参加工作后，王广利曾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第八次运动会进行电脑编程。为了科研需要，他自学了日语，还精通德语、英语等多国语言，先后被单位推荐到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讲学。

三年研究“嫦娥”

在上海天文台，王广利始终是技术骨干。2004年上海天文台接到我国首次绕月探测工程V L B I精密测轨任务后，天文台领导就把测轨分系统中负责相关后处理软件的研发任务交给了王广利。

作为V L B I测轨系统数据软件开发的关键成员之一，王广利除了到食堂吃饭，剩余的时间他几乎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

绕月探测工程中的相关后处理软件有很高的复杂性和集成度，研发任务量很大。在研发过程中碰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是在传统的天文、测地领域的V L B I相关后处理中所未曾碰到过的。王广利积极为测试实验方案设计出谋划策，主动设计不同的解决方案并在软件中及时实现，对不同方案给出评估，为最终解决方案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就这样，王广利和同事们设计的测轨数据软件在我国首次探月工程任务实施期间，运行稳定可靠，操作简便。并且该软件良好的动态图形显示功能能够直观、及时、准确地反映V L B I测量系统的工作状态和测量结果的质量，对整个系统的平稳运转做出了重要贡献。

“嫦娥一号”升空绕月探测期间，为精确测定V L B I台站的坐标，进行了几次观测实验。王广利都主动承担了对这些实验的相关后处理软件的研发任务，并利用该软件完成了对这些实验的相关后处理工作和数据分析工作。

2007年11月7日8时34分，“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完成第三次近月制动，卫星终于进入绕月周期为127分钟、高度200公里的极圆形环月工作轨道，这标志着

“嫦娥一号”绕月工程，奔月阶段的V L B I的精密测轨任务胜利完成，就在这一刻王广利喜极而泣。

八年未回家

2007年12月12日，我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对参与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的研制、建设、发射、测控和科学应用等各项任务的22个单位和200名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进行了表彰，其中一位就是王广利。

王广利受表彰的消息很快传到沂蒙老家，家乡沸腾了。他的父母深感自豪，他们说，王广利已经8年没有回家了，尽管想念儿子，但他们还是不想耽误儿子的工作。

在记者电话采访王广利时，王广利流露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歉意。结婚后，由于忙于科研和学术交流，他一直未回老家看过父母，2004年原定的回家乡行程，又因上海天文台接受“嫦娥一号”项目任务而搁浅。现在王广利的孩子已经5岁了，从未见过爷爷、奶奶。在“嫦娥一号”测轨项目攻坚阶段，王广利经常工作到深夜，在这期间，他嘱托家人不要给他打电话，以免干扰工作。如今任务圆满完成了，王广利的最大愿望就是回家看看，看看自己的父母，看看自己曾经生活过的乡村……



千里万里心系故乡

——记世界知名学者、教育家孔宪铎

杨玉金



孔宪铎（1935— ）美籍华人。祖籍山东省郯城县李庄镇李庄二村。世界知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植物生物学家和生物技术专家。历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副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特别顾问，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名誉教授，山东联合大学和临沂大学名誉校长。

孔宪铎1935年生于战乱之中。1945年随家人逃到上海，在一家炒货店当学徒。后来随流亡学生南下香港，要饭，睡马路，生病无人照顾，差点死去。病好后在一家纱厂做学徒工，工作四年中利用工余时间补习英语、数学。1954年以侨生身份，通过了台湾在香港举办的大专联合考试，考进了台中农学院（台湾中兴大学前身），主修园艺科，因缺乏中、小学基础，上得很艰苦。1958年大学毕业，获台湾中兴大学学士，留校任助教。1963年1月赴加拿大圭尔夫大学修读园艺学硕士，由于生病错过了注册期，到8月才入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又修读博士学位，1968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植物博士学位。1971年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后。1974年被美国马里兰大学正式聘用，三年后升为副教授，又过了五年成为教授，并相继在《科学》、《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由于出色的成就，不久升为系主任，先后任马里兰大学理学院副院长，生物技术研究学院院长，代理副校长、副校长之职，并入选《美国尖端科学家名人录》、《美国环球科学家名人录》。

孔宪铎在海外多年，尽管加入美国国籍，但他时刻关心祖国的四化建设，一直关心着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1979年以来，每年都要回国进行学术交流、讲学，为我国的生物工程开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先后担任我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星火计划”外籍顾问，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名誉教授，山东联合大学和临沂大学名誉校长。1986年孔宪铎首次回乡探亲，欣然受聘担任郯城第四中学名誉校长，并帮助学校建设了三层图书大楼，捐赠图书上万册，方便激励了众多的学子。1991年，正当他在美国的事业顺利发展时期，新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向全球招募优秀教育工作者，他毅然应邀担任了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1992年升任副校长。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他长年活跃于香港教育界、科技界和文化界，不断地在《明报》、《亚洲周刊》等著名媒体上发表随笔杂文；至2002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他撰写的《我的科大十年》一书，引起了国内教育界的极大关注。2003年，经过多年的酝酿筹备，临沂大学破土动工，这其中也有孔宪铎为之奔走宣传所做的贡献。在后来召开的座谈会上，孔宪铎激动地说：“临沂市委、市政府为具有千万人口的沂蒙老区建设现代大学，决策是科学的，我们终于要有现代文明社会标志的高层次大学了。大学的建成将使沂蒙在全国、在世界上改变自己的形象，也将给百姓带来不可替代的希望！”他应聘担任了临沂大学名誉校长，实现了他为家乡教育事业献出一己之力的梦想。

姓氏百家漫谈 (连载)

赵丹峰

			
李 姓	王 姓	张 姓	刘 姓
			
陈 姓	杨 姓	赵 姓	黄 姓
			
周 姓	吴 姓	徐 姓	孙 姓
			
胡 姓	朱 姓	高 姓	林 姓
			
何 姓	郭 姓	马 姓	罗 姓

第一篇 王氏

所谓“姓氏百家”，只是约数；所叙姓氏，亦没有特定的排序要求，仅依文章形成的早晚而定。因琅邪王氏乃区内最为著名的望族，故将述介王姓的文字作为开卷之篇，先与读者见面。

一、王氏的起源

王氏得姓历史悠久，姓出多源，支派繁多，南宋史学家郑樵撰《通志·氏族略》云：“王氏，天子之裔也。……以其所出既多，故王氏之族最为蕃盛云。”受篇幅所限，仅举主要者述之：

一为子姓之“王”。《通志·氏族略》曰：“出于汲郡者则曰王子比干之后，此子姓之王也。”比干乃商王文丁之子、商纣王之叔父，因直谏而被纣王剖心残害。其子孙为了纪念他，遂以“王”字为姓氏。此王氏有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等支派。

二为姬姓之“王”。此系天下王氏中的最大族派。该族派中又分为周文王子毕公高之后、周平王太孙赤之后、王子城父之后、周灵王太子晋之后等。其中以周灵王太子晋之王氏影响最大。史载，东周灵王姬泄心有太子名晋，聪颖早慧。晋15岁时，晋国的两位大臣叔誉和师旷，在朝贡时听晋论及天文地理与兴邦安民之策后，被其过人的才智所折服，师旷遂赞誉说：“暝臣未见为人辩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闻而易穷。王子，汝将为天下宗乎？”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京师附近的谷、洛二水泛滥，危及王宫的安全，为解京都水患，灵王欲遣人壅塞谷、洛二水，而太子晋则认为此举不妥，遂直谏道：只有取因势利导之法，使二河水畅其流，方可从根本上消除水患。刚愎自用的周灵王以为太子晋是有意犯上，盛怒之下竟废掉了晋的太子名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

三为妫姓之“王”。妫满乃虞舜之后，周威烈王十六年（公元前410年），妫满的后裔田悼子建立田齐国，至齐王建四十四年（公元前221年）时，田齐国为秦所灭。其长孙田安被楚霸王项羽封为济北王。项羽自刎后，田安失去了王位，齐人念其子孙出自帝王之家，便称他们为王氏。其派下有

北海、陈留等代表性支派。

王姓的起源虽多是由王族之后改而姓王的，但亦有一些王姓族支的得姓是出于其他原因：

一是出自某些非汉族王姓者。如西魏可频氏之祖王雄原系代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南朝梁的太尉王僧辩，本系鲜卑族乌丸氏而冒姓王；隋末地方割据者王世充，本为西域胡支氏，入中原后改姓王；辑耳氏之祖王季原是西羌族人。直至晚清，在原满州八旗的完颜氏、伊喇氏等氏族中，仍有一些由原姓改为姓王者。

二是赐姓为王氏者。如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后，赐战国时燕太子丹的玄孙嘉为王氏；明朝皇帝赐蒙古族人默色特利尔姓王名麟，赐阿辽纳姓王名美音，赐济布答姓王名德忠等。

二、王氏代表性郡望与堂号

在姓氏起源后，同一姓氏的人们通过迁徙而散布于各地，在繁衍过程中，他们之间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亦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一些旧贵族以经学相尚并以此传家，进而因“经明行修”被召为官，世代传承，遂成为集文化优势和政治优势于一身的世族。这些地位居高的世族为了表示本支族群显高于其他地方的同姓家庭，便在其姓氏前面再冠之以其族居地某某郡的名号，于是便产生了将政区之名与姓氏之谓联为一体的“郡望”。由于这类大族拥有显赫的祖先，地域与世官相结合，便使其郡望具有明显的稳定性，有的甚至历经千百年而不衰。据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考究，中华王氏计有21望，即：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北海王氏、陈留王氏、东海王氏、高平王氏、京兆王氏、天水王氏、东平王氏、新蔡王氏、新野王氏、山阳王氏、中山王氏、章武王氏、东兆王氏、河东王氏、金城王氏、广汉王氏、长沙王氏、堂邑王氏、河南王氏等。在上述几十个王氏郡望中，尤以琅邪王氏和太原王氏为最显。

琅邪王氏和太原王氏系周灵王太子晋的后裔，太子晋之子王宗敬是这支王氏族人的得姓之祖。从宗敬下传到十五世为王翦，翦之子为王贲，贲之子为王离，祖孙三代皆为秦国大将。王翦、王贲父子为秦统一六国南征北战，功勋显赫。王翦、王贲去世后，作为王翦之孙的王离被封为武城侯（其封地武城遗址在今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魏庄乡内）。秦末，关东豪杰为反抗暴政揭竿而起，王离和章邯奉命率军镇压起义军。巨鹿一战，秦军被项羽打败，章邯投降，王离被俘。是时，秦法严苛，王离长子王元和次子王威为了避祸，便由其家乡频阳东乡东奔，经长途跋涉，迁徙于琅邪郡境内。王元先迁琅邪（郡治在东武县，今山东诸城市城关镇东城子村），后徙临沂县（治所在今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诸葛城村）。其四世孙王吉，始家皋虞（县治在今山东即墨市温泉镇西皋虞村），后徙临沂县都乡南仁里（遗址在今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东南1华里处），成为有史可考的琅邪郡（国）临沂县王氏家族的始祖。王吉是西汉昭、宣时期的经学大师，官至谏大夫。其子王骏和其孙王崇，均官至三公。于是，以王吉祖孙为代表的这支王姓家族，便成为名闻遐尔的名门望族。因自王吉起，其后裔世居琅邪国临沂县，历时400余年，于是“琅邪临沂王氏”（习称琅邪王氏）便成为国内著名的代表性郡望和此支王氏家族引以为荣的标志性徽号。而“太原王氏”，则是系王威的九世孙王霸辗转迁徙至太原广武，继之又迁居太原晋阳后，传衍发展而成的又一著名王氏郡望。正如《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所云：“王氏定著三房：一曰琅邪王氏；二曰太原王氏；三曰京兆王氏。”

堂号，即同一郡望中不同房支的称号，它是郡望在社会前进中进一步分化发展的产物。堂号名称，有的以某一特定典故冠名，有的则以其居住地得号。如王祥在任徐州别驾时，颇有政绩，深得刺史吕虔赏器。吕虔有一佩刀，经铸工相之，认为系宝刀，但须身为三公者方可佩带，否则或可为害。吕虔认为王祥有公辅之量，故将此刀赠与王祥，后王祥官至司空。王祥临终前，又将此刀授与其弟王览，称“吾儿凡，汝后必兴，足称此刀。”王览之后果然人才辈出。鉴于这一缘故，琅邪临沂王氏宗族的堂号又有“宝刀堂”之称。又如，琅邪王氏南迁江左

			
顾 姓	侯 姓	邵 姓	孟 姓
			
龙 姓	万 姓	段 姓	雷 姓
			
钱 姓	汤 姓	尹 姓	易 姓
			
黎 姓	常 姓	武 姓	乔 姓
			
贺 姓	赖 姓	柴 姓	文 姓

后，一直居于建康（今南京市）乌衣巷。后因人丁繁多，逐渐分而居之。王导的六世孙王志迁出乌衣巷后居在禁中默里马蕃巷，此支族人便被世人称为“马蕃王氏”。琅邪王氏在其后的繁衍中，又分出许多新的堂号，其中最为著名者有两大堂号：一支是以王导第十七世孙、王褒第九世孙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在开辟福建创建闽国而兴起的“开闽王氏”；另一支则是以王导第二十三世孙王祐因在其庭院植槐三株，以勉其子孙努力上进，日后好博取功名、位列公卿而得名的“三槐王氏”。此外，王氏又在大的堂号下分衍出许多小的房支堂号，不再一一记数。

三、族群迁徙与分布

琅邪王氏举族进行大规模的长途迁徙发生在西晋末年。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发生了匈奴汗国举兵攻陷洛阳，掳走晋怀帝，先后屠杀晋朝王公与百姓6万余人的“永嘉之乱”。永嘉之乱后，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先前听从王导、王敦、王旷等王氏兄弟之计的琅邪王司马睿坐镇建康（今南京），拥治江南，社会相对安定，经济亦较为富庶。饱受战乱之苦的北方官民便纷纷背井离乡，迁徙于江南地区。在今临沂市境内，琅邪王氏、琅邪颜氏、东海徐氏、兰陵萧氏等大家世族皆举族南迁。此次移民规模庞大，北方南迁总人口达90余万人。原世居北方的名门望族和名人儒士几乎迁徙殆尽，故而时人有“过江名士多如鲫”之说。此次南迁，虽说是百族而动，万众相随，但实际的领头者应是琅邪王氏。正是有了以王导为代表的琅邪王氏的鼎力辅佐，司马氏的晋室皇权才得以延续了一百余年，琅邪王氏亦因此获得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社会地位，使其以江南侨姓第一望族的身份，在长达270余年的时间里，在江南地区进行繁衍与发展。

在南北朝时期，王氏又有两次由南而北的迁徙。这两次迁徙虽然规模不大，且均出于被动（南朝齐的王肃系因父兄被害、避祸而投奔北魏；南朝梁的王褒则因被俘而降魏，先后事西魏与北周政权），但由于上述二人归北后均受到重用，客观上为琅邪王氏在北方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末，世居光州固始的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先是参加农民起义军，待取得义军领导权后，遂挥师挺进东南，成为八闽大地的最高统治者和开闽王氏的始祖。三王入闽时，中原民众、儒士计万余人亦随之入闽，计有27姓之多。郑成功、施琅、林则徐等，都是当年随三王入闽后裔中的佼佼者。

北宋末，“靖康之乱”发生后，世居莘县（今属山东聊城市）的三槐王氏又随宋室南迁。此次南迁，“一十八支，或吴或越，支分派别，不能备述”。

清代，居于闽、粤、桂一带的王氏族人，又有迁往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发展者，其中以开闽王氏和三槐王氏的后裔居多。

如今，王姓居民遍布国内各地，几乎所有的居民点都有王姓居民，总人口9000余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25%，居中华各姓人口之首。

在琅邪王氏和东海王氏两大郡望发源地的山东省临沂市，王姓居民总人口达117.5万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11%。就农村而言，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义堂镇南楼、朱保镇东埠、苍山县兰陵镇、尚岩镇和卞庄镇等，都是较为著名的琅邪王氏聚居地；郯城、临沭和莒南等县的一些村镇，则是东海王氏族人的聚居地。

临沭县县长听取县志工作情况汇报。

3月1日，临沭县县长、县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任庆虎听取了县史志办关于续修临沭县志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建议将征求意见稿发至县史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单位征求意见，并在市史志办的指导下，精心做好临沭县志评议会的筹备工作。

临沭县史志办制定了《关于论文撰写信息调研工作的奖励办法》。办法规定，对本年度内史志办全体人员撰写的与史志工作相关的论文、信息等凭刊发证明进行奖励。

沂水县召开全县史志工作会议。3月18日，沂水县召开全县史志工作会议。全面总结2010年工作，安排部署《沂水年鉴(2010)》和《铭记同乡一天南地北沂水人(第二辑)》组稿工作，并对全县各乡镇、各部门的史志信息联络员进行了业务培训。

2010年度全省史志系统“八个一优秀”评选揭晓。3月21日，全省史志系统“八个一优秀”评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以无记名投票形式评选出2010年度全省史志系统“八个一优秀”获奖单位和成果。临沂市史志办公室获得优秀史志工作单位奖，沂水县史志办公室获优秀史志工作单位入围奖，临沭县情网获优秀地情网站入围奖。

苍山县召开二轮修志工作推进会。2011年3月25日，苍山县二轮修志工作推进会在县行政中心三楼西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县长助理郭士强主持。高思圣副县长在会上作了讲话。

临沂市制定下发《地方史志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3月30日，临沂市史志编委会制定下发了《临沂市地方史志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全市史志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十二五”期间全市史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扎实推进第二轮修志工作、创新年鉴编纂、加快信息化建设、加强方志馆建设、编纂出版《沂蒙革命根据地地志》、开展旧志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加快修志成果转化。

《临沭县政协志》出版发行。2011年3月30日，《临沭县政协志》出版发行，《临沭县政协志》全书700余页、72万余字，为16开本，分为10章内容。系统地记述了临沭县政协自1984年成立至2010年27年的历史、现状及发展历程。

莒南、沂水相继制定史志业务规范。

近日莒南、沂水县史志办公室相继制定出台了《年鉴编纂质量管理办法》、《关于加强读志用志工作的若干规定》、《方志馆图书管理办法》、《县情网管理规定》等四项业务规范。

全省史志办主任座谈会在临沂召开。

4月6—8日，省史志办在临沂市召开全省史志办主任座谈会。省史志办主任刘秋增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临沂市副市长王晓嫒到会祝贺，省史志办各处馆、单位负责人和各市史志办主任、秘书科(处)长参加了会议。

会议中，省史志办副主任刘娟传达了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精神，

省史志办主任刘秋增安排部署了山东省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30周年纪念活动。会议还通报了全省史志系统“八个一优秀”评选活动有关事项，部署了全省史志工作法制化建设、《山东省汶川特大地震救助援建志》修改完善等工作。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临沂汉墓竹简博物馆、王羲之故居、大官苑社区、金锣集团、天源物流、山东金兰现代物流有限公司、曹家王庄社区、小商品城、中国教育用品采购基地等。

全市史志办主任会召开。4月8日下午，全省史志办主任座谈会结束后，临沂市迅速召开了县区史志办主任会议，学习贯彻落实全省史志办主任座谈会精神。会上朱海涛主任要求各县区要按照省史志办部署，积极参加纪念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30周年活动，精心谋划下一步工作，推动全市史志工作更好更快发展。

《临沂市志》编修工作简报(二)。

为了提高《临沂市志》的编修质量并加快编修进度，临沂市史志办公室于2011年2月11日下发了《关于开展“学习优秀志书，提高〈临沂市志〉编修质量”活动的通知》(临史志办字[2011]4号文件)，要求各县区史志办公室和《临沂市志》各承编单位通过学习优秀志书，加快各自所承担志稿的编写进度，提高编写质量，使编写的志稿达到观点正确、篇目设置合理、记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资料运用得当、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突出、文风端正的目标。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征文启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讴歌党的光辉历程，本刊特征文予以刊载纪念。

- 1、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治国创业、改革开放历史为内容，真实再现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前进的丰功伟绩。
- 2、文章形式以写史纪实为主。回忆录、报告文学、纪实散文均可，字数保持在3000字以内，文章最好辅以照片。
- 3、文章必须是未经公开刊发的，一般要求采用电子文稿的方式投送。

电子信箱为“yimengshizhi@163.com”，邮寄文稿投递地址为“临沂北城新区天元商务大厦634室，邮编：276000，联系电话：0539-8727560”。

- 4、文章截止日期为2011年6月15日，未经采用本刊不做退稿处理。

《沂蒙史志》编辑部